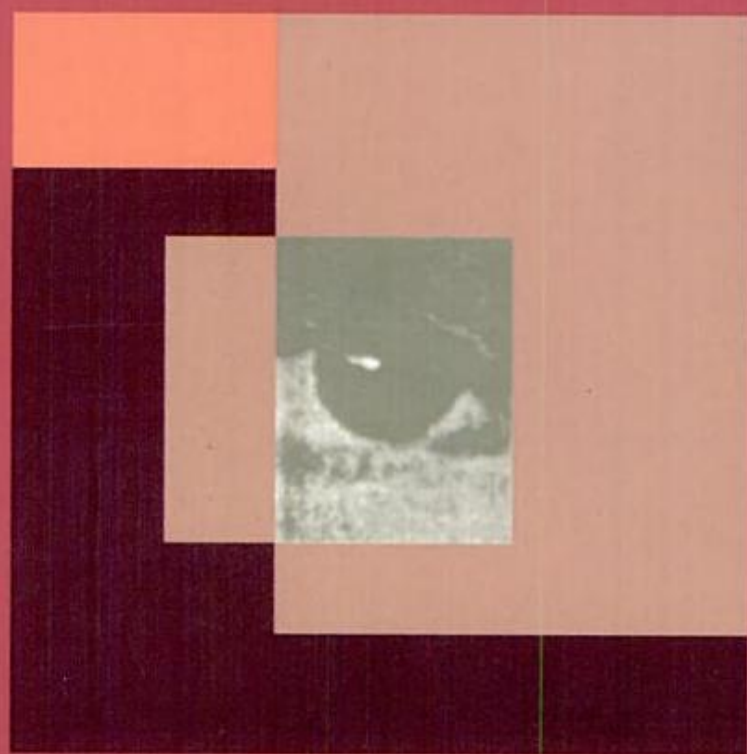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 劉青峰 編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設計、編輯及製作，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香港中文大學 1996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封面設計：王雪青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201-763-0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s and Analysis (in Chinese)

Edited by Liu Qingfe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763-0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vii	編者前言 對歷史的再發問	劉青峰
	I 文革事實的再發現	
3	文革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印紅標
17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王友琴
37	打老師和打同學之間	王友琴
49	清華井岡山兵團的興衰	唐少傑
65	紅衛兵運動的喪鐘：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	唐少傑
81	文革中的「外國造反派」	何 蜀
95	《新民晚報》是怎樣砸爛的？	馮英子
107	「新時代的狂人」陳里寧	林 森
117	流氓政治及張鐵生現象	王 毅
127	「萬物生長靠太陽」與原始崇拜	王 毅

IV 文學藝術中的文革

- 347 文革思潮與「後學」 郭 建
- 357 紅衛兵美術運動 王明賢
- 371 「六億神州盡舜堯」——文革後期繪畫的主題 吾 遠
- 377 論毛澤東的大眾藝術模式 高名潞
- 391 沒有身體的戲劇——漫談樣板戲 王墨林
- 399 革命電影的修辭策略 馬軍驥
- 411 崇高的蛻變——新時期文學中的「文革」 王 坤
- 423 中國先鋒文學與「毛語」的創傷 楊小濱
- 435 重說「黃金時代」 艾曉明
- 443 張承志：守衛昨日之夢
——從《金牧場》到《金草地》 許子東

V 評論與綜述

- 463 世界資本主義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
德利克 (林立偉 譯)
- 483 現代性演化中的西方「文化革命」 劉小楓
- 495 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 徐友漁
- 515 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 王紹光

139	新舊毛澤東崇拜	周群 姚欣榮
149	下鄉女知識青年婚姻剖析	劉小萌
163	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	陳曉文
 II 造反運動與異端思潮 		
179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運動的興起	印紅標
191	文革期間群眾性對立派系成因	華林山
209	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派——與華林山商榷	徐友漁
219	政治迫害與造反運動	華林山
231	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	印紅標
249	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	宋永毅
267	異端思潮和紅衛兵的思想轉向	徐友漁
 III 文革對世界的衝擊 		
289	紅衛兵與「全共鬥」——兼談6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	橋爪大三郎 (季衛東 譯)
305	文化大革命與現代日本	加加美光行 (季衛東 譯)
319	毛主義與法國知識份子	加斯托 (廖曉英 譯)
323	法國式毛主義的類別與興衰 1966-1979	高達樂 (程映湘 譯)
335	文革是一場反社會運動	杜蘭 (陳彥 譯)

編者前言

對歷史的再發問

劉青峰

為甚麼文革研究成果如此稀少？

已有不少學者指出「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外國」。確實，文革在中國所造成的巨大社會後果與文革研究的貧弱形成了驚人的對比。論歷史震撼，文革足以與法國大革命和法西斯主義興起相比；然而，對這些改變歷史進程的大事件的思考與研究，中國人卻遠遠趕不上西方。西方研究法國大革命和近代法西斯主義的成果是如此豐富深入，以致於不僅當代社會及人文科學無不以之為基礎，而且它們已成為西方文明與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反觀中國，文革結束已足足20年了，但有關文革研究的著述卻仍是寥寥可數。在大多數人心目中，文革似乎並非亟待分析和探討的大事，而只不過是一場最好盡快忘卻的惡夢而已。但我認為，這只是表面現象。無論從對同時代人的了解，還是從自己的思想經歷來看，我認為如果說中國人忘記了文革，或者沒有對文革刻骨銘心的反思，都是錯誤的。

30年前，文革爆發時我正是文革發源地北京大學的低年級學生，曾親眼目睹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北大大飯廳外牆張貼。時至今日，只要一閉上眼睛，當年的驚濤駭浪就會澎湃腦際。文革改變了我和我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正是由文革暴露出的種種問題，迫使我們這一代人從對現實發問迅速轉向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發問。這一轉向，決定了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說，仍可以算作是繼續文革時期的思考。我相信，類似的情況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是相當普遍的。

既然反思文革是這一代知識份子向歷史、社會和文化發問的起點，那麼為甚麼文革研究成果卻如此稀少呢？撇開官方意識形態壓制乃至禁止公開討論文革這一外部原因不談，只要立足於中國人思想和心靈演變的大趨勢，就會顯示文革反思的靜默和研究的蒼白，也許正表明文革對中國人的震撼是何等強烈，以及它所引起的震盪又是如何廣泛和深入。

中國文化現代性的重要轉折點

在一百五十年來中國思想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中，文革是一個重要而獨特的轉折點。在此以前，雖然各代中國人的思想呈現不同面貌，但有一條將其貫穿起來的主線，這就是尋找足以對抗西方衝擊的現代烏托邦社會。這種追求既是社會性的也是文化性和道德性的。它一方面代表中國人拋棄儒家傳統之後追求和締造新的人生意義和終極關懷，另一方面又要體現當代中國人對世界和歷史的新解釋。

在本世紀上半葉，這種追求所釋放的巨大社會動員力量，被譽

為東方睡獅之驚醒。但隨之而來的社會政治運動日益激進左傾，到文化革命時期達到頂峯。文革宣告了中國人對現代烏托邦追求的破產。它猶如驚天巨雷，擊中並摧毀了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所辛苦建立起來的新嚮往。其震撼力之巨大，終於導致了中國百年來主流思潮的大轉向。從文革中期開始，中國人心靈之迷惘、懷疑和困惑，是西方人所難以想像的。我們甚至可以講，文革所引發的深刻反省才是中國人心靈真正走向開放和現代性的起點。因此，文革研究成果貧乏並不表示中國知識份子對文革缺乏反思，而只是表明他們在目前被迫轉向對歷史、文化、社會制度以及終極關懷等更深層文化預設的思考而已。

事實上，不正是對文革烏托邦的痛切反思，使得中共領導人毅然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從而回到在50、60年代被批判為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向上來嗎？80年代曾席捲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本質上也可以說是由文革逼出來的歷史發問在更廣闊的社會和思想層面的表現。其實，80年代的文化反思指向文革的後設層面而暫時忽略文革本身，也許並不是壞事：這種暫時的忽略甚至也許是必要的。因為中國思想學術界剛剛從心靈長期封閉的狀態甦醒，急須經過廣泛吸收外界和傳統文化資源的階段，從而獲得深入反思所不可或缺的學術和思想基礎。在80年代中期，中國思想界之開放，引進外國學術之快之多，只有五四時期可比擬。到80年代中後期，學術研究已開始擺脫浮躁而步向沉實。可以想像，隨着80年代啟蒙運動和民間文化運動的深入，包括文革研究在內的學術工作將會出現繁榮局面，並結下豐碩成果。所以，真正值得擔憂的，是1989年六四以後的政治高壓造成的啟蒙思潮中斷和對學術自由的限制。今天我們已經可以逐漸看到，強行打斷一個民族具有自身發展邏輯的思考過程，會帶來甚麼長遠後果。

反思文革不能離開的兩個基點

今年是文革爆發30年，相對於國內的鴉雀無聲，海外有關文革的議論卻是沸沸揚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那些試圖賦予文革某種合理性甚至先進性的論調。其一，是在聲稱反抗所謂中共官方徹底否定文革的意識形態霸權這一出發點上，或大談毛澤東的「大民主」和「造反有理」之形式合理，並宣稱它們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有效性及其必要性；或否認文革是對工農兵、甚至知識份子的浩劫，認為它僅是對走資派和特權份子的災難。其二，是援用西方後現代理論來重構文革，忽略西方與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差異，從而營構文革現象的「後現代」特徵。從積極意義上來看，這些論調顯示出某種多元性和開放性。但不幸的是，它們大多以選擇性記憶為基礎，所以與大多數中國人所經歷的文革事實和體驗迥然相異。有人稱這些論調是忽視整個民族的巨大苦難，不能說沒有道理。本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學術自由如果能持續深入下去，那麼今天中國的學術研究包括文革研究自然將是另一種狀況，而以上觀點的存在也就更為正常了。

經歷過文革和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學人都會同意，任何簡單否定或肯定文革的說法都不免流於膚淺。正如所有複雜而驚心動魄的歷史運動一樣，文革有其多面性，包括表面上似乎應該肯定的價值。但正是因為把那些看起來無可置疑的理想和價值推到極端，才產生了文革的邪惡和野蠻。因此，從中國近現代思想變遷的大脈絡來看，文革研究不能離開兩個基點，第一，不要忘記和忽略至今還沒有說話的沉默大多數；第二，它必須是中華民族歷史反思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既然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已隱含着中國人對文革的反思與發問，那麼，今天的文革研究自然應該是站在這個基礎上對歷史的再發問。我之所以強調文革研究應以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為基礎，是因為這一思想運動包涵了以下三方面因素：其一，是指由文革

到8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反思的連續性；其二，我們應當珍惜文革留給每個中國人最寶貴的精神遺產——反對任何形式的現代迷信，維護開放、多元、理性；第三，文革反思的深化有賴於廣泛吸取西方思想和學術的成果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資源。因此，真正的文革研究，不但要有史實的整理考訂，還應包含我們中國人以往所缺乏的抽象學理探討。只有這樣，才可以產生與中華民族歷史經驗相稱的思想果實，才可以為人類歷史以及中國文化與制度的進步積累精神財富。

本論文集的三個特點

編這本論文集，對我來說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十幾年前的冬天，我差不多有一個星期每天來回擠三小時公共汽車，從北京西郊趕往東城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那裏收藏着豐富的文革原始資料。有感於抄寫資料太慢，我提出複印的要求。那知，管理員請示上級之後，不但不准複印，還取消了我憑介紹信獲得的閱讀資格，研究也隨之擱置。從1990年開始，我的主要工作是編《二十一世紀》雜誌，但同時也還一直留心國內外的文革研究。雜誌現已出刊6年多，從1992年起開始零星發表文革研究文章，去年和今年又先後推出四個文革專輯。現在將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彙集，終於編成了這本厚厚的文革研究專題論文集。為此，我要感謝《二十一世紀》的同事，特別是余國良先生、關小春和張素芬小姐。由於他們的共同努力，這本文革論文集才有可能趕在文革爆發30周年之際出版。

這本論文集有三個特點。一是文革事實的再發現。強調事實的實證調查，代表歷史記憶的恢復和發展理論基礎的可能性。有的作者告訴我，一些外國學者幾乎不敢相信1966年8月發生在中學的血腥暴力事件的真實性。其實，30年是整整一代人成長所需要的時間，不要

說外國學者了，就是今天的中國年輕人還有多少人能接觸到文革真相？因此復原並再現文革事實，其價值不僅在於它的震撼性，而更在於它本身就是文革研究的基礎。本書第二個特點是它的開放性。本書作者包羅海內外中國學者和日本、法國、美國學者，由於他們的地區、生活經驗和學術領域不同，因此他們對文革的感受、觀察和分析評論也各不相同，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多元的探討。本書第三個明顯特點是具有世界視野。文革發生在中國，但它同時也屬於世界，甚至可說文革是60年代世界性激進思潮和運動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個。而這一點往往又被今日不少熱衷於西方文化評論和前衛思潮者所忽略。為了充分認識文革的發源地和中心——中國，我們需要從中國本身來探究文革的意義邏輯，但同時也要避免忽略其世界性的一面。

最後，我無意高估本書的整體研究水平，但作為至今仍少有的中文文革研究論文集，特別是包括了不少中國大陸學者在艱難條件下的研究成果，它是值得重視的。對這些學者為研究文革所付出的努力和代價，所承受的壓力，我感同身受，並且表示由衷的敬意。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文革是一個尚未真正展開而又具有永恆魅力的研究領域。編這本書，既滿足了我個人想研究文革的未了心願，又寄託着我對未來的期望。我相信這本書對未來更深入、廣泛的文革研究將會有所啟迪和貢獻。

1996年11月20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

I 文革事實的再發現

傳隊進校不啻是致命的評判。(5) 一貫最善於捉摸毛澤東心理的林彪，給這次召見以及紅衛兵領袖的「錯誤」畫龍點睛：「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幹甚麼。」④紅衛兵領袖的「落伍」意味着紅衛兵運動的衰落。

7月29日至31日，「逃難」於北航紅旗戰鬥隊場地的團派多次召開總部擴大會議以及群眾骨幹會議。蒯大富數次有選擇地傳達毛澤東的召見講話，力圖把毛的講話置於有利於團派而不利於4派的程度，力圖多給團派群眾一些穩定情緒的信息。在這些會上，大多數團派人員的舉動反映出團派徹底消亡前的心態。在有的會議上，還貼出「留得井岡豪氣在，三年歸報劉鄧仇」，「雪裏梅花開不敗，井岡山人敢上斷頭台」的大標語。迫於有關當局的多方壓力和督促，團派人員於8月2日開始返回清華。同日，北京市革委會領導人通知團派頭目：宣傳隊要在清華駐下去。自8月中旬起，包括團派在內的清華人員開始「接受」宣傳隊的領導和改造。

五 武鬥的性質及影響

「武鬥」作為文革特有的現象和事實，它既不能只用軍事領域的戰爭、戰役和戰鬥去界定，也不能從宗教戰爭的角度去理解。「武鬥」是指文革中，在同一社會制度、同一信仰體系甚至是在同一價值規範的條件下，並且更多的是在同一地區、同一單位或部門中，某一群眾組織從政治上和精神上跟敵對群眾組織進行的武力鬥爭，也就是說，它是具有強烈派性色彩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武力鬥爭。在文革初期特定的歷史下，由於中共黨的領導和權威大大削弱，眾多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崛起，使處於不同階層、具有不同利益和為了不同目的的群眾，在形成了自己組織暫時的合法性和相對的權威性之際，面臨着如何對待或超越其他群眾組織的問題。而哪一群眾組織具有正統性乃

文革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印紅標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在校園裏貼出大字報，攻擊中共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和北京大學黨委主要領導人宋碩、陸平、彭珮雲。6月1日，毛澤東決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從而點燃了自下而上衝擊領導的群眾運動的烈火。毛澤東盛讚它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十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它被公認為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開始的標誌。

這張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人人皆知的，但是關於它的產生經過，卻長期存在着疑團，至今說法不一。在中國，最通常、最權威的說法是：這張大字報是由康生授意聶元梓等人寫成的^①，「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康生一手策劃」，欺騙了毛澤東^②。但是持這一說法的人沒有提供可供學者考察分析的詳細資料來源，有些人對此說表示懷疑。

為澄清問題，筆者翻閱有關的文字材料，收集了幾位知情人的口述資料。在聯名簽署大字報的七個人當中，筆者收集了聶元梓的口述資料，並直接訪問了其餘六個人，還以通信方式詢問了與此有關的1966年中共中央理論小組駐北京大學調查組成員張恩慈，得到了他的答覆。依據這些資料，特別是口述資料，筆者認為，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不是由康生授意，而是由聶元梓等人主動寫成的。大字報得到了曹軼歐和康生的支持。康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最後由

毛澤東決定推向全國。本文將考訂和介紹有關這張大字報的歷史事實。

一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北京大學的黨內矛盾

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的七個署名者都是共產黨員，均來自哲學系，其中聶元梓是校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趙正義是系黨總支副書記；其餘五人除了楊克明剛剛調出哲學系外，均為該系教員。一個系的黨組織領導人和黨員為甚麼要攻擊學校黨委和北京市委的領導？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講到北京大學的黨內矛盾。

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大學哲學系黨員內部、一部分黨員與學校黨委主要領導人之間存在着矛盾，這些最初並不十分嚴重的分歧和摩擦與政治運動相交織，逐漸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激化起來。關於這一點，雖然可能有不盡相同的評論，但是在歷史事實方面沒有重大的疑問。

1964年夏季至1966年初，北京大學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或者「四清」）。運動經歷了反覆，牽動了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領導人，激化了北京大學的黨內矛盾。

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64年夏季至1964年底。這一時期，以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磐石為首的社教工作隊，從政治上否定了北大黨委的工作，斷言北大黨委的方向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方向，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社教運動中，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帶頭指責學校黨委書記陸平等，一些青年教師按照左的錯誤觀點，響應社教工作組的號召，積極批判校黨委。校黨委節節敗退。北京大學黨委的上級領導機關北京市委竭力保護北大黨委，與社教工作隊進行抗爭，派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參加社教工作隊領導班子，派大學部辦公室主任彭珮雲

到北京大學兼任黨委副書記，幫助北京大學黨委抗拒以張磐石為首的社教工作隊的進攻，但未能挽回局面。

在社教運動中，哲學系出現這樣一批積極份子並非偶然。運動前，哲學系部分教員就與校領導關係緊張。究其原因，據說涉及到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校黨委書記陸平對一批教員的「右傾錯誤」的批判，以及關於60年代初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的前任）工作作風的爭論。1962年，這位深受陸平器重的黨總支書記在哲學系黨總支改選中落選。本文無意討論其中的是非，只想指出黨內矛盾的存在。

從1965年1月至1966年1月是北大社教運動的第二階段。在這段時間裏，北京市委支持北大黨委推翻了社教工作隊的結論，扭轉了北大社教運動的方向。

1964年底，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方針。1965年1月，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並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一方面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另一方面要求糾正前一階段社教運動中對基層幹部打擊過寬的偏差。在中共中央，鄧小平和彭真取代劉少奇負責社教運動的領導工作。

中央指導方針以及人事的變化立即導致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的轉向。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會議上批評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接着，北京市委幫助陸平推翻了社教工作隊的結論。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批評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此後不久，中央書記處決定撤銷張磐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隊隊長的職務，全面改組工作隊領導班子。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立群接任隊長，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任副隊長，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戈華參加工作隊領導小組。此後，張磐石受到批評，離開北大。北京市委又召開北大的幹部和積極份子會議，統一認識，對追隨原工作隊方針的社教積極份子進行了批評。這次會議進行了大約半年，因其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行，所以被稱作「國際飯店會議」。

1966年1月，北京大學社教運動宣布結束。這時毛澤東已經發動了對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批判，北京市委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

北京大學前期社教運動的錯誤理應糾正，而聶元梓等人對於批評耿耿於懷，一直等待着為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翻案的機會。四個月之後，天翻地覆的變化到來了。

二 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的產生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怎樣產生的？它與康生有甚麼關係？這是本文考察的重點。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批判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並且正式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很快傳達到了北京大學的幹部和黨員。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論小組派出以曹軼歐（康生的妻子）為首的調查組進駐北京大學。調查組的任務是調查北京大學的學術批判情況，實際目的是為整北京市委搜集資料，以及發動「左派」寫批判文章^③。

根據當時擔任北京大學黨委委員、法律系系主任的陳守一回憶，調查組的曹軼歐不止一次找他詢問北京大學學術批判情況，並且說北京大學的學術批判有問題，鼓動陳守一「揭發」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和北京市委領導，但是被陳守一拒絕^④。

曹軼歐動員陳守一向校黨委發難未成，而哲學系的幾位中青年教師卻感到政治氣候的變化，躍躍欲試了。文革開始以後，這些社教運動的左派，密切關注着政治形勢的發展，時常聚在一起議論。「三家村」的落難和北京市委的危機令他們鼓舞。「三家村」的主要人物

鄧拓正是北大社教後期工作隊領導人之一，對彭真、北京市委的否定意味着有可能對北大社教運動進行重新評價。

調查組進校不久，哲學系青年教員、社教後期受過批判的宋一秀、高雲鵬找到調查組成員張恩慈，談論北京大學的運動。張恩慈在社教運動時也是北大哲學系教員，運動前期的「左派」。運動結束以後，他從北京大學調到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工作，這次隨調查組返回北大。張恩慈說，調查組到北大是為了調查學術批判情況。談到北大的運動，他說北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有點死氣沉沉，法律系組織師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獄的歷史資料，埋頭故紙堆，方向不對。談到如何打開局面，張恩慈提議串聯左派。而宋一秀、高雲鵬說：「社教運動中的左派大多數被派到遠郊區搞社教運動去了，很難串聯，是否可以寫大字報、小字報之類的東西？」張恩慈也拿不准，沒有積極肯定，也沒有斷然否定，只是說「你們如果寫，也只能貼到黨委辦公室的門口」。意思是說，不能公開張貼。

在這前後，楊克明也見過張恩慈。楊克明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張恩慈的同事和朋友，社教運動前期的左派，剛剛從北大調到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工作，仍然住在北大宿舍。楊克明說打算寫一份關於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的申訴材料，請張恩慈遞送中央。張恩慈表示，現在向中央遞送材料的人很多，中央看不過來，遞了也沒有多大用處。楊克明打聽有關政治運動的消息，張恩慈說彭真確實已經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報》社、教育部已經有大字報了。

在這以後，大約5月20日或者21日，哲學系的幾位教員，楊克明、宋一秀、高雲鵬、趙正義和夏劍彘相約議論形勢。談話間，聶元梓來訪，也參加進來。幾個人談到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精神、近來的報刊批判文章，認為社教運動後期北京市委、北大黨委批判他們時所依據的觀點，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左派整風」等等，正是中央《五一六通知》批駁的觀點。北大黨委陸平、彭珮雲不久前傳達的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的報告，強調學校黨組織要加強領導、堅



楊克林提供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在校園裏貼出炮轟北大黨委主要領導人的大字報。圖為當時一呼百應的情況。

下午兩點左右，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的東牆貼出。

以上敘述依據聶元梓以外的六個人的回憶^①。他們強調，大字報是他們響應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所為，醞釀過程中向張恩慈打聽過消息，但是在貼大字報這一點上，沒有得到明確的支持，更談不上有人指使；實際上，大字報是由青年教師發起並執筆寫成的，聶元梓是參加者，而不是中心人物，沒有她的參加，大字報也會出台。張恩慈的回憶與這些教師的說法基本一致。

聶元梓的回憶也說大字報是楊克明等青年教員首先提議的，然而，她提出了一個其他人未曾涉及的關鍵性情節：大字報醞釀期

至最高權威性，這既不能脫離黨的制約的軌道，又不能通過當代民主政治的程序來加以抉擇或運作，而只能通過群眾中間自覺或自發的武力鬥爭來爭取，但沒有任何一個群眾組織達到了自己的目標。因為，武鬥的進程和結局往往不是由武鬥雙方的群眾所左右的，而是由上級當局及其指使下的外來群眾來仲裁，並進而收拾其殘局。武鬥中通行的格局是武鬥雙方各為一端，而上級當局又為一端。這種格局表明：不管文革的群眾組織及其武鬥對於當前社會秩序產生多麼大的離心力，它們最終會被高度政治化了的的文化制度所化解；進而還表明：儘管武鬥的主角是由群眾擔當的，但群眾在武鬥乃至整個文革中的命運卻不是自主的。

百日大武鬥提出的問題是：文革的群眾運動為甚麼只能由群眾的武鬥來收場？為甚麼對立的群眾組織只能以武鬥的兩敗俱傷或兩敗皆亡為自己的歸宿？可以說，這些問題既有它們生長所需的政治專制的土壤，也有它們一時「泛濫」所需的文化獨斷以及從思想到言行絕對排斥異己的傳統背景，更有它們天然的趨向暴力的本性，但是，決定這些問題的根源依然是群眾中間不同的利益、要求和目的。這些非常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利益、要求和目的，使得文革既不是一場純粹的意識形態的革命，也不是一場改換各級官員職權的政治變革。結合清華大學文革的特點來看，青年學生是其領導和群眾的主幹。這些狂熱反對舊權威的青年學生，造反之後還未來得及確立自己的權威，就靠自己運動的分裂而走向武鬥。當時，團派主要是由出身相當低下、文革前本人或家人經歷坎坷或急於想在文革中改善自己地位的激進群眾構成；而4派主要是由原清華幹部所影響和作用的、或文革前本人或家人處境較佳的相對保守的群眾構成，對於文革的許多方面有所疑慮。兩派的群眾基礎或群眾成分是如此的不同，他們就必然對清華的文革之發展帶來截然不同的作用，亦必定把打倒對方作為建立自己權威的首要條件，甚至愈到後期，同對方的鬥爭愈益成為關係着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同時，兩派都沒有料到武鬥的悲慘結局，沒有從武鬥

守崗位、遵守紀律等，實際是壓制運動，北京大學運動的方向違背了中央的精神^⑤。幾個青年人提議寫大字報，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聶元梓建議寫社教運動問題，但是年輕一些的教員主張要寫就寫現實問題，寫文化大革命。於是決定從宋碩報告入手，批判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

大字報由誰執筆？最初決定以趙正義的一篇現成批判稿為基礎，由宋一秀改寫。但是修改稿不理想，於是宋一秀重新起草，這是第二稿。接着，幾人又用大約兩個晚上討論修改文稿。討論中有人提議，問題應當提得更尖銳有力，鋒芒應當更犀利，要仿照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筆法，逐一駁斥對方觀點。因而推楊克明再作修改。

5月24日晚，楊克明在北京大學24樓112號房間高雲鵬的宿舍連夜趕寫。他對文章作了很大修改，幾乎是重寫，完稿時已是25日凌晨三、四點鐘。楊克明稍稍休息，天已大亮。他把稿件交給高雲鵬，就去電工所上班了。這是第三稿。

5月25日上午，高雲鵬、宋一秀、夏劍豸、趙正義和遲一步到達的聶元梓在北大24樓204號房間宋一秀的宿舍討論楊克明的修改稿，集體推敲，邊議邊改，逐句定稿。其中依照聶元梓提議修改了最後一段，並且加上三句口號：「保衛黨中央！保衛毛澤東思想！保衛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最後的定稿，由高雲鵬和夏劍豸各抄寫成一份大字報^⑥。

大字報的標題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甚麼？〉。文章通篇政治攻擊，其內容早已是眾所周知，這裏不再贅述。聶元梓是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故第一個簽名。接下來是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當時不在場，由高雲鵬作主代簽。討論臨近結束時，趙正義去哲學系辦事，委托宋一秀代簽。再往下是高雲鵬。六個人簽完名以後，宋一秀叫來哲學系青年教師李醒塵，說明情況。李醒塵欣然簽上最後一個，即第七個名字。1966年5月25日

間她見過康生的夫人、調查組組長曹軼歐，並且得到了曹軼歐的支持。

聶元梓說：楊克明提議寫大字報，她覺得不錯，但是考慮到要請示上級。與楊克明商議後，她通過張恩慈與曹軼歐取得聯繫。曹軼歐在調查組住地與她見面，當時還有楊克明、張恩慈和曹軼歐的一個秘書在場。聶元梓沒有提大字報要寫甚麼，只是問：「能不能給北大黨委書記陸平貼大字報？」曹軼歐說：「能。」又說，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綱領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學習《五一六通知》。聶元梓回憶說，她和楊克明聽到曹軼歐的答覆後很高興，回到學校又告訴了其他人，他們也很受鼓舞^⑧。

對於聶元梓所說面見曹軼歐一事，大字報的其他六位署名人以及張恩慈無一例外地說不知道。楊克明和張恩慈斷然否定聶元梓稱會見時他們在座這一點，並且表示氣憤和無可奈何，他們說聶元梓在編造假話^⑨。

對於相互衝突的回憶，筆者認為：聶元梓完全憑空捏造的可能性不很大，而其餘的人也沒有必要在近三十年裏串通一氣，否定事實^⑩。比較大的可能性是：聶元梓見過曹軼歐，並且討回一個「能」寫大字報的「上級精神」，但是其他人沒有參與，也不知情。聶元梓與其他當事人的回憶雖然存在矛盾之處，但是都說明大字報的發起和醞釀是北大教師自主進行的，而不是康生或其他人指使的。

三 毛澤東的決策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北京大學就出現了一千多張大字報，最初多為支持聶元梓的，但是維護校領導的大字報很快佔了上風。以後幾天，很

多人指責聶元梓等人是反黨的大陰謀家，是鄧拓「三家村」的忠實衛士^⑩。

5月25日，大字報貼出後幾小時，高教部部長、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來到北京大學。接着，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負責人張彥、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先後到北京大學，重申中央關於運動中貼大字報要「內外有別」的精神，傳達了周恩來的補充指示，要求嚴格遵守黨和國家的紀律，內外有別。北大黨委當夜緊急召開全校黨員大會，傳達中央和華北局領導的指示。領導人批評的着眼點是公開張貼大字報違背了「內外有別」的精神。李雪峰提出可以將大字報撕下來，或者用新的大字報將之覆蓋起來。他們雖然沒有反對貼大字報的形式，也沒有評論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的內容，但這已經足以使大字報的作者陷入被動^⑪。

調查組的張恩慈在大飯廳看到大字報，才知道這些昔日的同事有這麼一個舉動。他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找到大字報的作者了解情況，索取了大字報的抄件。又一日，深感政治壓力的楊克明問張恩慈：「我們寫的大字報到底有沒有問題？」很快，張恩慈打電話給楊克明，提出領他去見曹軼歐。兩人來到西頤賓館曹軼歐住處，曹軼歐看過大字報底稿以後表示，這張大字報沒有甚麼不對。她詢問了楊克明的年齡、工作，並對楊克明說這種事情要謹慎。大字報的底稿留在了曹軼歐處，是楊克明在5月25日早晨交給其他人討論的那一份原件，上面有聶元梓和其他人修改的筆迹^⑫。

正當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遭到反擊的時候，康生向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報告了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情況^⑬。毛澤東在6月1日中午見到大字報的內容，馬上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要求在電台廣播，並且寫了如下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打破。」^⑭當天下午四時，這個批示從杭州傳達到康生、陳伯達手中。毛澤東還說：這張大字報是二十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

義更大。康生找了王力、關鋒和曹軼歐，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求他們按照毛澤東的精神寫一篇評論員文章^⑩。

當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各地聯播節目中播發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內容。6月2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篇評論員文章的重要之處是傳達了這樣的信息：毛澤東的指示、他本人的思想高於黨的組織紀律；號召人們打破原有紀律的約束，向任何反對毛澤東的人進攻，不論其職位有多高、資格有多老。

兩個月後，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寫到：「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同一天，毛澤東為這篇評論寫了如下一段批語：「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從這兩段文字不難看出毛澤東為甚麼如此看重並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他要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運動，超越正常組織機構、制度、紀律的約束，衝擊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司令部」、「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解決以往運動及常規運動方式沒有解決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毛澤東有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講話：「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⑪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正是提供了毛澤東所期待的，從基層發動群眾衝擊「走資派」的樣板，廣播這張大字報就是向全國推廣這種運動形式。事實表明，全國性自下而上衝擊當權派和學術權威的群眾運動狂潮，正是從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開端的。

四 結論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涉及三部分人：聶元梓等北京大學的幹部和教師、康生和他下屬的曹軼歐等人以及毛澤東。

這張大字報是由聶元梓等人發起，而不是受人指使寫成的。促使他們寫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領導的直接原因是：第一，在一系列政治運動，特別是在社教運動中被激化的北京大學黨內矛盾。聶元梓等人在社教運動中因為左的錯誤被批判以後不服氣，力圖翻案。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更廣大的社會政治背景。

第二，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號召。1966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已經傳達到基層並且被廣泛宣傳。在敏感的文化教育界，不少左派已經醞釀行動，例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的吳傳啟等人於5月23日貼出大字報，攻擊學部領導人楊述。教育部也有人寫了大字報。北京大學大字報是當時政治運動和思潮的產物，它在醞釀過程中也從調查組得到了信息和支持。

康生以及曹軼歐的作用主要有：第一，促進和支持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⑧。曹軼歐及其領導的中央理論小組調查組在大字報貼出前後對發起者表示了支持，這對促進大字報的出台和穩定作者們的信心至關重要。

第二，康生不失時機地向毛澤東呈報大字報的內容，對毛澤東及時了解大字報並進而決定支持大字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澤東關於大字報的指示，最初也是通過康生傳達的。

曹軼歐確實在北大發動陳守一批判黨委，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康生策劃聶元梓等人寫大字報。不僅如此，根據王力回憶，康生對聶元梓的看法很不好，常在中央文革小組講聶元梓的壞話^⑨。應當客觀地說，康生、曹軼歐促進了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問世並且支持了它，但不曾策劃或者指使聶元梓等人寫大字報。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也是決定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命運和歷史作用的人。北京大學對全國文化和政治具有傳統的影響，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示範作用，是非同一般的。毛澤東深知這一點，他盛讚大字報的真正動機，是把它當作發動群眾運動的重要步驟。聶元梓等人寫大字報是針對北大黨委書記陸平等人的，至於大字報貼出以後造成全國性的影響，成為「天下大亂」的起點，從根本上說，是由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戰略決定的，是作者們始料不及的。

基層矛盾的激化、康生等文革派人物的推動、毛澤東的政治需要和決策，是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出世的三步曲，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常見的群眾性樣板產生的模式。

最後應當說明，本文是依據現有資料，特別是口述資料，對有關歷史事實的初步考察，相信隨着檔案文獻的公開以及資料的豐富，事實會得到進一步澄清。

註釋

①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348。

② 《北京日報》記者林浩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是怎樣出籠的——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北京日報》，1981年1月9日。收入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記實》，第1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這是記者對原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的訪問記，未提供詳細資料來源。

③④ 康生在1967年1月22日的一次講話中說：「關於我愛人（曹軼歐）的問題，是五月份，我愛人等五個人組成了一個調查小組，目的是調查彭真在學校搞了那些陰謀和發動左派寫文章，根本與工作組沒關係。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就是當時在我愛人他們的促動下寫的。」見首都大專院校

文革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紅衛兵代表大會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參考材料》，第32輯（1967）。當時康生為自己擺功勞，也只說是「促動」。關於調查組的任務，又見註②以及王力回憶。

④ 陳守一：〈歷史是公正的——北大教授憶「文革」〉，《中國研究》（香港），1995年秋季號。

⑤ 宋碩的報告是傳達中共中央華北局的指示。華北局已經在5月11日進駐北京市委，彭真被停止了工作。見〈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5年11月—1976年10月）〉，刊於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北京黨史資料通訊》，1987年5月，增刊。

⑥ 據回憶，大字報原準備張貼在兩處。後來貼出的是高雲鵬抄寫的一份，因為第一張立即引起廣泛注意，夏劍勇抄寫的另一份就沒有貼出，事後被中國革命博物館作為文物收藏。

⑦ 依據筆者1993年對宋一秀、高雲鵬、夏劍勇、楊克明、趙正義，1995年對李醒塵的訪談。

⑧ 根據聶元梓1994年7月的口述回憶。

⑨ 1995年楊克明得知聶元梓此說後，表示他根本沒有與聶元梓商議去找曹軼歐，更不知道有這麼一次會見。他說：「也許聶元梓自己去見過曹軼歐，但是為甚麼硬要說我在場呢？」張恩慈在1994年11月的回信中說，聶元梓稱通過他聯繫去見曹軼歐、同曹談話時他在場等等，都是聶元梓編造的假話。

⑩ 除聶元梓外，大字報的其他簽名者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現在是教授、副教授，有的已經退休。他們十分負責地說大字報是他們自己發起的，沒有人指使。宋一秀說，在文革期間和文革以後他三次向上級寫材料、匯報或者交代大字報產生的經過，從來都是這樣如實講的，有案可查。而聶元梓1994年回憶中有不少明顯的歷史事實的錯誤，如把「中央理論小組」說成「中央文革小組」等，可能是誤記。她說她與曹軼歐見面的情況多年前在公安局時就已經講過。

⑪ 參看北京大學哲學系宋一秀等六人：〈搗毀北大「三家村」黑幫的反動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堡壘》，發表於《解放軍報》，1966年6月4日；北京大學工作組編：《大字報選編》（二），1966年6月18日；以及大字報發起者在1993年的回憶。

⑫ 李雪峰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學的講話，見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匯編》（北京，1966），頁667。又見註②。

⑬ 根據楊克明和張思慈1993年的回憶。

⑭ 據王力回憶，陳伯達通過《光明日報》的內部簡報也將北京大學的情況稟報毛澤東。

⑮⑯ 據王力回憶。又據毛澤東1967年2月3日接見阿爾尼亞領導人卡博·巴盧庫時的談話。毛澤東的批語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30。

⑰ 轉引自林彪在中共九大上的政治報告，《人民日報》，1969年4月28日。

⑱ 王力還回憶說：「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吸收革命師生代表列席，江青提議安排聶元梓，康生提議楊克明，曹軼歐說大字報主要是楊克明寫的，結果彼此妥協，安排了聶、楊兩人列席。」王力說：「有人講大字報是曹軼歐組織的，這一點影子都沒有。」以上根據筆者對王力的訪問。王力的回憶亦見：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26-27；王力：〈「文革」第一年〉，刊於《傳記文學》（北京），1995年第5期。

版權材料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王友琴

美國斯坦福大學亞洲語言文學系

一 題目和背景

本文將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國學校裏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如果不從道德是非及進步原則出發，而僅僅以生活變動的劇烈程度來衡量，那麼這個事件確實可以算是「革命」。事實上，這也是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1966年夏天，中國的報紙每天熱烈支持並大版報導當時「革命學生」和「紅衛兵」的活動，但是，對學校裏正在發生的大量暴力行為甚至打死人事件，卻從不報告，隻字未提。

1978年後，報紙雜誌刊登了一些在「文革」遭受迫害而在「文革」後平反的人物的文章，但他們多為高級幹部或知名人士。至於在「文革」中被打的老師，雖然人數很多，但社會地位不高，所以在「文革」後也輪不上被報紙報導。

在現已出版的兩本長篇「文革」通史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僅

* 在這裏，我向所有的被訪者表示感謝，他們花費了寶貴的時間來作這種恐怖而痛苦的回憶。特別要感謝王晶堯先生讓我閱讀他的材料，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後調查情況、收集材料並冒險保存下來，他對妻子和歷史的忠誠精神令人欽佩。也特別感謝John Kieschnick，是他幫助我作了在計算機網絡上的調查，並對本文的寫作給予鼓勵。

僅記述了1966年8月下旬後學生紅衛兵在學校外的暴力行為，卻未提8月初就開始的在學校內的大量暴力行為^①，於是也就未能說清暴力行為如何在學校內先興起並蔓延到學校外的過程。另一本《大動亂的年代》，只是簡單地談到1966年夏天中國學校裏的情況：「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凌辱者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干教師被剃了陰陽頭。」^②作為數量詞，「若干」顯然少於「萬」，照此讀來，剃「陰陽頭」似乎就算當時「凌辱」中的最壞情況了。但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

本文試圖寫出這一段不該為人所忽略的歷史。

二 材料和來源

幾年來，我向一百多位「文革」經歷者詢問他們是否知道當時學校裏發生過學生打老師的事情。除了面談，還在計算機網絡上作了問卷調查。被訪者大多是1966年的在校學生，有一些則是當年的老師，少數幾位是被打死或被嚴重打傷的老師的直系親屬。在當時的在校學生中，大部分是中學生，也有大學生和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

據這些被訪者說，他們不知道在「文革」中究竟有哪個學校的學生是沒打老師的。就我調查所得的76所學校名單中，在「文革」期間都發生過學生打老師的事件^③。

被訪者提供的見證的可靠性如何呢？這些被訪者大多屬於不被准許或者不願意參與打老師的學生。他們是目擊者，但對整個事件可能了解得不夠深入或全面。至於那些打過老師或牽涉較深的人則不願談此話題，甚至根本拒絕談話。這些知道細節最多的人不能提供細節。挨過打的老師也大多不喜歡回憶「文革」，因為覺得實在太痛苦、太羞辱，他們有意無意地忘卻這段經歷。比如，1966年強迫「專政隊」裏人唱的「牛鬼蛇神歌」，幾位相當聰明、「文革」後在專業上也

有新成就的老師，都告訴我不能憶及歌詞全文，儘管他們當年被迫每日必唱，他們埋葬了他們的記憶。本文所錄的歌詞和歌譜，是由一位1966年的初中二年級學生提供的。至於被打死者，他們再也無法說話。在這種情況下，本文所記，可能比實際情況有所減輕而不是誇大，只有大量遺漏而無增添。

除此以外，我的另一材料來源是私人收藏，如當時手寫的匯報，群眾組織油印鉛印的「大字報選編」、「大事記」等。另外，我系統閱讀了當時的正式公開出版物，主要是《人民日報》。

因此，本文是由被訪者的口頭敘述，實錄性資料，以及當時的官方出版物三者相結合、對比、印證寫成的。

三 學生是怎麼打老師的？

(1) 規模和程度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發起「打黑幫」，那天打鬥了三位副校長（當時正校長缺）、一位教導主任和一位副教導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強迫挑重擔子之後，又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在大約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失去知覺，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儘管醫院就在學校對門，但她卻在兩個小時後才被送去，那時人早已死了，而其他四位老師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學生活活打死的老師，死時50歲，已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④。

在這以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就已打了校長，強迫她敲着破臉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光，然後將她打得頭破血流，並要她在地上爬。1966年8月4日，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發起批鬥學校領導人。他們在操場上押着當時所謂的「黑幫」繞

圈子。有人朝他們身上灑墨水、給他們戴高帽子，甚至有人動手打他們。北大附中和四中是北京兩所有名的中學，打人的消息馬上就傳開了，其他學校起而仿效。師大女附中打得略晚，但卻打死了人。

1966年8月17日，北京101中學學生打死了其時被判監外執行徒刑的美術教員陳葆昆，有學生燒他的頭髮。他被打昏後又被扔進噴水池，面朝下淹死。同時，學生還打了十來位老師。這些老師被強迫在煤渣鋪的路上爬，膝蓋流血，一邊爬，一邊被打。其中女老師的頭髮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當時稱為「陰陽頭」。

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學生打死了學校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姜培良，打的時候強迫他14歲的兒子打父親，還有人叫「拿鹽去」撒在他傷口上。校長高雲的額頭上被按了一排圖釘，站在烈日下被學生潑開水。還有一位語文老師被打裂了肝臟隨後死去。一個學生的母親也被打死，因為她給兒子的一封信被同學看到又被認為是「反動」的。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校長被銅頭皮帶打得滿身是血，一位副校長曾被初中二年級的一個班的學生排隊每人用皮帶抽幾下。被紅衛兵裹脅在內的這個班的學生不敢不打。學校女共青團團委書記被打瞎了一隻眼睛，一位化學老師被打後從煙囪上跳下來自殺身亡。

在北京中山公園的音樂堂裏，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學生聯合批鬥校領導，學生在舞台上掄開銅頭皮帶打被鬥者。他們口頭批判一陣，喊一陣口號，掄一陣皮帶，如此輪番進行。在這座音樂堂裏，北京東城區的一些幼兒園老師也挨了鬥和打。

1966年8月24日，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了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等十多所中學的紅衛兵到清華大學，撕去了他們認為是「右派翻天」的反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後，強迫清華大學「專政隊」裏的學校領導和教授拆掉石頭建的老校門，並開始在那兒抄家打人。比如，打了清華無線電系的書記、主任、教授，血流在地上，有人還在血迹旁畫了一個大圈，寫了「狗血」兩個字。那一天，他們還抄了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的家，撕了他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的書和畫。大學裏原先已有武鬥現象，但不如中學厲害，所以這一次是中學生去大學校園打。

在小學，學生年齡最大的是13歲左右。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班主任被學生逼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學學生用皮帶抽了四位女老師，又把她們的頭髮剪去一半。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被打死。

在首都之外的天津南倉中學，學生給老師頭上戴字紙簍，往他們的襯衫上打黑叉，女教導主任的頭被剃得像洗衣服的搓板。上海復興中學，學生用榔頭打老師的頭，其中一位老師的頭蓋骨被打裂；上海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被學生用一些圖釘把大字報釘在她背上，還強迫她在掃廁所時吃屎尿。在揚州市灣頭公社小學，學生們交流怎麼用皮帶抽人的經驗。

(2) 起源和蔓延

第一階段：從罵到打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的一張大字報，稱北京大學校長等人為「黑幫份子」。6月2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稱北京大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隨後，很多學校開始模仿北京大學貼大字報。6月3日起，中共中央派「工作組」往各大、中學校，以取代原來的學校負責人領導學校的「文革」。

「工作組」讓學生停了日常課程，揭發批判學校的「問題」。1966年6、7兩個月裏，「工作組」把各學校和學校裏的老師，特別是領導人，劃成四個類別。第四類就是運動的重點打擊對象。運動的主要方式是大字報揭發和開批判大會，教師被迫集中交代問題。部分學校有一半以上的老師都被大字報點名。很多老師被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或被罵作「豬」、「狗」（見「大字報」抄件），不允許自我辯護，也不允許質疑批判所用的準則。同時，運動重點對象被罰勞動，和其他人分開，等候最後處理。

但是，「工作組」在理論上不許學生打人。1966年6月10日、11日，清華大學一些學生成立「打狗隊」，打「狗」即打人^⑤。6月18日，北京大學一些學生設「鬥鬼台」，60多個「黑幫份子」被戴高帽子、罰跪等。這些事後來都被「工作組」反對。

這一時期中學的打人情況，可見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在1966年6月29日寫給上級的信。她在信中說，6月21日，「工作組」召開「揭發批判大會」，在會上，「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用繩子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插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見卞仲耘的信的底稿）。這一描述當為可信，因為她當時已被「工作組」劃成「四類」，在當時情況下，寫信人絕對不可能誇大。6月下旬，該校中四（三）班貼在她家門口的大字報說：「豎起你的豬耳朵聽着，你再敢胡作非為，千刀萬剮了你。」（見抄件）。

第二階段：從打到打死 1966年7月28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北京市委作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適用於中等學校）^⑥。毛澤東批評「工作組」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於是，一些學生開始自己開批鬥會，公然大打出手，打傷甚至打死老師的事件發生了。在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學生打死人後，該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學生負責人當天晚上到北京飯店當面報告給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⑦。吳德如何上報給更高級的領導不得而知，但是以後未見他們採取任何措施制止，打人繼續升級和蔓延，於是便出現了上節所描繪的情景。我們現在不知道全北京有多少老師在1966年8月被打死，只知道僅北京西城區（這是位於市中心緊靠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區），就有7個中學校長被打死。

第三階段：從校內打到校外，從北京打到全國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⑧。這時，北京的學生已經從校內打到了校外，作家老舍就是在

8月23日被中學紅衛兵毒打後自殺的。其時距卞仲耘老師被打死已經有18天。當時北京的中學裏流傳一句話：「打死個人，叫家屬拿28塊錢就是了。」——這是火葬場的價錢。到底學生打死了多少人呢？根據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僅1966年8、9月的統計，在北京被打死的有1,772人，被抄家的有33,695戶。但是報紙只提到這個數字，並未說及死者的詳情。

打人風傳往全國。北京的紅衛兵到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到北京，進行「串連」。比如，8月11日，一些北京的紅衛兵來到上海外語學校，把那裏的「牛鬼蛇神」揪出來打。8月12日，此校的學生已學會了打這些「牛鬼蛇神」，剃他們的「陰陽頭」，並叫他們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學的一名前紅衛兵說：

北京紅衛兵南下，穿着軍裝，繫着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裏怎麼這麼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甚麼。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麼抽人。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北京紅衛兵的樣子。

從本文註釋③所列的學校名單可以看出，從較小的縣城直到人民公社，都發生了打老師和校長事件，但一般比北京來得晚。1966年底，在江蘇揚州灣頭公社中心小學，學生先鬥了校長，剪了「陰陽頭」。副校長張筠也不能倖免，她白天被拉出去鬥，晚上被關在一間教室裏不准回家，在除夕前她告訴丈夫說：「我被打得受不了。」第二天，也就是除夕那天，她投河自殺。

(3) 「打」法

(1) 戴高帽子遊街。這是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描述的鬥地主方式。這篇文章收在文革中非常普及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中，很多學生都讀過④。

(2) 拳打腳踢棍子打。

(3)「坐飛機」，後來又叫做「噴氣式」，是「文革」的發明。鬥爭會上，被鬥者彎腰九十度甚至更多，兩臂後舉，形似噴氣式飛機。

(4)用帶銅頭的皮帶抽。當時紅衛兵的標準裝束是臂纏紅袖章，一身黃軍裝，外束皮腰帶，在北京又稱「板帶」。用皮帶抽人，上面的銅頭可以造成嚴重創傷，有人的眼睛被銅頭打瞎。

(5)掛牌子。在被鬥者脖子上掛一大牌子，上寫「反革命黑幫」、「反動學術權威」，下面是此人的名字，名字上用墨水打一個大叉。

(6)剃「陰陽頭」。這是另一項「文革」發明。學生把老師的頭髮剃去一半，留下一半，故名「陰陽頭」。特別被用在女老師身上。

(7)建立「勞改隊」，又稱「專政隊」、「牛鬼蛇神隊」。被打入此隊的老師要在烈日下幹髒重活兒、掃廁所、掃街等等。

(8)唱「嚎歌」，又名「牛鬼蛇神歌」，強迫「牛鬼蛇神」唱，因為他們不被當人，所以不是唱是「嚎」。「嚎歌」的詞和曲如下^⑩：

1 5 1 2 | 3 1 | 1 5 1 2 | 3 1 |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
0 0 0 0 | 0 0 0 |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 2 1 | 3 3 2 3 | 5 5 |
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
6 5 3 3 | 2 2 |
我要低頭認罪
3 3 2 3 | 5 5 | 6 5 3 3 | 2 1 |
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3 3 3 2 3 | 5 5 | 6 5 3 3 | 2 1 |
我要是亂說亂動，把我砸爛砸碎，
5 5 6 6 | 0 7 7 | —— ||
把我砸爛 砸碎。

紅衛兵強迫那些被打入學校「專政隊」的人唱，唱得不好就打。據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說，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學的一個學生在1966年8月作的，後來迅速流傳到各學校，以至全國。

(9) 抄家。成群闖進老師的家，拿走老師的私人財產，特別是書籍。把老師的日記、私人書信，乃至情書等，拿去公布並上綱上線批判。

上面九種方式，在上述的學校中曾普遍發生。此外，各校還有不同的手法，比如用開水燙、用屎尿澆、用火燒、往身上倒髒水，讓「牛鬼蛇神」站在架高的桌子椅子上，然後推倒桌椅使其摔下，等等。有些學校，比如北京第六中學還自設刑室。北京景山學校的一名紅衛兵說，他們曾因打人不夠狠而被組織去北京第六中學參觀學習這個刑室，她看到刑室的地上血迹斑斑，牆上用血寫了「紅色恐怖萬歲」。

(4) 誰被打？

從1966年6月初開始，大學和中學教師隊伍就整體地被列為運動對象。當時學生對老師的態度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學生見老師不再問好，有的直呼全名，甚至用帶惡意的稱呼。在1966年6、7月間，若有學生客氣地說話，老師就有受寵若驚之感。大字報可以亂罵任何老師。在8月之後，老師甚至學校的工友，成了隨時可能挨罵挨打的人，他們無處尋求保護。

但是並不是所有老師都被打。被打的主要有三種人。

(1) 學校的負責人。比如，上面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八五」慘案，除了一名管總務的副校長和一名總務主任外，其他五名校級負責人都被毒打，罪名是「反革命黑幫」。

(2) 業務強、有經驗、教書教得好的教師，當時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3) 個人歷史或家庭出身「有問題」的，或在1957年「反右」時被定了甚麼的老師，儘管事實上文革前的多次政治運動，已經清洗了教師隊伍。

這三種被打的人，是由當時的大政策決定了的。但是，所謂的「黑幫」和「資產階級權威」，在當時有此新名詞而沒有明確定義。因此，在中學裏，年齡40歲以上，月薪100元以上的老師，就很可能被打。

當時《人民日報》社論用「牛鬼蛇神」一詞指稱「敵人」^①。至於甚麼是「牛鬼蛇神」，並不曾有明確的定義。但是高帽子、黑牌子、「嚎歌」、「陰陽頭」，弄得被打的老師看起來確實有如「牛鬼」、有如「蛇神」。

不過，對個人來說，被不被打也有相當的偶然性。因為地位只是相對的，一所較大的學校的一般幹部或教師，到了一所較小的學校就可能成為第一負責人或業務尖子，儘管級別不高，亦會被打。另外，據被訪者們說，老師還因各種不同的原因被打。有的老師被打，是由於給某個學生不及格，而這個學生又恰恰是打人的活躍份子。有的則因曾得罪學生而被打，北京第十五中學的一個學生把一個女老師打得慘叫着滿地爬，原因是這個老師曾在一次代課時批評這個學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個工友平常對學生較兇，也被打得起不了牀。南京外國語學校有一位老師被打，是因為他信教。有的老師長得漂亮，比較顯眼，遭人忌恨，於是被打。有的老師長得醜陋，看起來像電影上的壞人，也被學生打。

面對皮肉之苦和人格污辱，老師們不能作任何反抗的行為，否則馬上可能被打死。他們怎麼辦？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一位教授說，他被拖去遊街時，「我告訴自己這是胡鬧，總會過去，不必介意」。廣州第二十五中學的一位老師說，他一向喜歡運動，有點武功底子，學生打的時候，他往下一蹲，兩手把腦袋一抱，運運氣，任憑學生打，總算傷得不厲害。

物理學教授、畫家孫菊生說，1966年他在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當過「勞改隊」第三隊副隊長。這所大學是比較小的，可是「勞改隊」裏面還至少有三個分隊之多。他的姐夫是北京鋼鐵學院的教授，

在鋼鐵學院裏挨打挨鬥。他的姐姐逃到他家，正逢附近中學的紅衛兵在打孫菊生，就把孫的姐姐打死。究竟有多少老師那時被打呢？據有的被訪者估計，不算那些挨過零星幾腳幾拳的老師，在「文革」中「正式」（找不到更合適的詞）進了「專政隊」被學生當做「敵人」打的，約佔整體老師數目的10%左右。有的認為比例高於此數。

(5) 誰打？

從1966年6月開始，學生要罵老師「黑幫」、「反革命」，儘可以罵。8月以後，甚至可以隨便打。罵和打在當時都被看做「革命」行為，法律已不起束縛抑制作用。雖說老師們可以被隨便打，但只有學生中的紅衛兵才真正具備參加集體性打人的資格。

打人是一種「革命」特權。據在1966年時是北京朝陽區一中學學生的一位被訪者說：「我媽媽是革命幹部，可是我爸爸1957年當了右派，他們不准我參加紅衛兵，鬥人抄家也不能去，當時覺得很遺憾。」當時的紅衛兵規定，只有「紅五類」子弟才能參加這些批鬥活動。這「紅五類」是革命幹部（北京曾規定1945年以前參加共產黨的幹部才算）、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

一些被訪者說，那時各校出現了一批「打手」，他們到處打，從中得到很大樂趣。其中有的專門管「牛鬼蛇神隊」，威風十足。這些「打手」不一定是紅衛兵組織的最高頭頭，有的大頭頭不動手，但也不制止下面的人打。這些「打手」中，有一些原來就性情兇狠，但也有一些平日在家裏或學校顯得壓抑，這時一反常態，比別人更殘酷，其中的心理原因值得探究。

有相當一些女學生掄皮帶抽人，打得很兇。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牛鬼蛇神」站成一排，女紅衛兵用錘子挨個兒敲他們的頭。從註釋③的學校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幾所女校，也就是說，由女學生打死了老師。甚至在男女合校的中學，據一位目擊者說，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大打校長時，主打的是女學生。

另外，據有的被訪者說，初中二、三年級的學生打人最兇，不知是否和年齡有關。他們當時不過15或16歲。

據被訪者說，在北京、上海、南京、廣州這些大城市裏，幹部子弟多的中學打人最早也最兇。比如，北京的師大女附中，上海的復興中學和南洋模範中學等皆是。

在大多數情況中，打人是集體打的。很多人一起動手，或者一撥接着一撥打。學生人數是老師的十幾倍，只要其中一小部分動手就足以傷人。

也有一些不是「紅五類」又不是「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比如因父親加入共產黨晚於1945年而當時不被算作「革命幹部」出身的，故而未被准許參加紅衛兵，在紅衛兵打人時，他們也去加入或幫忙。但一般是不被允許的。

「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那時被稱作「狗崽子」，有相當一部分被打了。

從被訪者中，曾聽到老師的孩子打自己父母的個案。在上面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一個初一的學生被迫打父親姜培良。在很多學生紅衛兵打他父親時，他也用棍子一起打。父親被打死後，兒子因受刺激太大而致精神失常。據一位在1994年曾看到他的被訪者說，他仍然癡呆，不能從事正常的工作。

學生把老師整體性地看做運動對象，所以老師一般不被允許參與打老師，但是據幾位來自不同學校的被訪者說，也有老師挑動學生打別的老師，以報私忿。

縱觀「文革」中發生的學生打老師，可見以下特點：

第一，殘酷 有人可能會說，1967、1968年在各省發生的群眾性兩派「武鬥」，死人更多。但那些武鬥至少是雙方互打的，可以反抗，也可以退出。而1966年的學生打老師，老師不能還手，甚至也不能哀求投降以保性命。

嘛。」^③雖然從當時公開發表的文字上，我們沒發現毛澤東說過要打人，但是打人是他引導和鼓勵的結果。

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是：即使對於毛澤東宣稱所要的「奪權」和「教育革命」來說，打老師也無必要。手無寸鐵的老師們猶如一群羔羊，那麼，為甚麼還要打他們呢？為甚麼要折磨他們甚至把他們打死呢？

上面寫到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副校長，在被打死的前一天，已經被學生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捅傷，她回家說：「他們打死一個黨員，一個教員，不過像打死一條狗。」她束手待斃，但是留下了一個解釋。有些被訪者認為還是可以從毛澤東的革命需要的角度找到原因的。通過年輕學生這種非常殘酷的行為，就能徹底摧毀原有的社會法律秩序和道德觀念，不久後國家主席劉少奇也是在未經審判就關押的情況下被虐待至死。

早期紅衛兵的一段地位大顛倒的經歷，也可說明最初打老師對後來打「走資派」的直接功能。在北京的學校，幹部子弟最早發起紅衛兵組織及開始打人，但幾個月後，當這些人的父親，即所謂「當權派」也成了「革命對象」時，打人的手段似乎就被順勢用到了他們父親的頭上。

然而，為甚麼中學生比大學生在打人時來得更嚴重和殘酷？有人認為還有別的原因。

(2) 紅衛兵組織的作用

當時打老師多發生在群眾性的場合，是很多人一起打的。由一個或數個人發起，更多人一齊湧上。打死了人，是大家打死的，不是某個個人的責任，加上事後無人追查，所以打的人有恃無恐，越打越兇。如果沒有紅衛兵組織的出現，這種集體打人事件是很難發生。

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是先在中學出現的，而且一開始就很具侵犯性。1966年6月2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貼出的第一張大字

第二，普遍 1966年的學生打老師，在我調查所及的學校中都發生了，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例外。

第三，特殊 在教育史上，在法律史上，都無法找到可比的現象。

四 發生的原因：文革經歷者的解釋

學生打老師，事出有因。被訪者指出直接的發生原因主要有：

(1) 毛澤東的引導推動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裏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人民日報》1966年8月1日發表了這些話）。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通知」，是「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在毛澤東寫的段落裏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② 6月1日晚廣播北京大學的大字報是毛決定的。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學生給被鬥人戴高帽子，並動手打人。北京大學「工作組」當天寫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將學生的行動稱為「亂鬥」。6月20日，當時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批准轉發這一簡報，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但是毛澤東在7月28日決定撤了工作組。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發文件撤銷6月20日的文件，說那是「錯誤的」^③。

在紅衛兵打死老師發生之後，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第一個打死老師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了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後說：「要武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甚麼人，不管他打着甚麼旗號，不管他有多麼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⑩這還僅僅是語言上的「砸」。

7月1日，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紅旗戰鬥小組」邀請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去北大附中一起慶祝共產黨的生日，全體學生都到了會場。在會場上，用一道糾察線把「紅五類」出身和「黑五類」出身的學生隔開，後者坐在最後面。這是在學校裏從未出現過的。後來，北大附中在「工作組」撤出後最早大打老師。7月底8月初，紅衛兵組織在北京各校普遍成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的對聯迅速傳開。這種以家庭出身為組織成員首要條件，是很特別的。當時紅衛兵的領袖和早期成員很多是高級幹部子弟，而打人是一種特權。紅衛兵打老師，打「牛鬼蛇神」，也打「出身不好」的同學。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個女兒，在她父親後來被打倒以後，有人問她是否在1966年8月打死了3個人，她回答說：「那時候打死人光榮，我就吹牛說打死了3個人。」1966年她14歲，打死人是她那時「吹牛」的內容。

從一開始，「紅衛兵」名稱的意思就是「保衛毛澤東」。毛澤東沒給他們甚麼物質利益，但給了他們生殺予奪之權。紅衛兵的行動曾被稱為「造反」，實際上卻是在最高權力者的支持下迫害、虐待那些任憑凌辱宰割，死也不可以還手的老師和同學。

1966年的「紅衛兵」，具有三個特點：狂熱的領袖崇拜、以一種先天條件為接納成員標準、以及暴力行為，這三者之間是否有一定的聯繫，實在是需要研究的問題。從希特勒的青年組織也可看到這三個特點。這種相似說明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可能具有相當普遍的意義。

(3) 人性惡

有的被訪者認為以上兩項不能構成學生打人的充分條件。學生打人的手段，全是沒有人教過的，可是卻如此殘忍。打的後果如此可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怕，打人的卻毫不在乎。當時的中學生年齡在14-19歲之間，大學生20-25歲，都已受過7年以上教育，大多高於中國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數，不能用「無知」來作藉口。在打人時提出的被打者的「罪行」，即使按照當時的荒唐標準，也遠不能落實定案，但是一些學生大打出手，顯然是他們自己要這樣作。他們用別人的痛苦和生命來換取痛快，發泄自己的惡氣，渲染自己的革命形象。「文革」前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確有緊張之處，比如有的學生考試不及格，有的學生被老師批評。但是，因此藉「文革」之機打老師，這樣報復實在太過分。這些案例都可成為「人性惡」的例證。這也許可以解釋為甚麼中學生打得比大學生厲害，他們因受教育少而可能保留了更多與生俱來的東西。

不過也有人認為這種解釋太一般化，對於說明一個特別的歷史現象難有太大幫助。

五 打老師之後

1966年8月20日左右，打人風從北京的學校蔓延到社會，被打的人從老師擴大到各種人：「地、富、反、壞、右」、演員、作家、民主黨派成員，以至共產黨的各級當權派。同時，「大串連」把打人風帶到全國。

在1966年被打的老師，如果不是「當權派」而又沒有別的問題，在1966年11、12月間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就被允許離開「勞改隊」；如果是，則不能。北京第五十二中學打死一名女教師，北京第六中學打死一名工友的事，曾在1967年2月的群眾自辦的小報上遭到譴責^⑥。但是被打死的學校領導人或被認為「有問題」的人長久不被提起。12年之後，根據1978年夏天的《北京日報》報導，那時候一些區、縣為被打死的校長們開了昭雪大會或追悼會^⑦。這時有死者家屬

要求法院追查懲辦與打死人有重大關係者，但卻被告之「已過追訴時效期限」^⑤。

1968年開始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老師再次成為運動重點。但是這次不是由學生自己組織，而是在「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領導下進行的。清華大學整老師的「經驗」傳到全國，是當時所謂「六廠二校經驗」的一部分。打人的事情仍然發生，只是一般不像1966年8月那樣公然地在很多人面前大規模地進行，而是常常個別施用。清華大學電機系的一位教授被用布條蒙起眼睛打。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1966年「八五」慘案的倖存者胡志濤副校長被學生輪流連續鬥過48個小時，不准她睡覺，逼她「交代問題」；3位老師自殺身亡，其時都在40歲左右，最年輕的一位僅35歲。在江蘇儀徵實驗小學，除了校長，有7位老師因「黑五類」出身等原因挨鬥挨打，其中有一位剪喉管自殺，剪斷聲帶，未死致殘。

被訪問者中有一位說，在她住過的北京農業大學教工宿舍9號樓1門洞，從一層到四層共住11家人，「文革」中有3家的5口人自殺了。但是，我們不知道在「文革」中一共有多少老師無辜身亡。

1966年在校的大中學生，從6月停課後再也沒有上過課。他們在數年以後先後離開學校。

六 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的反思

在90年代，當年的老師和學生怎樣想呢？

(1) 從歷史的角度：「文革」前的教育方式是否與暴力行為有關？

近幾年來，在1966年被打的老師中，開始有人因年事已高而去世。有一位在1966年被嚴重打傷的中學校長說，現在是檢討以前的教育方式的時候了。在1964年以後，「文革」開始以前，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領導在壓力下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單獨給幹

部子弟聽政治報告，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政治待遇，強調階級關係。紅衛兵提出了「造反」，把老師當成敵人。1966年6月「工作組」進校以後，鼓勵學生上綱上線批判學校領導，但是不許打人。紅衛兵反「工作組」。「工作組」被毛澤東撤走後，就發生了打老師事件。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埋藏了日後的災難。

(2) 從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一代？

在1993年夏天，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胡志濤說，她收到過一個學生寄給她的一本掛曆和一封信。這個學生在信裏為1966年8月打了她表示道歉。儘管這是27年來她收到的唯一一封道歉信，她表示原諒打了她的學生們。但有一位老師不同意。她說，道歉不道歉，對老師們來說現在其實沒甚麼，問題在於這些學生，他們參與了打死人的事件卻不道歉，他們還有沒有良心？中國的老師不教學生關於天堂和地獄的思想，但是人應該對自己做了的壞事有內疚感和負罪感。

(3) 這是不是「革命」？

在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之後，少數的「文革」參與者仍然認為紅衛兵當時所作的並不太錯，因為那是一場「革命」，方向正確，手段不那麼重要。但是多數身臨其境的被訪者都覺得，那場運動無論是手段還是方向都是錯的，我們不能再讓「文革」中的學生打老師或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不論其是否再用「革命」的名義。

註釋

① 高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②⑥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86：48。

③ 在這個名單中，帶*號的學校有老師被打死。但是被打傷後自殺的人未被計入。另外，學生打死了學校外的人也未計入。

中學：

北京第四中學	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	上海復興中學
北京第八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	上海大同中學
北京第六中學*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	上海上海中學
北京第十五中學	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上海七一中學
北京第五十二中學*	廣東台山縣一中	上海南洋模範中學
北京第八十中學	廣州第七中學	上海第二女子中學
北京101中學*	廣州第十六中學	上海第三女子中學
北京第一女子中學*	廣州第二十五中學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北京第二女子中學	廣州第五十七中學	上海外語學校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	廣州第六十二中學	上海新成中學
北京第四女子中學*	杭州第一中學	四川洪雅縣中學
北京第五女子中學	南昌第八中學	四川西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北京第八女子中學	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廈門第四中學
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	南京第二中學*	天津北郊區南倉中學
北京大學附屬中學	南京外國語學校	天津105中學
北京景山學校	陝西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	

小學：

北京禮士胡同小學	江西樂平縣大寺上小學	南京南昌路小學
北京海澱區老虎洞小學	江蘇無錫后寶小學	上海南匯縣惠南鎮小學
北京玉泉小學	江蘇儀徵實驗小學	天津紅橋區金鐘橋小學
北京中古友誼小學	江蘇鹽城縣城中小學	天津河西區西南樓中心小學
北京寬街小學*	江蘇揚州市灣頭公社 中心小學	天津南市小學
江西廬山第一小學	南京林學院子弟小學	
江西南昌市羊子小學	南京三牌樓小學	

大學：

北京大學	北京師範學院	中央音樂學院
北京農業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	北京建築材料工業學院
清華大學	中央美術學院	北京鋼鐵學院

幼兒園：

北京中山公園幼兒園 (是中學的紅衛兵來打了幼兒園的老師)

- ④ 作者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學生，看到打人的經過，曾為此寫過〈女性的野蠻〉一文，收於我的《校園隨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 ⑤ 見蒯大富6月16日大字報，收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宣傳隊編：《清華大學大字報選》（1966）。
- ⑦ 據其中一人和作者的談話，1993年9月10日。
- ⑧⑩ 見中國人民解放軍黨史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頁91；49、70。
- ⑨ 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⑪ 這是由蕭衛平（1966年北京中學生）從計算機網絡上寄給我的，並請譚護（1966年天津中學生）做過核對。譚提供的歌譜不同，但詞基本是一樣的。兩地唱法不同。
- ⑫ 《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社論標題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 ⑬ 《人民日報》1967年5月17日發表，用黑體字印毛澤東寫的句子，在1966年5月時僅在共產黨內傳達。
- ⑭ 〈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人民日報》，1966年8月21日，第二版，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表示她已改名。
- ⑮ 這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見《清華大學大字報選》。
- ⑯ 見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主辦：《中學文革報》第2期，1967年2月2日。
- ⑰ 〈為一批中小學領導幹部昭雪平反〉，《北京日報》，1978年7月16日。在這篇一千來字的報導中，列出了13個1966年的死者名字，但未提他們是被打死的。
- ⑱ 見「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書」，（80）西檢審刑字第72號。

打老師和打同學之間

王友琴

美國斯坦福大學亞洲語言文學系

一 題目和方法：事實描述與分析

在〈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①一文中，我描述和分析了1966年夏天在76所學校中發生的學生對老師的暴力迫害。這場迫害普遍、殘酷，而且在歷史上絕無僅有。現在的人很難想像曾發生那樣的故事。於是，這篇文章引來了一個疑問：學生怎麼可能做出這種大規模打老師甚至打死老師的事情？也就是說，對迫害性事實的逼近的關注，自然引起了對受迫害者和迫害人者的進一步關注。

本文試圖部分地回答這一問題。事實上，回答的方法可能很多，本文不打算運用現有的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理論來解釋。如同前文一樣，筆者首先利用多年來和幾百名文革經歷者的談話，其次運用現在可能收集到的當時留下來但未正式發表的文字資料，再次，參閱當時正式發表的文革報導，以記錄和核實那些未被寫出的文革事件。不同於前文的是，本文不僅着重事實描述，而且更強調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通過這種相互關係的分析，我們可能對那一時期的總體圖景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並對為甚麼發生這些事件有進一步的了解。

1966年夏天，當學校發生大規模打老師事件的同時，亦普遍出現了迫害同學的事情。事實上，這些學生受迫害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甚麼，而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即他們的「家庭出身」。曾被稱為「紅八月」的1966年夏天的文革運動，並不能籠統稱為一代年青

人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同代人迫害同代人的運動。本文試圖回答：部分青年學生遭受歧視和迫害，究竟與當時的打老師事件有甚麼關係？

二 發生時間的重合

1966年8月4日上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在教室召開了鬥爭班裏「家庭出身不好」同學的鬥爭會。教室牆上貼了大標語：「打倒狗崽子！」在1966年夏天，「狗崽子」的意思非常明確，即這些學生的父母是「狗」，而這些學生因為是「狗」的孩子（生物性的），所以也成為「狗」（政治性的）。「狗崽子」一詞未出現在當時的報紙上，但實際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字報、傳單和人們的談話中。

這個班有40多名學生，其中10人出身於「有問題」的家庭，屬於「狗崽子」；有10人來自「革命家庭」，大多為高級幹部的孩子，是「紅衛兵」成員；另外20多人的家庭屬於「不紅不黑」，當時填在表格上屬「職員」之類。開鬥爭會的時候，10名「紅衛兵」坐在椅子上，20多名既非「紅衛兵」又非「狗崽子」的學生坐在地上，10名「狗崽子」則站在教室前面挨鬥。有人拿一根長繩子繞過這10個挨鬥者的脖子，把她們拴成一串。有人動手打她們，往她們身上灑墨水，並強迫每個挨鬥者「交代反動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還必須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混蛋」一詞，來自當時貼得到處都是的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時初二的學生15歲。其中一位挨鬥者後來說，這個鬥爭會對她的刺激非常大。從那一天以後，生活對她來說好像與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在同一天裏，不僅僅是她的班，這所學校的其他班中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

就在這一天，該校的老師也遭到了暴力「鬥爭」。副校長胡志濤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說②：

8月4日下午，我們幾個領導幹部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生，氣勢洶洶地罵道：「黑幫！不許動！」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我愛人看見我身上被抽打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麼這樣亂？」我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甚麼辦法？！」

8月4日，這所學校的另一副校長卞仲耘被打傷後回到家中說：「他們打死一個黨員，一個教員，不過像打死一條狗。」她有預感，可是第二天早上還是不能不到學校去。結果，8月5日下午，高中一年級的一些學生發起「打黑幫」，打鬥了5個校級領導人，包括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三位副校長（當時正校長缺）和兩位教導主任梅樹民和汪玉冰。他們被戴高帽子、掛黑牌子、遊街、被帶釘子的木棒打、被開水燙、被迫用手攪廁所的髒東西、被罰挑重擔子……。這所學校當時有1,600多個學生，雖然參加打人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人數已不少，而且手段十分凶狠。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卞仲耘老師帶着滿身傷痕死在學校操場邊的學生宿舍樓門口，其他4位也都被打成重傷。

儘管卞仲耘老師被打死的消息馬上就報告到高層領導人那裏，但卻未見他們派人來制止暴力殺害。相反，隨着文革領導人物及報紙廣播對「紅衛兵」運動的大力支持和讚美，暴力迫害繼續擴散升級。北京有一批老師被學生打死或在被毒打後自殺，死者總數至今不詳。縱容、默認這些無辜者的死亡，是社會道義和良心的大喪失。卞仲耘老師的死，對她的家庭是無法彌補的損失，在文革歷史上也應是歷史學者應該關注的重要事件。卞仲耘老師是北京第一個在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師，也是文革中第一個被群眾暴力殺害的人。按照北京公安局的統計，在1966年8、9兩個月中，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卞仲耘老師的死是1,772人中的第一個。她的死，標誌了一個可以用群眾暴力來處死人的黑暗時期的開始。

大規模迫害同學和打老師的事件同時發生，並從北京蔓延到全國。據現有資料，我們還沒有找到一所學校是沒有發生打老師也沒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

當時有兩首新作的歌曲，可以分別代表或說明這兩種對象同時所受到的迫害。一首是《牛鬼蛇神歌》又稱《嚎歌》^③，用來強迫老師唱，強迫他們自我詛咒：「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另一首是《對聯歌》^④，宣揚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儘管當時的電台並未廣播這兩首歌曲，但是它們卻流傳全國，甚至在遠離北京的地方也為人熟知。

三 暴力虐待的性質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常務副校長、化學教師劉美德一次又一次被打鬥。數位當時的學生和老師都講述出一致的情景：她的頭髮被剪掉，被逼在地上爬，被逼頂着烈日在學校操場的400米跑道上跑，被逼吃地上的髒東西，等等。而且，劉美德當時懷了孕，學生也是知道的。

有一天，《北京日報》攝影記者到北大附中要拍攝這所學校開展文革的照片，因為該校的學生組織「紅旗戰鬥小組」及其負責人彭小蒙曾直接得到由毛澤東寫於8月1日的支持信^⑤。那天，劉美德被逼爬上一張方桌罰跪，一個學生站在她身後，把一隻腳踏在她背上，如此擺好姿勢，由記者照了下來。這一姿勢是仿效毛澤東在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記者拍完照後，這個學生把劉美德一腳踢下桌子。後來，劉美德的孩子出生後不久就因先天性受傷而死。

數位被訪者也講述了這所學校中學生被打的情景。高三的男學生朱同，因父親是「右派份子」而被毒打，還被關在廁所旁的一間小

屋裏。屋裏遍地是水，水上漂浮着垃圾。一些學生在窗戶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看動物園裏的動物。這所學校初一（四）班的女學生萬紅，父親也是「右派份子」。當班裏的男同學要打她時，她躲進女廁所，並在那裏哀求彭小蒙說：「你見過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訴他們別打我。」可是萬紅還是被揪到教室裏鬥，有同學用皮帶抽打她。萬紅更被命令站在一張凳子上，批鬥會中有同學突然把她腳下的凳子抽走，讓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

在打劉美德老師和打萬紅同學這兩個事件中，有一個相同的細節：故意使她們從高處摔下受傷，顯示這完全是一種暴力虐待。施用於教師和施用於學生的暴力虐待是一樣的，不同的只是教師被打的比例和程度都遠高於學生。在我發表的兩篇文章中可以看到^⑥，在調查所及的76所學校中，僅在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教師是11名，被打死的學生是1名。

這些暴力迫害事件是如此明顯，以致無法用「革命熱情」和「理想主義」解釋。現在有人甚至會懷疑這些事實的真實性：在處於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怎麼可能如此折磨懷孕的女校長呢？又怎麼可能如此折磨他們的同班同學呢？這種對文革史實的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報紙上從未報導這些暴力故事。那時，所有人都要仔細閱讀《人民日報》，但卻是當作關於文革的指示而非報導來閱讀的。當時的報紙用慷慨激昂的詞語支持「紅衛兵小將」的行動，為他們叫好，但並不描寫他們具體做了甚麼。

除了報紙以外，當時非正式出版物的文字材料，可能更有助於我們了解那個夏天所發生的事情。比如，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所寫的〈自來紅們站起來了〉一文中這樣說：

我們到這個世界上來，就是為了造資產階級的反，接無產階級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

有人誣蔑我們是「自來紅」，崽子們：你們的誣蔑是我們的
光榮！你說對了！要問老子是哪一個，大名就叫「自來紅」。

文中的「自來紅」是指「革命幹部」的子女，他們自稱為「老子」，
而把另一部分學生稱為「崽子」。這三個詞語都未在當時的報紙上出
現過，從這類詞語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語言的粗暴性。同時，這篇文章
也有明確的權力意向。為了權力，他們一要和「資產階級的『權威』」
鬥，二要和他們的「王八羔子」（文中原話）鬥。這個說法和當時的報
紙並不一樣。按照這個說法，具體到當時的學校裏，鬥爭對象就成了
教師和不同家庭出身的學生。但是，即使仔細閱讀這篇文章，也難看
出本節所述的折磨劉美德老師和朱同、萬紅同學的事件，儘管這類事
件後來普遍在各地發生。

在我看來，當時的正式出版物、未正式出版的文章以及實際發
生的事件都是文革史實的一部分。但是，由於實際發生的事件的暴力
虐待性質，使其於當時未被記載，現在就連追憶也變得很痛苦。即使
作為一個研究者，也可能會迴避這些事實。這不僅是因為發現事實太
費功夫，而且寫出之後還必須面對隨之而來的問題：怎麼解釋這些暴
力虐待？解釋事實的難度可能會消滅發現事實的動力。清醒意識到可
能阻礙我們發現事實的各種因素是很重要的。畢竟，發現事實及其特
性是歷史研究者的主要職責。

四 兩種暴力迫害的相互助長

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的紅衛兵把音樂教室小院改建成
一座監獄，以便施用各種私刑。他們在屋頂上搭了一個崗樓，安裝上
一盞徹夜長明的小太陽燈。第六中學距天安門廣場只有幾百米遠，和
中南海也只是一街之隔，它的地理位置就使其影響非同小可。當時有
不少外校紅衛兵前往參觀學習。這座私設監獄存在了一百多天。

有9名第六中學的老師從頭至尾被關押在那裏，挨打挨罵。有的被打壞了骨頭，有的被學生拉來作練拳的活靶子打，還遭到跪煤渣、跪板凳等體罰。其中一位教導處副主任，被放出後一個月便死去。更多的人時間長短不等地被關押在這裏。第六中學的一個老校工徐需田和學校附近的一個房產主何漢成就是在這座監獄裏被打死的。

並不是每一個學生都有資格參加這種暴力虐待行動的。有一部分學生像老師一樣在監獄中被毆打折磨。據曾關在這座監獄中的老師說，監獄牆上原有用紅漆寫的「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後來這所中學高中三年級有兩個「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被抓到監獄裏毒打，血流遍地，打他們的人就用毛筆蘸了他們的血，重描了這條標語的六個字。血灑落在牆上，形成可怕的圖形。

第六中學高中三年級學生王光華，「家庭出身」是「小業主」，在文革時被說成「資本家」。文革前王光華曾任班長，文革開始後曾批評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後來，他未得到「紅衛兵」的批准就出去參加「大串連」。1966年9月27日，王光華外出串連後一回到北京，就被綁架進學校的監獄，一群同學用軍訓用的木槍和桌椅板凳毒打他，打得他失去知覺。當天晚上，他被關在監獄中，傷勢沉重，氣息奄奄。第二天早上，王光華又被毒打一頓。9月28日晚上，王光華死了，時年19歲。

幾個關在監獄中的老師把王光華的屍體抬出了監獄。據當年抬王光華屍體的老師說，他們在黑夜中抬着屍體出了監獄門，穿過六中的校園，一點也不覺得害怕，他們已經在這座監獄中關了一個多月，眼見身受了大量恐怖的事情，那時連害怕的心情都不會有了，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們感覺到屍體很重，死人的身體似乎比活人的沉重得多。

這些被囚禁在監獄裏的老師，目擊了學生如何分裂成三個等級。一個等級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他們被歧視、被侮辱、被打甚至打死，王光華是其中之一；另一個等級是出身於「不好也不

壞」的家庭的學生，他們不被准許參加「紅衛兵」，只准參加一個叫做「紅聯軍」的組織，意思是可以充作「紅衛兵」的聯合對象。到了1966年11月，「紅衛兵」成員都到外地「大串連」去了，在夜裏值班看守監獄就成了「紅聯軍」成員的差使。當時，學校裏最高等級的是「紅衛兵」，他們掌管獄中人的生殺予奪，還把獄中老師的工資拿去花掉。有一天，在毛澤東將在天安門廣場又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之前，一個紅衛兵在監獄的院子裏高聲大氣地說：「老子他媽的上天安門城樓都上膩了。」原來，第六中學紅衛兵是屬於「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西糾」（當時的簡稱）擔任糾察，有些人能上天安門城樓。

1966年7月底，此前領導各學校文革運動的「工作組」奉令離開學校，此後打老師立刻成為普遍的風潮。如上文所說，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老師成為學生暴力的第一位受難者。但是打死人者並未受到任何懲罰或警告，甚至連批評也沒有。接着，在北京101中學、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等學校又再有老師被學生打死。那時領導文革的「首長」常到各處群眾集會上講話，然而查閱當時詳盡記錄而後編印成書的各種「首長講話集」，頂多只能找到三言兩語的、十分溫和並且間接的對打人情況的勸告，而且從未具體提到老師被打死的事。9月27日，王光華在第六中學的監獄被打得失去知覺，當時關在獄中的一位女老師給他做人工呼吸，也被打斷了手臂。第二天又打王光華，終於把王打死。如果打死老師的事先受到管束，如果當時教師的生命不那樣被視為草芥，那些打死王光華的人或許還不至於那麼肆無忌憚。如果他們稍有收斂，王光華也許就不會被打死。打老師的殘酷程度助長了打同學的殘酷程度。當學生被允許大規模地毆打老師的時候，順着同一理由，自然也就可以集體地打同學。

同樣的，當部分人對同輩人實施暴力虐待成了一種特權，在心理上亦刺激助長了他們折磨老師的興趣。可以設想，如果打老師的暴

力行動是全體學生可以平等參加的，那麼打老師的殘酷程度就可能不會像實際發生的那樣。另外，一部分學生也可能站出來反對打老師。根據調查，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學裏，「紅衛兵」的成員不過佔20%左右，但是他們卻擁有巨大特權，可以主宰學校、甚至握有對一般群眾的生殺大權。另一方面，把學生按照「家庭出身」分成等級，並嚴加打擊「狗崽子」，也發揮着「殺雞給猴看」效應，使得學生不敢發出不同聲音。事實上，1966年夏天暴力虐待如此嚴重，但是幾乎沒有人出來反對當時的迫害，這是一個令人難過但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就現有的材料來看，文革中出現的某些東西，比如「紅衛兵」這一組織的名稱、打人的種種手段、學校自設監獄等等，可能不是文革的發動者事先策劃的，也就是說，可能是偶然出現的。但是，在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度裏，無數人可能發明無數新東西，而獨獨這些能夠流行一時，這並不是偶然的。它們的流行，是因為得到了文革領導者的支持。另外，從這些東西可能具有的功能，也可說明這兩種暴力迫害之所以風行的必然性。

五 共同後果：暴力迫害的推行與延伸

很明顯，在1966年夏天學校暴力風潮中的衝突雙方，其中一方佔有絕對權力，可以不必遵守任何法律程序就向被鬥者施行打罵，甚至打死人也沒關係；另一方則只能忍受痛苦和懲罰，不能自我辯護，不能自衛，甚至也不能以投降來保全生命。雙方這樣的關係，是典型的也是嚴重的「迫害」範例。

當文革運動開始、學校的負責人和教師被作為運動對象之後，沒有一個老師敢公開反對這場「革命」。相反，他們卻表示願意檢討和改正自己的「錯誤」。在1966年6、7月的「工作組」領導運動期間，他們其中一些人已被劃入「四類」，面臨挨鬥、撤職、下放的命運。

「工作組」撤離之後，大規模的暴力迫害開始了。遊街、體罰、進「勞改隊」、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抽打等暴力手段紛紛加諸教師身上。

「工作組」撤離後，「紅衛兵」組織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中被有二百多名成員的「紅衛兵」控制了，包括學校的「勞改隊」。這所學校的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鰲被強迫在胸前佩戴一塊寫着「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的黑布。他們多次遭毒打，萬邦儒被打得腎出血，韓家鰲不得不長期服用專治外傷的「雲南白藥」。女團委書記顧涵芬的一隻眼睛被打瞎。化學老師劉樹華從學校煙囪跳下，自殺身死。同時，這所學校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被毒打並強迫「勞改」。高二學生郭蘭惠的父親是「右派份子」，她被鬥後喝「敵敵畏」自殺身亡。還有一個初中女同學臥軌自殺未遂，但終身致殘。

暴力迫害當然不是新東西，但是由一部分學生大規模地施用於老師和同學身上，卻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對老師和同學的暴力迫害，是整個文革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隨着「紅衛兵」組織在各學校普遍建立，這一類暴力迫害也普遍發生，並進一步從校內向校外發展，從打老師和同學發展到打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抄家、打人，把地、富、反、壞、右掃地出門、驅逐出北京，到處發生。比如，作家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紅衛兵打鬥後自殺。從1966年8月26日起，北京每日被打死的人增至三位數，持續到9月1日。9月2日起才降至二位數。

情況不斷變化。在1966年8月30日由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化工學院附中紅衛兵」發出的〈告工農革幹子弟書〉^①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句子：「革命幹部的家一律不許抄，凡沒經中央、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幫、反革命份子的當權派的家也不應查抄。」「凡是沒有經黨中央和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幫、反革命的，一律不許體罰、毒打、掛牌、剃頭、勞改。」從這張鉛印傳單可以看出，到8月底，那些曾施用於別人身上的暴力迫害已被施用到「革命幹部」身上。以幹部

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在暴力迫害肆虐北京一個月後，意識到這種暴力迫害開始危及自身並試圖制止，但仍只是制止施用於某些對象而已。

毛澤東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要打擊「當權派」，轉而大力支持另一些被稱為「造反派」的群眾組織，以取代初期的「紅衛兵」。「造反派」雖曾部分地批評了「紅衛兵」所為，但在相當程度上仍繼承了他們的作法。比如，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當「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和「老紅衛兵」（他們後來被冠之以「老」字）各佔一樓對壘時，「井岡山」的學生曾用布蒙住萬邦儒校長、韓家鰲副校長及另外三位老師的眼睛，將他們驅趕到四層樓頂，並用皮鞋底打這五個人。這是因為對面樓上的「老兵」罵他們「保守」，他們就以此來證明自己是「革命」的。

上述回顧，可以幫助我們看出暴力迫害發展的軌迹和一些特徵：

(1) 這場暴力迫害興起非常迅速。1966年7月28日宣布撤離工作組，8月5日就有老師被打死，到8月下旬，發展到在北京每天有幾百人被打死。9月後每天被打死的人數漸降。這種急劇增長、達到高峰後又稍降低的發展曲線，有助於迫使人們普遍接受打人所意味的暴力迫害原則。可以設想，如果暴力行為緩慢興起，人們在思想上可能會不接受，從而有機會說出不同的聲音——北京畢竟是一個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城市。但是在1966年8月迅速蔓延的大恐怖中，沒有人敢反抗或從理論上反對這種迫害。隨後暴力迫害的勢頭稍減，人們慶幸生存之餘，也在一定程度上習慣了。

(2) 在暴力迫害中發生了超越某些施行者意圖的情況，即當暴力迫害蔓延並擴大時，原初的施暴者最終可能變成被施暴的對象。由於這些施暴者先已確立了暴力迫害方式，他們也就失去了保護自己的道德基礎。

(3) 在文革的前三年中，佔據學校主導地位的勢力幾經變更，但是暴力迫害的原則卻一以貫之。這幾派勢力雖曾互相對立，但他們卻有着相當多的共同思想或行為方式，其中暴力迫害是最重要的一項。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這些施暴者故意把一批又一批人從社會生活中撕裂出去，「批判」他們、「鬥爭」他們、關押他們、摧毀他們的日常生活，要讓他們活得越不舒服越好，這種方式在文革中不斷被運用。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很多人似乎都已經自然地把這種迫害當作生活的一部分。

繼1966年夏天的暴力迫害的高峰之後，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暴力迫害的另一高峰。在「清隊」運動期間，本文提到的四所學校的教職員工中，北師大附屬女子中學有三人自殺，北大附屬中學、北京第六中學、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各有一人自殺。

我們對於文革中的暴力迫害的了解和研究還很不足，本文只涉及它的開始部分：文革中大規模的群眾性暴力迫害，始於1966年夏天的打老師和打同學。想要更全面描述暴力迫害的事實和更深入分析其中的因果關係，還有待進一步的努力。

註釋

- ① 此文發表於《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8月號，頁33-46。
- ② 胡志濤：〈「八·五」祭〉，寫於1986年，發表於她和丁丁合作的《生活教育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 ③ 此歌詞曲見註①文中。
- ④ 此歌詞曲見拙著：〈迫害同學：事實與分析〉，《中國研究》(香港)，第二期(即將出版)。
- ⑤ 毛澤東的信可見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頁62。
- ⑥ 見註①及註④。
- ⑦ 見美國密執安大學收藏的文革材料中。

清華井岡山兵團的興衰

唐少傑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典型、最有影響的群眾造反組織。本文對該兵團的幾個問題作一評述，僅供文革研究者參考。

一 兵團的由來

1966年6月初，清華大學文革運動開始。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影響下，清華學生開始張貼大字報批評校黨委。6月8日，中共北京市新市委派了528人的工作組進校。13日，工作組宣布停止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的一切職務，由工作組代行領導職權，工作組成員接管學校各級組織。12日至16日，103名清華幹部被戴上高帽子遊街示眾。清華大多數幹部被置於「上樓」^①檢查、「下樓」過關的境地。工作組把112人定為走資派，16人打成反動學術權威，50多人當成牛鬼蛇神，清華處於混亂、癱瘓狀態。工作組力圖把清華文革運動納入他們的領導軌道，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受到一些師生的反感或抵觸。6月15日，工程化學系902班蒯大富等十幾人開會決定與工作組抗衡。16日至25日，蒯大富等人多次貼大字報抨擊工作組及其領導人。工作組從6月24日至7月17日多次在全校範圍內組

織批判、鬥爭蒯大富，蒯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蒯先後以上告、絕食、出走等行動表示絕不妥協。6月19日至8月3日，王光美先是以「蹲點」後是以組員的身分參加了清華工作組的工作。7月中旬，毛澤東嚴厲批判劉少奇等人的工作組路線，清華園內的形勢急轉直下。7月22日，工作組尚未撤離，王力等接見蒯大富並表示支持。8月4日夜，北京市新市委在清華召開工作組問題現場會，周恩來講話，為蒯平反。自8月起，清華乃至全國的文革進入了以紅衛兵造反運動為先鋒的階段。

「紅衛兵」起源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6年5月29日，該中學少數出身革命幹部、工農家庭的學生建立了名為「紅衛兵」的造反組織。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熱烈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從此，紅衛兵運動及其組織風靡中國，震動世界。紅衛兵運動成為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全社會性的造反運動。

清華大學本科生的紅衛兵組織出現於工作組被正式撤銷之後。8月8日，唐偉、汲鵬、陳育延等成立串聯會，討論工作組性質並批其資反路線，這些被稱為「八八」派的人於8月22日組成「毛澤東思想紅衛兵」。8月9日，賀鵬飛、劉濤、劉菊芬等成立串聯會，只批黑幫而迴避工作組問題，這些被稱為「八九」派的人於8月19日組成「清華大學紅衛兵」。除了這兩派以外，還有一些紅衛兵組織相繼出現。9月24日，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宣告成立。當時僅有十幾人的井岡山紅衛兵發表了一系列聲明，提出了三大口號：批判工作組的資反路線，批判清華大學紅衛兵，為蒯式人物（被工作組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平反。實際上，1966年7月底至11月，清華大學處於無政府狀態。當時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清華大學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臨時籌備委員會」和「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主席團」先後掌握學校形勢。這些被稱為「三臨」的清華紅衛兵領導機構並未得到

廣大學生的一致承認和擁護。由於當時的社會形勢及中共中央內部的情況，以高幹子女為主導的清華大學紅衛兵始終處於被動狀態，其領導人於9月29日宣布自我罷官，一部分成員轉而成立了造反兵團支持蒯大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也分化為八八總部和臨時總部。相比之下，井岡山紅衛兵不斷壯大，很快發展到數千人，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青睞和提攜，蒯大富在9月出任「首都大專院校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紅衛兵三司」）召集人就是證明。12月19日，井岡山紅衛兵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兩個總部宣布合併，召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成立大會。由此，井岡山兵團崛起成為在清華大學獨佔鰲頭並在北京乃至中國獨領風騷的紅衛兵組織。

二 兵團的崛起

成立伊始，兵團進行了兩方面的鬥爭。一是加緊「圍剿」清華大學紅衛兵。該紅衛兵中有人在11、12月貼出反對中央文革、痛斥江青、懷疑林彪、批評文革運動的大字報和標語。兵團大舉反擊，終於使該組織崩潰瓦解。二是響應中央文革的意圖，把批判劉少奇的鬥爭推向新階段。12月18日，兵團成立的前一天，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約見蒯大富，並對鬥劉問題作了交代。張春橋絕不會以個人身分來交代此事，他的身後肯定有更大的指使。12月25日，清華大學5,000多名紅衛兵和教職員工分五路進城，上午10點在天安門廣場會合，然後又分五路，在天安門前、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進行「大宣傳、大遊行、大示威」，他們沿路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大標語，呼喊口號，召集短會，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徹底搗毀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勢廣泛地引向社會。這一被兵團稱為「重大戰役」的活動整整進行了一天。與之相應，兵團於1966年的最後一天在其發行全國的《井岡山》報上，以專刊形式發表了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劉少奇之女劉濤的長篇檢查，從家庭內部來揭露劉少奇、王光美鎮壓文革、鬥爭蒯氏的「罪過」；並於1967年的第一天在同一報刊上發表〈炮打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有關文章，列舉劉在中共歷史上的12大「罪狀」。1月6日晚，兵團一些人以劉少奇、王光美之女遭車禍之名，把劉、王騙至醫院，然後「智擒」王光美到清華園，連夜舉行全校批鬥大會。在鬥劉問題上，兵團心領神會地充分發揮了中央文革的意圖，以自己的群眾「戰役」完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戰勝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一個回合，成為當時中國社會反劉、鄧路線的突擊隊。

兵團因自己的「戰果」而身價倍增，並近於如癡如狂。1967年1月17日，蒯大富在《井岡山》報上發表〈無產階級大奪權萬歲〉，大談「奪權經」：「不奪權，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傾；不奪權，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義；不奪權，就是對人民極大犯罪。奪權，就是捍衛黨的領導，就是捍衛無產階級。奪權，是無產階級派的當務之急。此時不奪，更待何時！」「真正的革命派，應該滿腦子裏想的是奪權，眼裏看的是奪權，雙手幹的是奪權。」「有人笑我們滿腦子權權權，是一個念念不忘奪權的野心家。對！我們就是滿腦子權權權，就是念念不忘奪權的『野心家』。……在政權問題上，我們就是毫不含糊，當仁不讓！我們寧可做『野心家』，也不願當糊塗蟲、馬大哈。」自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不久，兵團更加執着於在清華園外搶權、奪權。兵團的無政府主義和反權威主義傾向一發難於收拾。自1967年初至1968年7月，兵團內就不斷出現咒罵周恩來、懷疑康生、批評中央文革、否定陳伯達、斥責江青、抨擊謝富治，甚至對毛澤東、林彪本人也有所「不敬」的事例。兵團內的許多人實際上以知識份子狂熱的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心緒置身於文革的洪流中。另一方面，兵團在許多場合格外炫耀他們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特殊關係。根據形勢的需要，竭盡所能地吹捧江青等人，宣傳自己與中央文革之間的親情，以中央文革的嫡系自居。這往往帶有政治上的虛偽和投機成分。一個花絮：

1967年5月5日，蒯大富風聞聶元梓請陳伯達當北大校長，於是他寫信給周恩來，請求周恩來當清華校長，周恩來5月6日回信辭絕。

甚麼是文化大革命？兵團有關頭目認為，關於文革的本質應從黨群矛盾、幹群矛盾去理解。如果只是看到一小撮走資派的問題，那是永遠不能理解文革的，因為黨群矛盾、幹群矛盾比起與一小撮走資派的矛盾更加深刻地反映了文革的本質。所以，兵團把基於這種文革本質的理解而來的奪權經驗全面付諸自己的全部歷史活動中。一方面，兵團把揪鬥走資派的鬥爭普及而又深入地引向整個北京乃至全國。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1967年4月10日，兵團在清華主樓廣場前召開30萬各界群眾參加的批鬥王光美大會，把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等兩百多名大大小小的「走資派」揪來陪鬥，力圖把全部走資派置於死地。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兵團遠不滿足於鬥爭走資派，因為兵團把目光和矛頭伸向打倒走資派之後的現今的當權派，它已遠遠不滿足於稱霸清華甚至北京，而要在全國文革運動中叱咤風雲、左右形勢。幾乎在當時的每一文革熱點地區和部門，兵團都曾插手或介入。僅1967年3月至9月，兵團（包括兩派的）先後向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的30多個市、地區派出了近千人（一說600人）的80多個聯絡站、記者組，直接干預當地的文革運動。在北京，兵團更是積極關注黨、政、軍、學等部門的文革運動及權力鬥爭；參加歷次的重大事件或活動，如1967年7月下旬在中南海西門的「揪劉火線」和8月22日衝擊英國代辦處；充當北京各高校紅衛兵造反組織縱橫向聯繫（「首都紅代會」）執牛耳的角色；動輒以大規模的群眾行動把自己的主張和要求廣泛推向社會。

兵團對打倒走資派之後剛剛建立起的當權派權威的動搖和衝擊，就是試圖把當權派現有的、即使是暫時的秩序納入到自己非黨的群眾組織的控制之中。1967年春夏之際，兵團對當權派的干擾達到了高潮。4月，兵團開始參與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即奪軍權的鬥爭。武漢「7·20事件」後，兵團頭目認為文革開始進入衝擊軍隊、解決軍

權問題的新階段，而軍權問題就是軍隊裏的山頭勢力。7月29日，在兵團作戰部長帶領下，40多人抄了徐向前的家，搶走大量文件，並企圖綁架徐向前。8月1日，批鬥彭德懷、羅瑞卿，點名抨擊徐向前、葉劍英、朱德等人。7月至9月，團派派出許多軍事動態小組，分赴各大軍事單位或戰略要地，收集有關部隊番號、軍隊動向及軍事首長狀況等極密情報，繪製有關圖表，力圖使軍隊大亂。在7月26日、30日兵團主持召開「全國造反派頭頭形勢討論會」之後，兵團許多人熱衷於支配一些地區的「文攻武衛」，部分頭目更親臨有關地區，儼然以通天使者的身分指導外地造反組織，參與並指揮武鬥，甚至衝擊或佔領軍事單位，毆打軍事人員，搶奪軍用物資，使外地對立兩派群眾的積怨加劇，給已經混亂的生活及環境帶來了更深的危機和災難。兵團彷彿是要在衝擊社會有序生活（哪怕是暫時的、局部的）的無序運動中，尋求實現自己的價值及功能。

正如414在1968年4月發表的〈這是為甚麼？〉一文中責問團派的：「為甚麼清華團總部在全國各地無一例外地到處反軍區、反革委會，而且是在各地揪軍內一小撮的急先鋒？打倒許世友、韓先楚、陳錫聯、李再含、劉格平等第一炮幾乎都是清華團派打響的^②，這是為甚麼？」原因之一：一旦當權派的權威阻礙以兵團為代表的造反派要權、搶權、奪權，或是這種權威有礙於群眾組織之間重新瓜分權力時，這種權威就應被打倒。在兵團興盛之際，就有20多名成員因嚴重觸犯了這種權威而先後被捕入獄。這種得到兵團（至少是團派）的領導和群眾默認甚至慫恿的冒犯現有權威，可以說是兵團的「天性」。兵團的所作所為，把伯恩斯坦的「目的算不了甚麼，運動就是一切」的機會主義哲學轉換成「權威算不了甚麼，奪權就是一切」的造反哲學。

兵團身居高校也很重視教育問題。它深知文化、教育界和意識形態領域對文革發端的重要，所以多次在不同範圍的師生中廣泛討論教育革命，竭力把高校教育契入空想共產主義的模式中。兵團把每日

上午8至10時定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時間，把軍訓、學工、支農，把近於無政府狀態的內外串聯和召之即來的大字報、集會、遊行、武鬥等等當成了高校教育的主要內容，結果使當時六屆在校的逾萬名學生於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所上的課程和所學的課堂知識少之又少。兵團的教育革命不僅是反知識、反傳統的，也是反啟蒙、反現代的。兵團在當時還設計出整個高校教育革命的烏托邦藍圖。例如，1967年11月，兵團招生工作研究小組發表《關於改革大專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議》，提出為「堅持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應對各階級按一定的比例招生：工人、貧下中農子女應佔65%以上，剝削階級子女不超過5%。招生必須貫徹以群眾推薦為主，考試為輔的步驟來進行。推薦應佔招生人數的60%左右；為縮小城鄉差別，農村推薦學生應佔20%-25%。對五類學生不予錄取：家庭直系親屬中有被專政機關鎮壓者，走資派、牛鬼蛇神子女未與家庭劃清界限者，文革中參加過反動組織的屢教不改者或反動言行者，不參加文革的逍遙派、書呆子。對於大學招生，「今後要徹底廢除單純分數考試制度」，「可實行開卷考試」。大學入學語文考試，考生可交一份文革中自己寫的大字報底稿。兵團一系列的教育革命構想未能在時間中得到充分推行，只有1970-1976年的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算是為上述構想作出了漫畫式的歷史腳註。

三 兵團的分裂

自兵團成立之日起，內部就包含着分裂的因素。兵團總部成立第三天，就有三名委員因分歧而退出。形成井岡山兵團之一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早在1966年7、8月間就在工作組鬥蒯大富一事上持中立態度，認為蒯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新左派。隨着兵團成立後各縱隊勢力的發展，以蒯為首的井岡山紅衛兵（又稱井岡山縱隊）與另三大縱隊（毛澤東思想縱隊、八八縱隊、東方紅縱隊）的分歧和矛盾日益

加深，主要表現在文革中的策略、形勢評估、工作方法、權力分配、幹部政策、對文革前清華的評價等方面，而最重要、最集中的就是幹部政策。這些伴隨着兵團成立、發展而來的分歧和矛盾最終致使兵團於1967年4月分裂為井岡山兵團總部和414總部。在清華園內，前者又被稱為「團派」、「老團」，後者為「4派」、「老4」。因而，廣義上，兵團包括團派與4派二者在內，即使4派的正式名稱也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414總部」；狹義上，兵團特指與4派結成對立統一關係的團派，反過來說亦然。不僅團派把自己有別於4派並以兵團正統自居，而且4派也自視為與團派平起平坐的兵團主流。兩派的分歧和矛盾不斷升級，導致雙方走向衝突、武鬥，最終導致它們各自的組織以至整個兵團的消亡。兩派的關係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 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3月為分歧階段。兵團剛確立自己在清華的主導地位，原井岡山紅衛兵便加緊擴大和鞏固自己的權力。一是對非井岡山紅衛兵加以限制，以聯合、團結為由，指責那些不滿於兵團總部某些主張和策略的所謂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山頭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甚至給昔日盟友扣上「托派」的帽子，下令解散敢提批評的戰鬥小組；二是對自己的嫡系倍加關照，即使他們犯了「錯誤」，也內外有別；三是以「我」為中心，下令解散非井岡山紅衛兵縱隊，強化自己的集權；四是否定清華幹部特殊論，認為清華幹部必須自己站出「亮相」才能定性，卻又獨自給原清華校級幹部定性並決定對他們實行群眾專政。針對這些，非井岡山紅衛兵認為，造反派不等於革命派，奪權前與奪權後的紅衛兵不能一概而論，井岡山紅衛兵不能一統清華天下，包辦一切。兵團總部迫於壓力，多次進行整風活動，但從未達到內部思想上的統一。隨着時間的推移，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兵團面前：如何對待急於要求「解放」和工作的原清華中、基層幹部？

(2) 1967年4月至8月為分裂階段。1967年《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評論員文章及調查報告，批判清華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

動路線，這篇文章在清華園引起很大反響。4月14日，由五個縱隊等組織召開「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現革命三結合串聯會」，成立了「414革命串聯會」，藉《紅旗》上的文章來批判那種否定一切幹部的做法。該串聯會隨後與兵團總部進行了多次會場辯論和會場糾紛，前者要求為幹部平反、平黑，後者要求幹部自己起來造反。4月29日，原團委副書記譚浩強、原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征啟代表147名原中、基層幹部發表致革命幹部公開信，認為幹部們受了10個月的迫害，要求平反，要求工作，指責兵團的幹部政策有缺點、錯誤。這封信是對414串聯會的響應和支持。兵團總部反駁說，譚等不是中央文革肯定的幹部，上述公開信是「復辟舊清華的宣言書」。5月9日，414已不參加兵團會議，而自己單獨召集會議。4月30日，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11人）成立，兵團總部封它為在革委會成立之前的校臨時領導機構。兵團總部對414既打又拉，由不承認414的合法性到被迫承認414，都是為了盡快建立革委會。5月12日和21日，謝富治來清華促使兩派達成四項聯合協議，確定了擴大的22人的革籌小組名單。414群眾指責自己代表的妥協，拒絕四項協議中關於必須執行革籌小組和兵團總部的決議條款。5月24日，兵團總部下發革委會成員討論名單，要求一定要在5月30日成立清華革委會。414針鋒相對，拒絕參加自己只佔少數席位的革籌小組及成立革委會的一切準備工作。5月29日凌晨，414廣播台宣布成立414總部，發表成立宣言，正式與兵團總部決裂。5月30日，由於轉來周恩來不出席成立大會的通知及意見，最主要的是414的致命一擊，使團派的革委會之夢永遠消失了。6、7月，兩派儘管試圖聯合，但由於團派堅持必須執行四項協議，而4派堅持自己的總部與團派總部對等的原則，使雙方的矛盾不可調和。

(3) 1967年9月至11月為暫時聯合階段。迫於種種壓力，兩派於9月21日成立了兵團聯合總部，並於11月8日才遲遲正式宣布成立聯合辦公室、聯合廣播台、聯合政治部，取消各自的相應機構，組成由團

派17人、4派16人為委員的聯合總部委員會。團派有些人對此深為不滿，拉出了自己的組織「鬥私批修聯絡站」，聲稱要「鬥蒯大富的私，批414的修」，因為蒯急於要當聯合之後的革委會頭頭，而414內部有人炮打陳伯達及中央文革，給團派排擠4派找到口實。兩派的矛盾沒有因為暫時的、表面的聯合而縮小，反而變得更加尖銳和擴大，雙方發生了武鬥及衝擊對方會場、辦公場所的事件。兩派都已意識到更大規模的武鬥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4) 1967年12月至1968年4月中旬為糾紛和武鬥階段。自1967年12月起，兵團文革運動的重點已完全轉向校內，團派與4派的對立愈益集中在如何評價文革前的清華及其幹部的問題上。團派認為，文革前17年的清華是黑線專政，幾乎無可取之處。清華的幹部，尤其是50年代培養並相繼任職的，是資反路線的第二、第三套班子。這些幹部作為「新生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比起舊社會出來的知識份子更加反動與危險。4派把團派的這套理論稱之為「大翻個理論」，即從根本上否定1949年以來的中共領導、顛倒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兩派的理論交鋒此時轉向行動中的衝突。由於原中、基層幹部大批倒向4派一邊，加上團派風聞4派將推舉原中層幹部出任未來的革委會領導（而團派麾下的革委會三結合幹部沒有甚麼代表性），於是他們以一首林彪語錄被改為414戰歌為藉口，於12月初下令通緝4派總部6名委員，其中一人被抓。12月4日，團派綁架、毆打和秘密關押了4派大力保護和推舉的原清華核能研究單位200號領導人呂應中，並於12月6日、9日、20日查抄了20多名站在4派一邊或同情4派的原清華中層幹部的家，其中一些幹部被打傷，一些被抓走。兩派之間還發生了數十起小規模的流血武鬥。兩派互相衝擊對方的要地，大造聲勢，盡可能的要壓倒對方。12月25日，團派為紀念1966年12月25日行動一周年，便進城遊行宣傳，大叫要立新功，要為中共九大掃清道路，要造反派進入中共中央。次日，4派也進城遊行宣傳，直斥蒯大富想當中央委員，大拆團派的台。1968年1月3日下午，兩派為爭奪學生12號樓中的4派

紅尖兵廣播室，發生了第一次有數百人參加的大規模武鬥，武鬥直至次日清晨才結束。1月30日（春節），任職4派總部宣傳部的羅征啟在家中被綁架，3月27日羅因不堪折磨逃離關押點，團派匆忙於當晚抓走工物系教師、4派辦公室幹部賈春旺等人，對之加以關押、毒打。2月23日，4派在給中共中央有關方面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幹部問題是清華建立革委會的關鍵，提議讓原清華黨委委員8至10人進入革委會，斷定由「革命小將」擔任革委會第一把手是不適宜的，要求中央委派軍代表或他人擔任。4月4日晚，一直監視羅征啟家的團派保衛組抓走羅之弟羅征敷（北京第一機牀廠工人，28歲），毒打後用擦車棉紗堵住其嘴，並將他塞入後車廂，拉回清華，活活悶死。4月14日、15日，團派關押了所謂「羅文李饒」案中的文學宓、李康、饒慰慈、劉承嫻（皆為中層幹部，與羅一起支持4派的幹部政策）等人。此案造成3人死亡，20餘人受摧殘。4月20日，4派為了報復，抄了原電機系黨總支副書記、代書記陶森的家，把陶綁架至4派佔領的科學館，因為陶代表31名幹部批判了4派的幹部政策。4月23日上午，團派和4派開始了震驚中外的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

(5)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為「百日大武鬥」階段。關於這一階段，筆者有專文另述，這裏僅作簡要描述。兩派在百日大武鬥中共有11人死亡，30餘人殘廢，300多人受傷。7月下旬，工人宣傳隊進校，又造成5名工人犧牲，731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折合當時人民幣逾千萬元。1968年8月之後，宣傳隊接管學校，團派、4派乃至整個井岡山兵團自行解散、消亡。

四 兵團的建制

兵團的領導機構和組織建制是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兵團的正式領導機構是總部委員會，蒯大富、

韓銀山、鮑長康、馬小莊、劉才堂、陳育延、陳繼芳、任傳仲、王良生任常委，後來是4派領導人之一的孫怒濤曾任過常委。除韓銀山為原行政處幹部，全部常委皆為在校學生。在1967年6月之前，至少在團派與4派真正形成對峙格局之前，這一總部實際上臨時負責清華大學的日常領導工作。總部下轄總部辦公室、作戰部（又稱一部）、政治部、後勤部等常設部門，每一部門都由其核心組負責領導工作。總部辦公室設有秘書組、電話組、常務組、資料組。作戰部設有對內作戰部和對外作戰部，前者轄部隊^③辦公室、發放組、保衛組、三辦（專案）、鬥蔣兵團、大行動組、大批判組等；後者轄辦公室、社會調查組（又稱動態組，分為一動〔兵團動態〕、二動〔校內及414動態〕、三動〔首長講話及北京動態〕、四動〔中學動態〕、五動〔運事動態〕、六動〔國際動態〕6個小組）、全國聯絡站（辦公室、資料組、東北組、華東組、中南組、西北組等）。政治部設有辦公室、宣傳部、學生工作部、教工工作部、二辦（幹部辦公室）、組織部等。後勤部設有辦公室、科技組、財務組、生活組。根據情況需要，兵團還設置一些應急機構，如文攻武衛指揮部、「羅文李饒」專案組、呂應中專案組、鬥批改聯絡站、遵義學習班（學生學習班分部）、平型關學習班（幹部學習班分部）、戰地宣傳隊等。

兵團的組織建制是把各系、處等單位按軍事編制劃為01至15部隊（一度擴為20部隊），各部隊由若干戰鬥組構成。這些以革命術語或紅色詞句（如「契卡」、「刺刀見紅」、「指點江山」等等）命名的戰鬥組由人數不等、關係相對鬆散而志向相同的成員組成。兵團的群眾性組織主要有以學生為主的28團、以職工為主的「清華大學革命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等。

兵團的宣傳機構有《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廣播台、前哨廣播台、井岡山通訊社、井岡山雜誌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等，主要由兵團宣傳部負責。兵團在不同時間、不同範圍出版發行的刊物有《井岡山報》、《井岡山雜誌》、《井岡山通訊》、《文化大革命簡報》、

《學習資料》、《理論批判》、《整風簡訊》、《大字報選》、《內部資料》以及各動態組的有關動態等。這些刊物是由兵團總部的不同部門主辦的，其中有的刊物不僅信息量大、選題廣，而且在當時的北京及外地頗有影響。如，刻板油印的《井岡山通訊》在其發行的一年半左右，共出版了近千期，而且往往是一日數期，內容包括校內到校外、中央兼地方、工農商學兵幾乎各界的文革情況和動態。這些刊物表明，兵團重視信息情報的收集、整理工作，特別重視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及有關負責人的講話、指示，力圖通過自己的刊物所造的輿論聲勢來加強自己的形象和影響；進而還表明，兵團在建有較健全的政治、宣傳等機構的同時，也擁有較發達的、輻射全國的情報機構，這在當時的群眾組織中是極為少見的。無疑，這些刊物對於了解和研究清華以及全國文革初期的歷史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414的領導機構和組織建制是在「414革命串聯會」核心組之基礎上，於1967年5月底建立和發展起來的。414由其總部領導，總部委員有沈如槐、孫怒濤、陳楚三、劉萬璋、汲鵬、宿長忠、張雪梅、蔣南峰、李秀芙、傅正泰、譚浩強、任彥申等54人。414總部下轄總部辦公室、作戰部、幹部辦公室、宣傳部、組織部、保衛組、幹部參謀組、鬥蔣作戰部、政治部、行政管理總勤務站、鬥批改辦公室以及後來的文攻武衛總指揮部。作戰部設有第一作戰部（負責北京及校內）、第二作戰部（負責大批判）、第三作戰部（負責全國，轄辦公室、資料組、軍事組、東北組、華北組、華東組、中南組、西北組、西南組）。宣傳部設有動態組、簡報組、廣播台、報紙編輯部、發放組。414總部儘管在規模上小於團派總部，但是它十分重視基層建設，在基層單位共有12個部隊（亦稱01-12支隊）和較完整的分部機構。414的群眾組織主要是以學生為主的東方紅戰團和以教工為主的二七戰團。414最盛時期自稱有7,000人。

414在不同時間、不同範圍出版發行的刊物有《井岡山報》、《414戰報》、《情況簡報》、《井岡山參考資料》、《大字報選》、

《清華414通訊》、《教革》、《聯合風暴》、《滿天紅》、《重要文件》等。這些刊物在創辦時間上晚於團派刊物，在選題範圍、信息含量等方面也難與團派刊物平分秋色。在報導有關校外文革情況時，兩派刊物常常雷同。只是在涉及到清華文革形勢和兩派歧見時，兩派刊物才楚河漢界，涇渭分明。兩派愈是到了後期，愈是利用各自刊物盡其所能地抨擊甚至詛咒對方。實際上，兩派刊物是「互補的」，即在一方的偏頗處可發現另一方的特色。若要「解讀」整體意義上的井岡山兵團史和清華文革初期史，這種互補性是不能忽視的。

五 幾點評價

(1) 兵團的歷史證明，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最難以駕馭的運動，群眾組織（包括造反組織和保守組織）遠不是黨的群眾組織。它們本身既是自發的，更是自覺的；既是瘋狂的，更是理智的；既「發祥」於黨的謀略，更超越黨的約束。黨的鬥爭由非黨的群眾組織充當其主體和動力，並變為群眾運動，這是文革初期歷史的、必然的「二律背反」，也是整個文革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不可化解的矛盾癥結。

(2) 兵團的消亡標誌着文革初期造反派組織和個人在整體上的衰落，變本加厲的奪權，更主要的是曠日持久的內訌和武鬥，使得造反派組織和個人不可能適時地把其興起的社會動盪轉變為社會穩定。他們把舊體制打倒了，但卻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新體制。以兵團為大羣的整個造反派的使命和作用在1968年秋瀕於結束，文革進入一個新階段。兵團的歷史角色在於演出了一幕不是「革命吞噬革命者」，而是「造反吞噬造反者」的鬧劇！

(3) 兵團的經歷所呈現於後人的是難以計數的大會、遊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激情奔瀉、內容枯燥的戰鬥文體，呼天喊地

的聲討和蠱惑，如火如荼、近乎無人性的武鬥，風捲如席的綁架、抄家，對敵手無所不用其極的舉措，而自身既有文過飾非、言行不一的劣根，也有唯我獨尊、唯我獨革的惡習，更有追逐功名、嗜權如命的醜態……。略過這些，筆者要問：兵團的成員作為當時中國最敏感、聰慧、自視為最具有社會義務感和歷史責任心的青年學生，他們最缺乏的是甚麼？恰恰是現代意義上的人文精神！

(4) 兵團與其說是一個紅衛兵組織，莫如說是一種紅衛兵運動。紅衛兵組織作為文革中的青少年組織雖然延續了十年，但紅衛兵運動實際上只有兩年左右的歷史。這種紅衛兵運動儘管按照自上而下的政治指令來進行自下而上的政治掃蕩，試圖為青年尋求一條變革社會而實現大寫的自我的途徑，但它從未擺脫專制及專制主義的羈絆，本身恰恰就是這種專制及專制主義的社會文化的二元怪物：即在思想上，它是一種反獨斷主義的獨斷主義；而在政治上，它是一種反極權主義的極權主義。它似乎成了60年代末青年一代反抗社會、拒絕權威破滅了的神話或偶像。紅衛兵運動既把大批判、大武鬥、大拒絕之火引向社會和人民中間，又把分裂和滅亡之火引向自身，它在企圖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歷程中走進了自我異化的歸宿。兵團在諸多方面給我們留下無窮的思索。

註釋

① 掛職。

② 在此文「編者按」中還指團派在廣東要打倒黃永勝，在山東要打倒楊得志。

③ 系、處等單位的代號。

紅衛兵運動的喪鐘： 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

唐少傑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發生在北京清華大學的百日大武鬥，是文革期間北京地區規模最大、持續最久和意義最深的武鬥，它不僅成為文革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且影響到文革的進程以及紅衛兵運動的命運^①。考察清華百日大武鬥，可以看到文革群眾運動內部派性鬥爭的特點及結局。

一 起因

1967年4月，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分裂為兩個對立的群眾組織：井岡山兵團總部（團派）和414總部（4派）。兩派在一系列文革問題上針鋒相對，不可調和。1967年底，兩派開始一些小規模的武鬥衝突，互相襲擊對方的場所和綁架對方有關人員。1968年1月至4月，衝突不斷加劇。4月中旬，團派扣押4派重用的一些原清華幹部，造成「羅文李饒」案^②。4月20日，4派綁架站在團派一邊的原清華幹部陶森作為報復，並決定4月23日在禮堂召開批陶大會。團派決定反擊，百日大武鬥由此開始。

團派之所以要發動大規模武鬥，主要在於：(1) 3月24日，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揪出後，團派急於把他們與4派掛鉤，鼓吹楊余傅的黑後台就是414的黑後台。團派頭目想方設法使中共中央直接過問清華問題。(2) 3月27日，北京大學以聶元梓為首的新北大公社挑起武鬥，戰勝其對立面——北大井岡山派。中共中央文革支持新北大公社，使聶一夥由武鬥前的不利地位轉變為武鬥後的有利地位。團派頭目想借用北大的經驗，通過決戰性的大武鬥，逼中共中央表態支持自己，從而一舉壓垮4派。(3) 4派抓走陶森「點燃」團派引爆大武鬥的導火索。

4月21日零時，團派宣布在4派根據地之一及關押陶森的地處——科學館周圍實行宵禁，團派千名群眾還舉行了抗議示威。同日，團派數次召開武鬥會議，對是否包圍、攻打科學館並給其斷水斷電進行討論。蒯大富指出，清華兩派鬥爭一年多未見分曉，最後解決總要伴隨大武鬥，先下手為強，誰早誰主動。團派作戰部長聲稱，寧可傷亡500人，也要攻下科學館。儘管會上有人反對武鬥，但還是通過當晚包圍科學館的決議。會後，團派幾個分部群眾經過討論，拒絕執行此決議。4月22日，為抗議團派頭目和某些群眾的「軟弱」，團派廣播台及前哨廣播台「罷工」。同日，團派多次召開會議，統一在武鬥上的思想和步驟。在深夜舉行的總部擴大會議上，蒯大富分析形勢，講明利害，「只要我們挑起武鬥，擴大事態，就迫使中央表態，於我們更主動。」「清華的問題不只是清華的問題，非中央過問不能直接解決。」「沒有武衛就搞不了文攻。」「再不搞武鬥，革命幹部從此就要離開我們，戰士們也灰心喪氣，紛紛不幹了。」「我們的隊伍就要分裂、垮台。」會上，決定立即實施封鎖科學館、佔領禮堂的行動，成立6人組成的「文攻武衛指揮部」，並對有關頭目和隊伍做了分工、部署。為防止走漏風聲，在當夜零點左右派人佔領禮堂，從地下管道運進大批鋼管製成的長矛後，會議人員才得以離會。值此之際，團派做好了大武鬥出擊的充分準備。

二 過程 (4.23-7.26)

4月23日凌晨，團派佔領禮堂後，又佔領新、舊水利館。清晨，團派保衛組發出封鎖禮堂區、指責4派向禮堂偷運480根長矛的1號通告。4派佔領舊電機館，並相繼佔領動農館、土建館、汽車樓。團派決定攻打舊電機館，這關係到兩派在禮堂區的勢力對比。從9時至15時，團派出動上百人攻佔了4派數十人守衛的舊電機館，雙方動用了石塊、瓦片、硫酸、長矛等，約有50人受傷。自即日起，兩派在幾天內各自加緊搶佔學生宿舍和教學樓等。4月24日至28日，兩派不斷衝砸對方的辦公場所，破壞對方的廣播設施，查抄對方一些教職員工的住所，加強斥責對方的宣傳攻勢，構建武鬥工事和修築路障等。25日晨，團派數百人進攻科學館；28日晨，團派200多人攻打8號樓，兩次均告失敗。27日，4派被俘人員姜文波從2號樓三樓關押點逃出，因被追趕而跳樓，頭部先觸地死亡。29日中午，團派200多人和四輛卡車去9飯廳搶糧，遭遇4派60多人攔截，雙方用長矛、石塊等激戰。團派一卡車朝4派隊伍衝去，當場壓死4派人員謝晉澄。

至4月底，清華已有60%的人員離校逃難。自4月底至大武鬥結束，兩派不斷從外地、外單位運進武器，並且大力試製、生產各種土武器，如土炮、土火箭、土炸彈、土手榴彈、長矛、燃燒瓶、彈弓車（強弩）、地雷、槍枝、匕首以及拖拉機改裝的土坦克和用汽車改裝的土裝甲車等。團派還成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國防工辦」），專門負責試製、生產專用於武鬥的武器。

5月上旬，團派攻佔材力館、土建館等地。4派攻佔工字廳等地，並摧毀團派的多處工事和路障，破壞團派佔領區的電話線路。雙方各有人員負傷和被俘。兩派各以多種方式表示絕不妥協的決心，如5月5日，4派上千人在天安門廣場抬着謝晉澄屍體舉行集會和遊行，表示一定向團派討還血債。5月10日，4派在動農館前再次舉行批鬥陶

森大會。團派文攻武衛指揮部緊急命令，調動四輛土裝甲車和200多名武鬥人員衝擊會場，兩派均有許多人負傷。

5月中旬，4派佔領焊接館、工物系館和整個主樓等地，團派佔領9003大樓、綜合機械廠等地。兩派各出動上百人的隊伍向對方有關據點進攻，均告失敗。14日，4派人員孫華棟被團派人員綁架毒打後死亡，4派於26日抬着孫之屍體進城遊行示威。19日，4派綁架團派總部常委陳育延，6天後因陳疾病復發而被釋放。大武鬥期間，團派聲稱4派組成暗殺團要暗殺蒯大富等人，4派指責團派試圖綁架或傷害外出的4派頭目。

到5月下旬，兩派繼續襲擊對方的據點或要塞。25、29日團派多次開會，商討並籌備以武鬥「紀念」1967年5月30日團派革委會流產一周年，以雪對4派扼殺該革委會成立之仇，確定以4派佔據的東區浴室為攻打目標。

從5月30日3時（一說3時30分）蒯大富在清華電廠拉斷總電閘作為進攻信號起，團派與4派激烈交戰，相持不下。到中午12時許，團派調集數百公斤汽油潑入浴室，塞入大量草墊子、木桌椅凳和乾辣椒，從內部燃起大火。消防隊5輛消防車趕來救火，被團派阻止。13時許，在團派燃起的大火以及喊話勸降下，4派守軍最終打着白旗下樓。

14時，4派總部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等人緊急報告，要求制止團派武鬥，營救被俘人員。深夜，5、12號樓的4派人員被迫撤至4派「中心根據地」——焊接館。至此，團派控制了清華80%的地盤。校內非武鬥人員紛紛離校。

5月30日團派攻佔東區浴室的大武鬥持續近11個小時，是百日大武鬥中兩派損失最大、傷亡最重的一次。團派投入300多人、亡2人；4派投入300餘人、亡1人；兩派共有200多人負傷。雖然東區浴室被攻克，但是僅有21人的4派守軍卻使團派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超出了此次大武鬥發動者的預想，並使得團派日後再也不敢向4派發動大進攻。

6月，儘管兩派基本上都處於武鬥「休整」階段，但是，在加強鼓動自己隊伍士氣的同時，兩派加緊了在城區許多公共場所和重要機關駐地進行抨擊對方的宣傳攻勢（如貼大標語），並多次造成兩派人員在城區不期而遇的毆打械鬥。兩派還不分晝夜地出動游擊人員，武裝偷襲或騷擾對方據點，破壞對方設施，等等。6月19日團派崗哨向8號樓開槍射擊，武鬥升級，進入槍戰階段。6月30日上午，8號樓的4派人員全部撤往科學館，與團派隊伍在禮堂東面相遇，雙方動用了手槍、手榴彈、長矛、石塊等。4派投擲的手榴彈炸傷團派近10人，4人重傷，其中一人腿被炸斷，另一人腸子被炸壞。團派總部遂決定武裝封鎖科學館，凡有出入者一律開槍射擊。4派總部宣布處於「一級備戰狀態」。

7月上旬，團派頭目針對下屬武鬥人員怕開槍打死人負責之事，多次聲明：「打死人由總部負責，不由個人負責。」團派武裝封鎖了4派與校外的唯一通道——東門及周圍地區，並用試製的土迫擊炮轟擊科學館，未成功。7月4日、5日、6日團派一連三日開槍擊中4派人員朱育生、楊志軍、楊述立，三人相繼死亡。

7月7日16時，4派近百人在天安門前召開「呼救大會」，並抬着楊述立的屍體，在天安門、前門、北京市公安局和市革委會所在地以及使館區遊行，抗議團派暴行，向有關方面施加壓力。

7月9日8時30分左右，團派武鬥人員用大彈弓向科學館四樓（四樓基本上是木製結構）頂層上的廣播喇叭群支撐木架拋擲燃燒瓶，燃起大火。四樓北、南部先後燒塌，站在禮堂屋頂都感到火勢灼人。9時，設在科學館中的4派電台致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緊急呼救。9時許，蒯大富發表廣播聲明，敦促4派投降。團派廣播台喊話勸降20餘次，說大火是4派自己放的，是「新的國會縱火案」等。10時許，消防隊前來救火。經團派一番刁難、檢查後，12時多才進入科學館。團派限令，消防隊須在18時前撤離。消防隊撤離時又受到檢查，團派迅即重新封鎖科學館。

7月16日10時30分，4派從動農館掘往科學館的地道（未完工）被團派從掘進端處爆破炸毀。團派從炸塌處往地道內灌水、投手榴彈，俘獲一名4派施工人員。此次爆破使4派總部營救科學館的突圍計劃最終失敗。科學館內，兩具屍體無法運出，早已腐臭。20多名傷員傷口感染、惡化。100餘人為防止槍擊中彈，只能在炎熱中擠在樓道內生活。20多天裏，未運進任何食物和蔬菜。臨時掘的一小口水井，遠不夠使用。7月18日，錢平華從蘇州家中返京回校，因不知東門已被封鎖，從該門進入後，遭團派槍擊死亡。

進入7月後，北京市革委會針對許多高校發生嚴重武鬥，多次召開有關制止武鬥、宣傳並貫徹中共中央「7·3」布告（關於制止廣西省武鬥的布告）精神的有關會議，準備在中關村召開制止武鬥群眾大會和派遣宣傳隊在高校地區進行宣傳遊行。謝富治指示團派提交關於制止武鬥的方案，並向團派頭目打招呼可能要派工人遊行隊伍進清華宣傳。7月6日至25日，團派總部召開數次會議討論制止武鬥問題。團派一些頭目強調：「7·3」布告不適用於清華；團派與4派的武鬥有特殊性；團派必須用攻佔科學館的既定事實來求得武鬥後的優勢。團派總部向北京市革委會等有關方面提出停止武鬥的三個條件：由北京衛戍區正式逮捕4派核心人物及羅、文、李、饒等人；由北京衛戍區派部隊進校制止武鬥首先要拆除科學館工事；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會直接解決清華問題。團派對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會關於制止武鬥的指示並未予以足夠的重視，至少沒有做出應有的預測，更不用說做出切實的響應了。相反，6月下旬以來，勢力相對弱小的4派多次（最後一次是7月26日）要求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會派宣傳隊進駐清華，或對清華實行軍事管制，以求真正打破團派在清華的霸主地位，結束武鬥從而結束自己的整個武鬥的被動地位。儘管我們至今還不清楚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會特派宣傳隊開進清華的內幕，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制止清華曠日持久的大武鬥，表明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

決心在北京眾多高校乃至全國結束武鬥，並通過清華來樹立一個從外部依靠工人群眾結束武鬥的典型。顯然，自「5·30」大武鬥後，團派和4派基本上處於相持狀態。隨着全國性的武鬥形勢的發展，清華的武鬥既不可能單純以清華人的意願來左右，也不可能是武鬥雙方所能根本解決的。

三 工宣隊攻佔清華園 (7.27)

7月26日17時30分至次日凌晨2時，北京市革委會在北新華印廠召開宣傳隊開進清華大學的動員大會。市革委會負責人和約有63個單位的負責人出席會議。

7月27日清晨，北京市61個單位3萬多工人組成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最初稱「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後稱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從各自單位出發，奉命開往兩派武鬥人員總共600多人的清華大學，進行制止武鬥、拆除工事、宣傳「7·3」布告等工作。該宣傳隊的領導實際上由中共中央警衛部隊（8341）在北京一些單位的軍代表擔任，他們負有特殊使命。約9時至10時，宣傳隊各路隊伍抵達清華南門、西門（主要隊伍在此）及東門。宣傳隊指揮部要求全部隊伍必須於11時開進清華校園。

團派對這突如其來、聲勢浩大的宣傳隊，事先毫無所知或準備，把數萬人的宣傳隊訛傳成10多萬，但他們十分明白，宣傳隊的開進意味着團派稱霸清華的結束。團派作戰部長帶隊帶武器趕至西門阻攔宣傳隊。後來，由南門等處先進來的宣傳隊開通西門，才使整個宣傳隊於中午時分進入清華園。宣傳隊下屬8個團按預先所定的計劃，差不多同時開赴各自任務所在的方位，以分片包幹而不是逐一推進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對兩派各據點的「分割」和「包圍」，發起宣傳、喊話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攻勢，以眾多的人勢（整個宣傳隊與兩派武鬥人員之比約為50比1），把遇到的武鬥人員團團圍住（實為扣住），進行宣講工作。同時，宣傳隊開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鐵絲網、電網等。

11時30分，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電話通知蒯大富（因蒯不在，讓人轉告）：宣傳隊要開進清華，團派要大力支持宣傳隊。12時多，接到團派多處據點告急的消息，蒯在靜齋召開團派總部會議，決定：（1）緊急上告北京市革委會和中共中央；（2）命令各據點抵抗宣傳隊，必要時可使用武器。團派頭目已意識到團派到了生死關頭，通過電話以及派不易被識破的小孩穿過宣傳隊重重隊伍，把抵抗的命令傳達到團派各武鬥據點。14時多，蒯大富赴市革委會「告狀」，結果與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大吵一通，揚言團派「以死一拼」。晚飯後，在謝富治、吳德、宣傳隊代表與蒯參加的會議上，謝命令蒯：停止武鬥，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出武鬥據點；並指示蒯與宣傳隊代表一起立即回清華實施上述命令。

當日中午，宣傳隊進入科學館，查繳4派武器，館內人員全被帶出。宣傳隊抵近禮堂時，團派人員引爆電發地雷。經過談判，宣傳隊被允許進入禮堂，搜查出一些武器及武鬥工具。宣傳隊在電廠與團派對峙，團派頭目下令開啟電網電閘，以阻止宣傳隊進入電廠。自13時多至深夜，靜齋的團派用石塊、長矛等向靜齋後門的宣傳隊衝擊，使許多工人掉進荷花池（即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一天下來，用長矛和手榴彈連刺帶炸，使100多名工人負傷。明齋的團派也負隅頑抗，造成130多名工人負傷。到下午5時多至6時，先後有王松林（北京第二機牀廠副科長）、張旭濤（北京541工廠工人）、潘志宏（北京市供電局工人）被團派用手榴彈炸死。一教樓等地的團派還各自為戰，頻頻對其周圍的宣傳隊出擊，又使一些工人負傷。7月27日近23時，靜齋的團派前往9003大樓增援，用長矛刺死在三樓一房間小息的韓忠現（北京第一食品廠工人），約10分鐘後，又開槍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膠四廠工人）。9003大樓外實際上有數千名

工人圍樓。該樓的團派一直到7月30日才被迫由解放軍「保護」撤出，這也是百日大武鬥的最後一個據點。

約20時，與宣傳隊代表一起返回清華的蒯大富被帶至清華園中學一教室，與宣傳隊主要指揮、北京新華印刷廠革委會主任、軍代表遲群等人商討停止武鬥之事，經過爭吵，達成四項協議：停止武鬥，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出武鬥據點。雙方約在22時45分簽字後，蒯與5名工人代表、1名軍代表前往明齋團派廣播台落實廣播上述協議。蒯把代表們擱置一旁，在另一房間召開團派頭目及有關人員30多人參加的會議。蒯先講了形勢的嚴峻，又講了與工人對抗下去的兩種危險：一是全力攻打工人會因工人的死傷大大增加而置團派於死地，另一是團派被工人打得全軍覆沒；他最後建議：為保存勢力以圖東山再起，團派必須全部撤離清華，並希望得到中共中央上層的解救。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烈爭吵，儘管有人提出拉隊伍去京郊山區打游擊，但會議還是決定在7月28日凌晨2時30分前，團派全部人員攜帶武器撤離清華（實際上，團派幾個武鬥指揮和個別據點並未撤離）。

團派頭目及武鬥的大批人馬撤至北京航空學院，企圖留給宣傳隊一個難以待下去的「空校」。團派另一支數十人的隊伍乘車撤往昌平縣內的清華核能研究單位200號，因司機數日未眠，駕車睡着，凌晨4時左右行至沙河附近，車翻入路旁稻田。一團派人員上車時把攜帶的手榴彈環拉出，以防外人截車。車翻時，手榴彈引爆，炸死2人，炸傷5人。

1968年7月27日不是團派與4派，而是團派與宣傳隊的大武鬥之日。在這一天的12個小時（正午至子夜）裏，宣傳隊有5人犧牲，731人負傷，其中重傷149人（軍代表10人，工人139人），輕傷582人（軍代表30人，工人552人），143人被抓（軍代表34人，工人109人）。宣傳隊扣留了100多名團派人員。4派據點幾乎是全部向宣傳隊敞開，不存在4派與宣傳隊為敵的問題。「7·27」大武鬥迅猛地震動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

四 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 (7.28)

7月28日5時30分，蒯大富在郵電大樓致電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以及中共中央文革、中央軍委：「7·27在黑手晝夜策劃下假借宣傳七三布告挑動11萬不明真相的工人攜帶凶器突然包圍洗劫清華園，我井岡山戰士數百人遭毒打，數千人被捕未救。為避免跟工人再發生衝突，我井岡山戰士全部撤出清華。衣食無着、生命安全無保證，清華井岡山生命垂危、形勢萬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尋求中央馬上接見。」蒯剛返回北航，北京市革委會來電通知他參加毛澤東等人的召見，蒯接此通知懷疑此事，擔心被「黑手」陷害，後由聶元梓親自通話，才前去人民大會堂。

7月28日3時30分至8時30分，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這是毛澤東在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召見紅衛兵代表談話。蒯到會時已近7時，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已匯報完畢。雖然我們至今還不清楚此次召見談話的全部，但根據同日正式發表的、由五大領袖署名整理出的〈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中^③，可以看出：(1) 以清華百日大武鬥特別是「7·27」大武鬥為契機，毛澤東對紅衛兵領袖的嚴厲批評表明他對紅衛兵運動失去信心，對紅衛兵組織及其領袖已不抱希望。(2) 毛澤東決心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國結束武鬥。為達此目的，他既要醞釀淘汰文革初期效過犬馬之勞的紅衛兵領袖，又威脅說不惜動用正規軍武力來結束武鬥。他本人不但被全國性的群眾武鬥所困擾、煩惱，而且還要窮於應付這種武鬥。(3) 毛澤東對群眾武鬥所帶來的教育界文革如何搞下去的四個辦法表明，他開始考慮把現有的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從整體上列入文革的對象。這一點在他8月的一系列指示中得以體現。(4) 毛澤東明確告知紅衛兵領袖們，派遣宣傳隊是他的決定，不容懷疑或否定，更不容抵抗。在召見之後，蒯大富在很小的範圍傳達，毛講：「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嗎？這個黑手就是我，他也不來抓。」這對團派以武力抵抗宣

的殘酷程度中意識到武鬥註定包含的自我否定、自我滅亡的因素。百日大武鬥致使18人死亡，1,100餘人負傷，30多人終身殘疾，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折合當時人民幣上千萬元。從當時的角度講，由於宣傳隊的介入，百日大武鬥使得4派不勝而「勝」，使得團派不敗而「敗」。從歷史的角度講，兩派在百日大武鬥中沒有勝負或不分勝負，在清華兩派的武鬥中，利益對利益的戰鬥、要求與要求的抗衡、目的同目的的衝突，使當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及口號總是處於次要的、唯己所需地加以實用的狀態，使有關的政令法規總是陷於尷尬無為的境界。

百日大武鬥給教育界文革帶來了決定性的轉折。毛澤東看到，已不能依靠教育界的激進群眾來完成教育界文革的任務，同時，他更加感到，教育界文革的對象已遠遠不是1949年前學成和1966年前學成的知識份子以及「走資派」。通過清華大學這個典型，毛澤東在8月以多種方式來表明「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門、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⑤。8月5日，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通知中說：「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已到」^⑥，中共中央領導層力圖把教育界文革納入自己的而不具教育界人士的軌道。8月26日，姚文元著文〈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對毛澤東改變教育界文革的戰略作了闡述^⑦：

單靠學生、知識份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份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傳隊進校不啻是致命的評判。(5) 一貫最善於捉摸毛澤東心理的林彪，給這次召見以及紅衛兵領袖的「錯誤」畫龍點睛：「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幹甚麼。」④紅衛兵領袖的「落伍」意味着紅衛兵運動的衰落。

7月29日至31日，「逃難」於北航紅旗戰鬥隊場地的團派多次召開總部擴大會議以及群眾骨幹會議。蒯大富數次有選擇地傳達毛澤東的召見講話，力圖把毛的講話置於有利於團派而不利於4派的程度，力圖多給團派群眾一些穩定情緒的信息。在這些會上，大多數團派人員的舉動反映出團派徹底消亡前的心態。在有的會議上，還貼出「留得井岡豪氣在，三年歸報劉鄧仇」，「雪裏梅花開不敗，井岡山人敢上斷頭台」的大標語。迫於有關當局的多方壓力和督促，團派人員於8月2日開始返回清華。同日，北京市革委會領導人通知團派頭目：宣傳隊要在清華駐下去。自8月中旬起，包括團派在內的清華人員開始「接受」宣傳隊的領導和改造。

五 武鬥的性質及影響

「武鬥」作為文革特有的現象和事實，它既不能只用軍事領域的戰爭、戰役和戰鬥去界定，也不能從宗教戰爭的角度去理解。「武鬥」是指文革中，在同一社會制度、同一信仰體系甚至是在同一價值規範的條件下，並且更多的是在同一地區、同一單位或部門中，某一群眾組織從政治上和精神上跟敵對群眾組織進行的武力鬥爭，也就是說，它是具有強烈派性色彩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武力鬥爭。在文革初期特定的歷史下，由於中共黨的領導和權威大大削弱，眾多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崛起，使處於不同階層、具有不同利益和為了不同目的的群眾，在形成了自己組織暫時的合法性和相對的權威性之際，面臨着如何對待或超越其他群眾組織的問題。而哪一群眾組織具有正統性乃

至最高權威性，這既不能脫離黨的制約的軌道，又不能通過當代民主政治的程序來加以抉擇或運作，而只能通過群眾中間自覺或自發的武力鬥爭來爭取，但沒有任何一個群眾組織達到了自己的目標。因為，武鬥的進程和結局往往不是由武鬥雙方的群眾所左右的，而是由上級當局及其指使下的外來群眾來仲裁，並進而收拾其殘局。武鬥中通行的格局是武鬥雙方各為一端，而上級當局又為一端。這種格局表明：不管文革的群眾組織及其武鬥對於當前社會秩序產生多麼大的離心力，它們最終會被高度政治化了的的文化制度所化解；進而還表明：儘管武鬥的主角是由群眾擔當的，但群眾在武鬥乃至整個文革中的命運卻不是自主的。

百日大武鬥提出的問題是：文革的群眾運動為甚麼只能由群眾的武鬥來收場？為甚麼對立的群眾組織只能以武鬥的兩敗俱傷或兩敗皆亡為自己的歸宿？可以說，這些問題既有它們生長所需的政治專制的土壤，也有它們一時「泛濫」所需的文化獨斷以及從思想到言行絕對排斥異己的傳統背景，更有它們天然的趨向暴力的本性，但是，決定這些問題的根源依然是群眾中間不同的利益、要求和目的。這些非常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利益、要求和目的，使得文革既不是一場純粹的意識形態的革命，也不是一場改換各級官員職權的政治變革。結合清華大學文革的特點來看，青年學生是其領導和群眾的主幹。這些狂熱反對舊權威的青年學生，造反之後還未來得及確立自己的權威，就由自己運動的分裂而走向武鬥。當時，團派主要是由出身相當低下、文革前本人或家人經歷坎坷或急於想在文革中改善自己地位的激進群眾構成；而4派主要是由原清華幹部所影響和作用的、或文革前本人或家人處境較佳的相對保守的群眾構成，對於文革的許多方面有所疑慮。兩派的群眾基礎或群眾成分是如此的不同，他們就必然對清華的文革之發展帶來截然不同的作用，亦必定把打倒對方作為建立自己權威的首要條件，甚至愈到後期，同對方的鬥爭愈益成為關係着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同時，兩派都沒有料到武鬥的悲慘結局，沒有從武鬥

的殘酷程度中意識到武鬥註定包含的自我否定、自我滅亡的因素。百日大武鬥致使18人死亡，1,100餘人負傷，30多人終身殘疾，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折合當時人民幣上千萬元。從當時的角度講，由於宣傳隊的介入，百日大武鬥使得4派不勝而「勝」，使得團派不敗而「敗」。從歷史的角度講，兩派在百日大武鬥中沒有勝負或不分勝負，在清華兩派的武鬥中，利益對利益的戰鬥、要求與要求的抗衡、目的同目的的衝突，使當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及口號總是處於次要的、唯己所需地加以實用的狀態，使有關的政令法規總是陷於尷尬無為的境界。

百日大武鬥給教育界文革帶來了決定性的轉折。毛澤東看到，已不能依靠教育界的激進群眾來完成教育界文革的任務，同時，他更加感到，教育界文革的對象已遠遠不是1949年前學成和1966年前學成的知識份子以及「走資派」。通過清華大學這個典型，毛澤東在8月以多種方式來表明「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門、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⑤。8月5日，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通知中說：「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已到」^⑥，中共中央領導層力圖把教育界文革納入自己的而不具教育界人士的軌道。8月26日，姚文元著文〈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對毛澤東改變教育界文革的戰略作了闡述^⑦：

單靠學生、知識份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份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傳隊進校不啻是致命的評判。(5) 一貫最善於捉摸毛澤東心理的林彪，給這次召見以及紅衛兵領袖的「錯誤」畫龍點睛：「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幹甚麼。」④紅衛兵領袖的「落伍」意味着紅衛兵運動的衰落。

7月29日至31日，「逃難」於北航紅旗戰鬥隊場地的團派多次召開總部擴大會議以及群眾骨幹會議。蒯大富數次有選擇地傳達毛澤東的召見講話，力圖把毛的講話置於有利於團派而不利於4派的程度，力圖多給團派群眾一些穩定情緒的信息。在這些會上，大多數團派人員的舉動反映出團派徹底消亡前的心態。在有的會議上，還貼出「留得井岡豪氣在，三年歸報劉鄧仇」，「雪裏梅花開不敗，井岡山人敢上斷頭台」的大標語。迫於有關當局的多方壓力和督促，團派人員於8月2日開始返回清華。同日，北京市革委會領導人通知團派頭目：宣傳隊要在清華駐下去。自8月中旬起，包括團派在內的清華人員開始「接受」宣傳隊的領導和改造。

五 武鬥的性質及影響

「武鬥」作為文革特有的現象和事實，它既不能只用軍事領域的戰爭、戰役和戰鬥去界定，也不能從宗教戰爭的角度去理解。「武鬥」是指文革中，在同一社會制度、同一信仰體系甚至是在同一價值規範的條件下，並且更多的是在同一地區、同一單位或部門中，某一群眾組織從政治上和精神上跟敵對群眾組織進行的武力鬥爭，也就是說，它是具有強烈派性色彩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武力鬥爭。在文革初期特定的歷史下，由於中共黨的領導和權威大大削弱，眾多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崛起，使處於不同階層、具有不同利益和為了不同目的的群眾，在形成了自己組織暫時的合法性和相對的權威性之際，面臨着如何對待或超越其他群眾組織的問題。而哪一群眾組織具有正統性乃

至最高權威性，這既不能脫離黨的制約的軌道，又不能通過當代民主政治的程序來加以抉擇或運作，而只能通過群眾中間自覺或自發的武力鬥爭來爭取，但沒有任何一個群眾組織達到了自己的目標。因為，武鬥的進程和結局往往不是由武鬥雙方的群眾所左右的，而是由上級當局及其指使下的外來群眾來仲裁，並進而收拾其殘局。武鬥中通行的格局是武鬥雙方各為一端，而上級當局又為一端。這種格局表明：不管文革的群眾組織及其武鬥對於當前社會秩序產生多麼大的離心力，它們最終會被高度政治化了的的文化制度所化解；進而還表明：儘管武鬥的主角是由群眾擔當的，但群眾在武鬥乃至整個文革中的命運卻不是自主的。

百日大武鬥提出的問題是：文革的群眾運動為甚麼只能由群眾的武鬥來收場？為甚麼對立的群眾組織只能以武鬥的兩敗俱傷或兩敗皆亡為自己的歸宿？可以說，這些問題既有它們生長所需的政治專制的土壤，也有它們一時「泛濫」所需的文化獨斷以及從思想到言行絕對排斥異己的傳統背景，更有它們天然的趨向暴力的本性，但是，決定這些問題的根源依然是群眾中間不同的利益、要求和目的。這些非常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利益、要求和目的，使得文革既不是一場純粹的意識形態的革命，也不是一場改換各級官員職權的政治變革。結合清華大學文革的特點來看，青年學生是其領導和群眾的主幹。這些狂熱反對舊權威的青年學生，造反之後還未來得及確立自己的權威，就靠自己運動的分裂而走向武鬥。當時，團派主要是由出身相當低下、文革前本人或家人經歷坎坷或急於想在文革中改善自己地位的激進群眾構成；而4派主要是由原清華幹部所影響和作用的、或文革前本人或家人處境較佳的相對保守的群眾構成，對於文革的許多方面有所疑慮。兩派的群眾基礎或群眾成分是如此的不同，他們就必然對清華的文革之發展帶來截然不同的作用，亦必定把打倒對方作為建立自己權威的首要條件，甚至愈到後期，同對方的鬥爭愈益成為關係着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同時，兩派都沒有料到武鬥的悲慘結局，沒有從武鬥

的殘酷程度中意識到武鬥註定包含的自我否定、自我滅亡的因素。百日大武鬥致使18人死亡，1,100餘人負傷，30多人終身殘疾，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折合當時人民幣上千萬元。從當時的角度講，由於宣傳隊的介入，百日大武鬥使得4派不勝而「勝」，使得團派不敗而「敗」。從歷史的角度講，兩派在百日大武鬥中沒有勝負或不分勝負，在清華兩派的武鬥中，利益對利益的戰鬥、要求與要求的抗衡、目的同目的的衝突，使當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及口號總是處於次要的、唯己所需地加以實用的狀態，使有關的政令法規總是陷於尷尬無為的境界。

百日大武鬥給教育界文革帶來了決定性的轉折。毛澤東看到，已不能依靠教育界的激進群眾來完成教育界文革的任務，同時，他更加感到，教育界文革的對象已遠遠不是1949年前學成和1966年前學成的知識份子以及「走資派」。通過清華大學這個典型，毛澤東在8月以多種方式來表明「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門、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⑤。8月5日，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通知中說：「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已到」^⑥，中共中央領導層力圖把教育界文革納入自己的而不具教育界人士的軌道。8月26日，姚文元著文〈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對毛澤東改變教育界文革的戰略作了闡述^⑦：

單靠學生、知識份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份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傳隊進校不啻是致命的評判。(5) 一貫最善於捉摸毛澤東心理的林彪，給這次召見以及紅衛兵領袖的「錯誤」畫龍點睛：「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幹甚麼。」④紅衛兵領袖的「落伍」意味着紅衛兵運動的衰落。

7月29日至31日，「逃難」於北航紅旗戰鬥隊場地的團派多次召開總部擴大會議以及群眾骨幹會議。蒯大富數次有選擇地傳達毛澤東的召見講話，力圖把毛的講話置於有利於團派而不利於4派的程度，力圖多給團派群眾一些穩定情緒的信息。在這些會上，大多數團派人員的舉動反映出團派徹底消亡前的心態。在有的會議上，還貼出「留得井岡豪氣在，三年歸報劉鄧仇」，「雪裏梅花開不敗，井岡山人敢上斷頭台」的大標語。迫於有關當局的多方壓力和督促，團派人員於8月2日開始返回清華。同日，北京市革委會領導人通知團派頭目：宣傳隊要在清華駐下去。自8月中旬起，包括團派在內的清華人員開始「接受」宣傳隊的領導和改造。

五 武鬥的性質及影響

「武鬥」作為文革特有的現象和事實，它既不能只用軍事領域的戰爭、戰役和戰鬥去界定，也不能從宗教戰爭的角度去理解。「武鬥」是指文革中，在同一社會制度、同一信仰體系甚至是在同一價值規範的條件下，並且更多的是在同一地區、同一單位或部門中，某一群眾組織從政治上和精神上跟敵對群眾組織進行的武力鬥爭，也就是說，它是具有強烈派性色彩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武力鬥爭。在文革初期特定的歷史下，由於中共黨的領導和權威大大削弱，眾多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崛起，使處於不同階層、具有不同利益和為了不同目的的群眾，在形成了自己組織暫時的合法性和相對的權威性之際，面臨着如何對待或超越其他群眾組織的問題。而哪一群眾組織具有正統性乃

至最高權威性，這既不能脫離黨的制約的軌道，又不能通過當代民主政治的程序來加以抉擇或運作，而只能通過群眾中間自覺或自發的武力鬥爭來爭取，但沒有任何一個群眾組織達到了自己的目標。因為，武鬥的進程和結局往往不是由武鬥雙方的群眾所左右的，而是由上級當局及其指使下的外來群眾來仲裁，並進而收拾其殘局。武鬥中通行的格局是武鬥雙方各為一端，而上級當局又為一端。這種格局表明：不管文革的群眾組織及其武鬥對於當前社會秩序產生多麼大的離心力，它們最終會被高度政治化了的的文化制度所化解；進而還表明：儘管武鬥的主角是由群眾擔當的，但群眾在武鬥乃至整個文革中的命運卻不是自主的。

百日大武鬥提出的問題是：文革的群眾運動為甚麼只能由群眾的武鬥來收場？為甚麼對立的群眾組織只能以武鬥的兩敗俱傷或兩敗皆亡為自己的歸宿？可以說，這些問題既有它們生長所需的政治專制的土壤，也有它們一時「泛濫」所需的文化獨斷以及從思想到言行絕對排斥異己的傳統背景，更有它們天然的趨向暴力的本性，但是，決定這些問題的根源依然是群眾中間不同的利益、要求和目的。這些非常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利益、要求和目的，使得文革既不是一場純粹的意識形態的革命，也不是一場改換各級官員職權的政治變革。結合清華大學文革的特點來看，青年學生是其領導和群眾的主幹。這些狂熱反對舊權威的青年學生，造反之後還未來得及確立自己的權威，就靠自己運動的分裂而走向武鬥。當時，團派主要是由出身相當低下、文革前本人或家人經歷坎坷或急於想在文革中改善自己地位的激進群眾構成；而4派主要是由原清華幹部所影響和作用的、或文革前本人或家人處境較佳的相對保守的群眾構成，對於文革的許多方面有所疑慮。兩派的群眾基礎或群眾成分是如此的不同，他們就必然對清華的文革之發展帶來截然不同的作用，亦必定把打倒對方作為建立自己權威的首要條件，甚至愈到後期，同對方的鬥爭愈益成為關係着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同時，兩派都沒有料到武鬥的悲慘結局，沒有從武鬥

的殘酷程度中意識到武鬥註定包含的自我否定、自我滅亡的因素。百日大武鬥致使18人死亡，1,100餘人負傷，30多人終身殘疾，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折合當時人民幣上千萬元。從當時的角度講，由於宣傳隊的介入，百日大武鬥使得4派不勝而「勝」，使得團派不敗而「敗」。從歷史的角度講，兩派在百日大武鬥中沒有勝負或不分勝負，在清華兩派的武鬥中，利益對利益的戰鬥、要求與要求的抗衡、目的同目的的衝突，使當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及口號總是處於次要的、唯己所需地加以實用的狀態，使有關的政令法規總是陷於尷尬無為的境界。

百日大武鬥給教育界文革帶來了決定性的轉折。毛澤東看到，已不能依靠教育界的激進群眾來完成教育界文革的任務，同時，他更加感到，教育界文革的對象已遠遠不是1949年前學成和1966年前學成的知識份子以及「走資派」。通過清華大學這個典型，毛澤東在8月以多種方式來表明「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門、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⑤。8月5日，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通知中說：「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已到」^⑥，中共中央領導層力圖把教育界文革納入自己的而不具教育界人士的軌道。8月26日，姚文元著文〈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對毛澤東改變教育界文革的戰略作了闡述^⑦：

單靠學生、知識份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凡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份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份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的九個人中，除了陳心浩是工人技術人員之外，其餘都是老知識份子。當時，「井岡山」遭到「指揮部」抵制，凡是屬於「井岡山」控制的幾個小組，一個人也回不去。於是，九個人只好單獨成立學習小組，推我作「召集人」。當時各個學習小組都出有牆報，我們也不例外，牆報取名《爭朝夕》。

四 製造《爭朝夕》冤案

1967年冬，江青發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張春橋也定下了橫掃文化界的陰謀。《新民晚報》的「井岡山」趕快給徐景賢、張春橋送去了一份材料，說報社有個叫《爭朝夕》的「古怪組織」。11月22日上午，徐景賢、王承龍在康平路接見「井岡山」的中心組成員，徐景賢說：

你們晚報是一個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和文藝黑線相交織的單位，是一個大黑窩。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真正挖出這些壞人、叛徒、特務、文藝黑線內部的人物。……到必要時，把那些公諸於眾。

12月16日和20日，「井岡山」兩次上書張春橋，捏造《爭朝夕》八個人的「罪狀」，表示「晚報階級鬥爭要從這些人身上揭蓋子是揭定了」，並且「熱切希望春橋對我們的鬥爭給以寶貴的指示」。張春橋在「井岡山」材料上作了批示。於是，上海新聞界一場罕見的迫害事件終於開始。

1967年12月22日，那一天是農曆冬至，當天出版的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都用極大的篇幅登了署名「《上海晚報》井岡山聯合造反司令部部分戰士」的所謂〈革命群眾來信〉，內容是這樣寫的：

秦漢以後延續兩千年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體系之所以能夠在那麼漫長的歲月中，始終保持着總體模式和基本價值取向的穩定性，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體系孕育出了廣泛普及和盡可能公平的科舉制度、嚴整有序和高度發達的文官制度，隋唐以後這些制度更趨成熟。科舉和官制的成熟穩定，其基本目的在於保證官吏的選拔和政務的處理程序最大限度地與大一統集權制度的整體利益相契合，而不是以這一制度中某一個人（哪怕是皇帝）或階層的利益為出發點。如果沒有這種維繫各利益集團關係的共同原則，大一統政治—文化結構就將解體。所以社會機制也就必然把科舉、官制、政務等的上述有序局面，視為具有永恆價值的常規形態，並以此實現對流氓政治膨脹的有效制衡。

但是另一方面，與維繫大一統體系中各階層的共同利益和相互平衡相對應的，這一切政治的運作是以皇權的啟動、干預為前提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把中國幾千年君主政治總結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功」，即是對上述悖論的深刻說明。因此每當常規形態下的運作無法充分保證君權專制的延續時，非常規的補充形態就會被啟動。與維繫君權這一根本目的相比，手段的選擇永遠是從屬的。其實，早在大一統制度誕生伊始，這種補充效用就被設計好了，所以《韓非子·難三》對只知「尊賢以崇德」的孔子、子思等人着力批評了一頓，最後歸結在：「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

不難發現，流氓政治的盈縮是與整個政治局面隆替的周期相匹配的。鹿失鼎革的天時歷來給流氓們以一逞其術的良機，這無須費辭。要說明的是一朝一代之內的興衰與流氓政治互為因果的關係。齊桓公任用背親以諂主的易牙等人卒致身死國亂，是宵小專權很早的例子，但從中已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最高權力階層內部固有的紛爭拼

殺，為流氓政治的膨脹提供了基礎^⑥。以後的帝王們並非不知殷鑒，他們也沒有忘了告誡子輩：「毋邇宵人，維法維則！」^⑦然而「宵人」這永遠割不盡的毒瘤卻始終伴隨着專制制度而延續。流氓政治膨脹與專制政治發展的同步性，可以通過比較看得很清楚。《史記·佞幸傳》和《漢書·佞幸傳》所列寵臣在政治上的作用還極為有限，但到了南北朝，獨裁專制與流氓政治間必然聯繫就已是觸目驚心了。當然包括豢養流氓無賴在內的所有這些千年前的古法，怎樣以更殘酷的形式和更巨大的規模被繼承弘揚，凡是經歷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運動的國人都不會忘記的。

為甚麼不僅「姦雄」發迹成了帝王史的主幹，而且那些為「亂臣賊子遞相承襲」的詭詐手段，非但沒有在「昭德塞違」的聖賢之道面前敗下陣來，反而不斷被弘揚完善，竟而光明正大地成為以後歷代支撐整個政治體系的官制制度。的確，如果我們不能站在文化的深層回答這個疑問，也就不可能明白，為甚麼甚至在千百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時，上述傳統依然被恪守不移，以至於「翰林學士院」（中央文革小組）重又成為「專掌內命」，至高無上的權力機構，而「天子私人」又再權傾天下了。

三 流氓政治與知識階層的命運

有關古來中國知識階層命運的問題固然極為複雜，但借一個例子，也未必不可以概括得很簡單。荀伯玉作為謀主，竭其全力幫助齊太祖蕭道成奪了劉宋的天下，但這位佐命元勳後來卻見誣伏誅，時人嘆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⑧能為帝王們謀天下而不能為自己謀一身，拿這樣沉痛的話比喻兩千年間知識階層的命運並不過分，因為只要「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千年古法不打破，

軀，終圓「洞房花燭」之夢；女方則實現了返城的夙願。有關三方各有所得，皆大歡喜，但唯一缺少的恰恰是作為婚姻基礎的愛情。在「文革」特殊的社會背景下，婚姻的本質受到最粗暴的蹂躪，它不再是伊甸園中青年男女純真愛情的昇華，卻蛻變為赤裸裸利益交換的手段。

二 女知青嫁農民現象

在知識青年的婚姻類型中，與農民結合的比例最高、涉及面最廣，而釀成的苦果也最多。這種婚姻類型又包括男知青娶女農民，女知青嫁男農民兩種形式。一些資料證實，女知青嫁給農民的人數明顯超過了男知青娶女農民的人數^⑥。

女知青嫁農民，本來是知青多種婚姻類型之一，然而在連個人婚姻也被高度政治化的「文革」年代裏，唯獨這種結合被輿論工具賦予了重要的社會意義，被吹捧為徹底革命的壯舉。如果窮源竟委的話，這種做法在50年代末已見端倪。1957年，天津市女七中高中畢業生王培珍到河北省靜海縣團泊窪趙連莊農業社當了農民，兩年後與當地青年農民戀愛結婚。她的舉動受到種種非議，有人嘲諷她是「傻子」。對於這種壓力，她並不介意，並在日記中堅定表示：甘心情願做一個對人民有利、對國家有利的「傻子」^⑦。王培珍顯然認為自己的婚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這種精神支柱使她泰然面對輿論的壓力。70年代初關於白啟嫻事迹大張旗鼓的報導，在更大程度上使女知青嫁農民成為一種政治時髦。白啟嫻原是河北師範大學畢業生，1968年下放到農村插隊落戶。四年後與同隊一小學文化水平的農民倉促成婚，婚後生活極平淡。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方興未艾之際，卻吹噓她是「敢於與地主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傳統觀念決裂，敢於反潮流的人物」，號召全國人民向她學習^⑧。白啟嫻揚名後，地位陡然變

附 錄

重慶武鬥大事記

1966 重慶建成常規武器生產體系。中共重慶市委成立國防工業領導小組。

1966.12.4 大田灣體育場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造反派與工人糾察隊在會場激烈衝突，互有傷員。

1967.2.28 46個造反派組織發表《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公告》稱：重慶臨時最高權力機構——市革聯會成立，負責行使全市黨政財文大權。由於對革聯會的不同看法，造反派分化為擁護革聯會的八一五派和反革聯會的反到底派。

1967.4.23 兩派組織在北碚、重鋼等地的辯論，發展成動拳頭、砸宣傳車、廣播器材等事件。

1967.5.23 兩派在石油學校發生武鬥。升級到雙方動用鋼釘、鐵棍、匕首。是月武鬥之風蔓延全市：重慶醫學院、嘉陵機器廠、西南師範學院等地均發生武力摩擦。前去制止武鬥的軍人遭到身體傷害。

1967.6.5-8 西師兩派發生武鬥。全市兩派先後派有數千人前往支援，揭開重慶大規模武鬥的序幕。

1967.6.12 市革籌、警備區發出《聯合通告》，提出制止武鬥8條禁令。

1967.7.8 兩派武鬥組織在紅岩柴油機廠發生衝突，打死9人，抓走近200人。武鬥中首次使用槍彈。——此次事件被稱作「打響重慶武鬥第一槍」。

1967.6.25 兩派在工業校武鬥中使用槍枝。其後全市相繼發生搶劫國防工廠和駐軍武器、彈藥事件，武鬥全面升級。

1967.7.31-8.6 榮昌縣城兩派大規模武鬥，參戰共600至700人，使用機槍、步槍、手榴彈等武器，雙方死亡78人。

1967.8.3 望江機器廠武鬥隊用高射炮擊沉重慶軍分區交通艇，艇上3名軍人罹難。

1967.8.5 兩派在建設廠清水池發生大規模武鬥。動用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打死22人，傷多人。

1967.8.8 望江機器廠武鬥隊以3艘改裝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國營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打死24人，傷129人，打沉船隻3艘、創12艘。

1967.8.12-13 兩派在嘉陵機器廠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直接參戰五、六百人，支援人員上萬，動用各式槍炮及戰車、坦克，雙方死亡數十人。

1967.8.13 望江機器廠武鬥隊進攻駐廠部隊指揮部（設在郭家沱中學），打死重慶軍分區參謀長張廷勤和兩名戰士、一名工人。

兩派在解放碑地區激戰，交電大樓及鄰近建築被焚燬。

1967.8.14 兩派在嘉陵大橋武鬥，打死11人，傷多人。燒燬市二輕工業局辦公大樓、市六中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房及部分設備。

1967.8.18-20 沙坪壩區潘家坪地帶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上百人。

1967.8.22 兩派在南岸上新街發生武鬥，打死22人，傷數十人，打壞房屋10幢；抄砸部隊、機關、商店17個單位和居民34戶；搶走辦公用具、手錶、電訊器材等9,183件。

警備區3輛小車途經市區山城寬銀幕影院遭武鬥隊槍擊，打死處長1人、傷副處長以下5人。

1967.8.28 北碚區兩派在歇馬場發生3,000人參與的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40人。

中下旬楊家坪地區兩派大規模武鬥，參戰者上千人，動用各式槍炮及坦克。楊家坪街道被毀近半，雙方死亡上百人。

1967.9.1 周恩來得知空壓廠一夜打了1萬發炮彈，說：「在越南1萬發炮彈能打下多少飛機！這是國家財產，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上旬《9·5命令》下達，全市武鬥平息，兩派武鬥隊陸續向駐軍上繳武器彈藥。

1967.10.27 通訊兵工程學院警衛連駐地發生流血事件，32名學員及附近群眾被打死，53名學員、群眾受傷。

1968.3.3 川東石油處兩派組織在長壽雲台本部發生武鬥，持續6天7夜，死亡40餘人。

下旬重慶四周專縣武鬥激烈。通往市區水陸交通中斷，糧食、煤炭供應緊張。

1968.4.7 兩派在長安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動用輕重機槍、大炮等武器，致使全廠停工。

1968.4.28 是晚9時長安廠大火，市消防大隊前往滅火，途經三鋼遭槍彈襲擊，消防幹警被打死9人，傷17人，消防車被打壞3輛。

1968.5.25 軍隊對市體委實行軍管。

1968.6.2 市革委成立。主任藍亦農，副主任魯大東、白斌、岳林、唐興盛、黃廉、袁金梁、李木森、熊代富。

1968.6.6 市革委第一次會議《決定》，嚴令群眾組織解散武鬥隊，拆除武鬥工事，6月12日8時前不上繳武器彈藥者，按窩藏軍火論處。

1968.7.9 兩派在江陵廠發生大規模武鬥，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等武器。4個車間遭破壞，附近民宅被炮擊成千瘡百孔。

上旬兩派在楊家坪、大坪地區的建設廠、空壓廠、重醫、二四二部隊、五一技校等發生大規模武鬥。動用水陸兩棲坦克、三七炮、四聯高機、野炮等重武器，使上述單位國家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兩路口至楊家坪無軌電車網被打壞，全線停車1年餘。

1968.7.15 援越物資專列在隆昌石燕橋火車站被重慶武鬥組織搶劫。次日周恩來急電張國華立即追回，並將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肇事組織被迫退回搶劫物資，公開檢討。

1968.9.23 市革委、警備區發布《決定》，嚴令一切群眾組織、團體

社會處境較好的人，如黨團員、復員軍人、老工人、出身好的比較多。這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看法。可以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社會背景決定了人們的政治觀點。

在批判資反路線過程中，隨着工人造反派的崛起，不當權的城市階層，學生、工人、一般知識份子、機關幹部當中處境不佳的人們，結成了批判當權派，批判官僚特權的造反派的聯合戰線。

四 後果：黨內抗爭與社會失控

批判資反路線造成了中共黨內新一輪的衝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借批判資反路線打擊了老一輩領導人，權勢迅速膨脹，炙手可熱。周恩來不得不退避三舍，以適應局面。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等在文革初期得到毛澤東提拔的左派領導人先後落馬。各省領導，包括為發動批判《海瑞罷官》立過汗馬功勞的上海市委，紛紛陷入危機。

批判資反路線使幾乎整個領導幹部群體從運動的領導者變為被衝擊的對象。他們的形象從共產黨領導的化身、人民利益的代表，變為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壓制群眾的官僚。至此，文化大革命明顯地背離了他們的切身利益。

1966年11月13日，陳毅、賀龍、徐向前和葉劍英對軍隊院校造反派的批評，是表現老幹部們情緒變化的重要徵兆。1967年2月，不滿終於釀成激烈的抗爭。二月抗爭所猛烈抨擊的事情，諸如亂鬥老幹部、搞亂軍隊、不要黨的領導，都是批判資反路線的後果。李先念曾憤恨地說：「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甚麼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倒了。」很清楚，老一輩革命家的賬是從《紅旗》13期社論，批判資反路線算起的。很多老幹部可以接受對彭真等人的批判，可以接受對劉少奇的批判，但是不能

路線，最重要的工具，也正是反動的唯出身論。」^⑬受血統論迫害和歧視的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這些人大多同情或加入了造反派。

當然，應當指出，這時的平反活動範圍非常有限。文革領導者不是真正要停止政治迫害，而只是把它作為動員群眾的手段，因而必然導致新的迫害。

由於資反路線是通過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貫徹的，各級領導幾乎人人有份。因而，批判資反路線帶有群眾與領導幹部的群體衝突的色彩。不僅如此，批判資反路線提供了一個群眾發泄對領導不滿的機會。長期積累而不能宣泄的不滿、怨恨藉此機會表達，從而使對當權派的批判一發不可收拾。

那些被批判資反路線解放出來的造反派，在政治上和情感上很自然地傾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當時在造反派中流行的「豪言壯語」是「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一定要為毛主席爭氣」，誓作「中央文革的鐵拳頭」^⑭。一首造反派的歌唱道：「山連水，水連天，我們和中央文革心相連。」^⑮這並非矯情。

隨着批判資反路線的深入，政治上的對壘形成了這樣的格局：一方是被指責為執行了資反路線的領導幹部和保守派、老紅衛兵，他們的聯繫網絡基於長期形成的共產黨的組織關係和社會關係。另一方是毛澤東支持的，以中央文革小組為代表的黨內極左派和造反派。黨內極左派在領導層中缺乏根基，而造反派在基層沒有政治地位，只有仰仗毛澤東和黨內極左派的支持才能改變命運。通過批判資反路線，毛澤東和黨內極左派才找到了為切身利益而不妥協地向黨內走資派衝擊的社會力量。造反派的興起，終於使群眾運動的鬥爭目標轉向黨內，對劉少奇和走資派的批判得以大規模地展開。

群眾當中的派別分野，在觀點分歧的背後，也存在着社會背景的差別。造反派當中，出身中等或不好、社會關係複雜、有海外關係、有政治歷史問題、不服從領導、有個人「野心」者比較多，被譏為「社會渣滓派」。而保守派則正好相反，是受領導重視、政治和

社會處境較好的人，如黨團員、復員軍人、老工人、出身好的比較多。這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看法。可以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社會背景決定了人們的政治觀點。

在批判資反路線過程中，隨着工人造反派的崛起，不當權的城市階層，學生、工人、一般知識份子、機關幹部當中處境不佳的人們，結成了批判當權派，批判官僚特權的造反派的聯合戰線。

四 後果：黨內抗爭與社會失控

批判資反路線造成了中共黨內新一輪的衝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借批判資反路線打擊了老一輩領導人，權勢迅速膨脹，炙手可熱。周恩來不得不退避三舍，以適應局面。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等在文革初期得到毛澤東提拔的左派領導人先後落馬。各省領導，包括為發動批判《海瑞罷官》立過汗馬功勞的上海市委，紛紛陷入危機。

批判資反路線使幾乎整個領導幹部群體從運動的領導者變為被衝擊的對象。他們的形象從共產黨領導的化身、人民利益的代表，變為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壓制群眾的官僚。至此，文化大革命明顯地背離了他們的切身利益。

1966年11月13日，陳毅、賀龍、徐向前和葉劍英對軍隊院校造反派的批評，是表現老幹部們情緒變化的重要徵兆。1967年2月，不滿終於釀成激烈的抗爭。二月抗爭所猛烈抨擊的事情，諸如亂鬥老幹部、搞亂軍隊、不要黨的領導，都是批判資反路線的後果。李先念曾憤恨地說：「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甚麼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倒了。」很清楚，老一輩革命家的賬是從《紅旗》13期社論，批判資反路線算起的。很多老幹部可以接受對彭真等人的批判，可以接受對劉少奇的批判，但是不能

容忍造反派對整個老幹部群體的衝擊和對黨的領導體系的觸動。譚震林講得真切：「我不是為自己，是為整體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⑮

這裏既有理念的問題——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怎麼行？——更有切身利益的問題。黨的組織體系是領導者權力、地位、利益之所繫，是群體利益之所繫，更不要說整個領導層幾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批判資反路線以後，黨委領導運動的方式被衝垮，取而代之的是文革期間特有的領導模式，即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通過電台、報刊等傳播媒介、中央領導人在群眾中的演講、直接與群眾見面的文件、以及間接通過中央控制的群眾組織、群眾大會、群眾小報，領導運動。黨的組織體系也部分地發生作用，但被大大削弱。客觀地說，這種大民主方式不是不要共產黨的領導，而是實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拋開地方和基層黨委組織體系的領導方式。在這個模式中，毛澤東個人和以他為首的中央直接與群眾見面，群眾享有毛澤東賦予的廣泛政治權利，而領導幹部卻失去了權力的依靠——黨的組織體系。在這裏，以往黨委和幹部掌握運動的主動權變為由群眾組織和群眾掌握運動的主動權；以往由領導決定整哪些群眾變為由群眾決定整哪些領導。都是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領導下，都是政治運動。造反派沒有獨立的政治目標，其基本作用是充當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破壞了文化教育界的正常秩序。批判資反路線運動又衝擊了大部分中央部門、地方和基層的黨的組織體系，致使領導機關陷於癱瘓或半癱瘓，基層組織停止活動。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制度是高度一體化的，黨的領導體系的破壞即意味着政治、經濟體系的破壞，必然導致全面的動亂。群眾組織無論如何不可能替代黨組織的作用。批判資反路線的直接嚴重後果之一，是造成了全國全面的半無政府動亂。奪權是這種動亂發展的結果，又加劇了動亂。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品。據幾份中共文件透露，中共在1952年發動增產節約運動時，就將生產計劃交由群眾討論，結果是：「職工計劃均超過了領導的要求。」如東北煤礦管理局所屬各區布置的增產節約任務，經群眾討論後，把增產指標提高了32%。而整個東北區國營廠礦經群眾討論結果，超過原計劃總數69.25%，華北地區超過50%以上^④。既然群眾要求多生產，中共只好聽從。結果是可以預料的，這場運動使工人的勞動強度大大提高，並造成十分嚴重的工傷事故。該年東北、華北、華東三區的煤礦業，傷亡事故比1951年同期增加42.7%，其中東北重傷率增加34.4%，華北死亡率增加93.8%，華東負傷率增加169.18%^⑤。表面上看，超額的生產任務並不是中共硬性決定的，而是群眾自己要求的，還有甚麼話可說？但是，為甚麼群眾會提出如此愚蠢又無法勝任的增產要求呢？若仔細分析就不難發現，只是那一小部分先進人民在代表着全體群眾，提出了這種過分的要求罷了。另一份中共文件就透露出，在1950-1951年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湧現出大批積極份子。1952年的增產運動有如此大的「熱情」，實與這批積極份子有直接關係^⑥。其實，中共施政中的許多舉措都是如此這般地製造出來的。

在中共對公民進行政治迫害時，先進人民扮演著幫兇的角色。通常中共要迫害某些人之前，總是先安排先進人民以人民代言人的身分，對這些人進行抨擊，使其成為「人民的敵人」，進而要求政府將之懲治。這時，中共才順應民意，代表人民去清除「人民的敵人」。不論是土地改革、肅清反革命、還是反右，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套程序。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文革前，中共行使著這樣的統治方式：從人民中挑選相當比例的公民用以組成社會集團，並由他們在各方面充當治理國家的助手。這種非常機巧的統治方式十分有效且省力。先進人民在其中發揮著關鍵而不可取代的作用。正因如此，中國社會被人為地分裂了。

四 利益集團的存在與社會衝突

先進人民階層有着自身特殊的集團利益，他們與普通人民在許多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正是利益上的不相同，使先進人民與普通人民形成了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利益集團，由此造成社會矛盾與衝突。文革時激烈的派系鬥爭，只是這些社會衝突的表現而已。

眾所周知，文革前的中共政權是對社會進行全面性壟斷的全能政權。從輿論、意識形態到社會的經濟財富，從資訊傳播到個人的生老病死，政府都進行全面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掌握了政權的黨政官員，也就擁有了自由調撥個人實際利益的決定權。先進人民和普通人民的實際利益的多寡，也就完全取決於黨政官員的調撥了。

在這個擁有權力就擁有一切的社會中，黨政官員階層是中國的統治者，先進人民的黨員積極份子為統治階層的候選群，先進人民中的非黨積極份子則是黨員集團的候選群。從整體上看，只有先進人民集團才有機會擁有權力。

除了入黨當官的優先權之外，他們還擁有迫害他人而不遭政治迫害的特權。1949-1966年的17年間，當局平均三、四年便展開一次以肅整人民為目的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每次政治迫害運動，黨都是利用先進人民作為迫害他人的工具。同時，中共當局又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打擊甚至嘲笑積極份子。有一份中共文件明確指出：對打擊先進人物的人，要追究法律責任^④！1957年10月15日發出的中共文件《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中有一條是：「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份子」就算是「右派份子」^⑤。只要「污蔑」了積極份子，就會淪為階級敵人，誰還敢碰他們？凡是那些年間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會明白，不受迫害的政治權利是多麼有實用價值的生存資源。

除了擁有更多的政治權力、更高的社會地位外，中共當局也給

先進人民額外的經濟利益。由於中共壟斷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權，使其可以對僅佔人口15%的先進人民集團作出經濟上的照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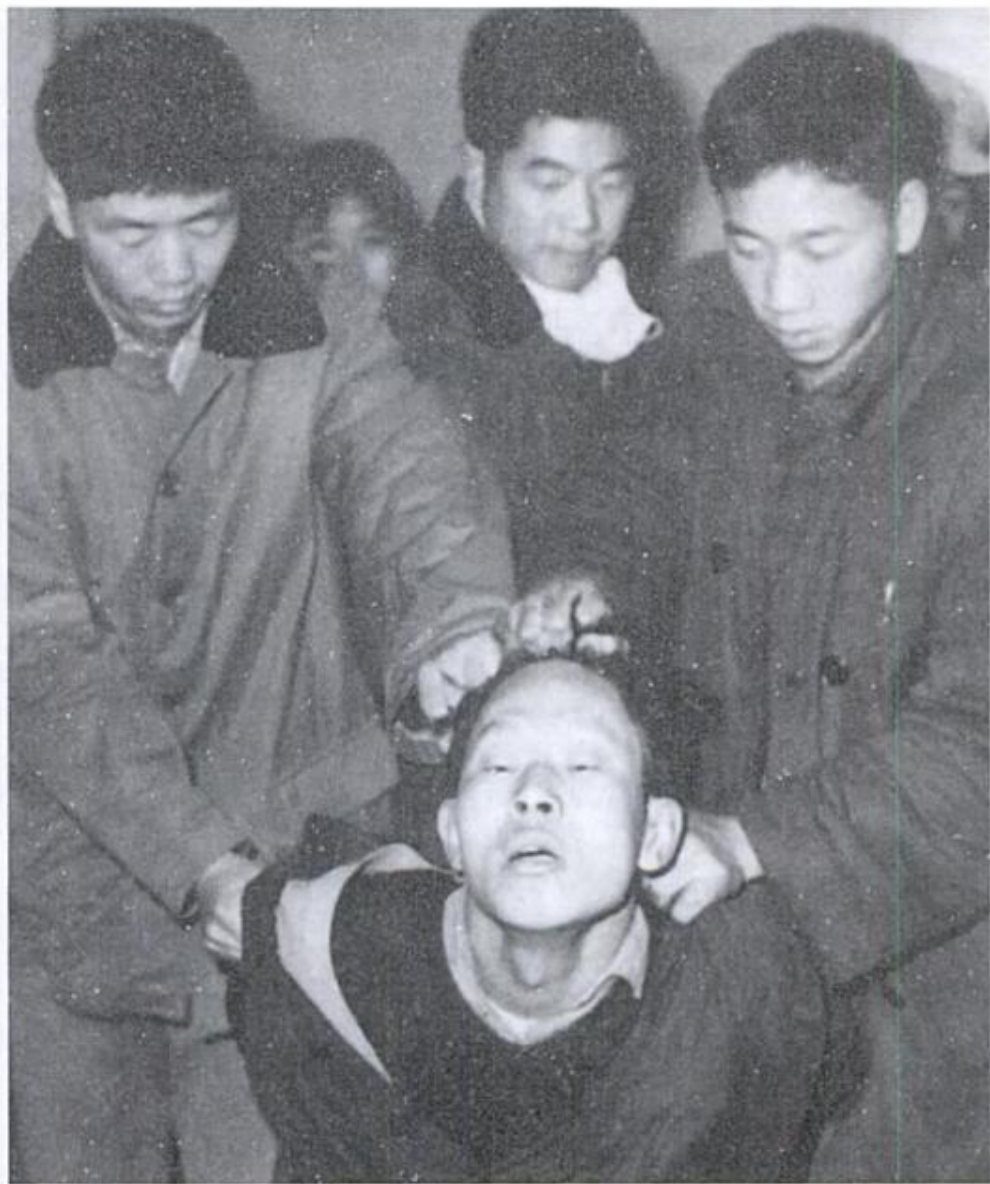
一份中共文件就稱：要關心先進人民的「切身利益」，解決他們在婚姻、住房，以及生活方面的困難^⑤。這些都是經濟性的利益。一份文件也說得很清楚，「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是為了使先進人民「免除後顧之憂」，也就是說應當在經濟上照顧先進人民……使他們無顧慮地努力為黨工作。

中國的工資分八級，級別愈高工資愈多。而按中共文件規定：「調整工資要按職工的政治表現、勞動態度、技術高低、貢獻大小，經過群眾評議、領導批准。」^⑥我們看到，技術、貢獻等項目尚有客觀標準可循，但「政治表現」的好壞卻根本沒有客觀標準，完全憑評選者的主觀感受。而且，提加工資的最後審決在於「領導批准」，領導者當然也會認為先進人民的「政治表現」好。也就是說，在工齡、技術程度相同的工人中，先進人民總能得到提升工資的優先權。

中共當局沒有用文件方式明文規定先進人民的工資應高於普通人民，但在年老生活金等方面則有明確規定：先進人民在年老、傷殘時所獲生活金比例應比普通人民高。一份中共文件稱，一般職工，可按照本人工資的60%發給。而省市級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以及有特殊貢獻的職工，則可以高一些，但不要超過本人工資的70%。即可以高過普通人民六分之一^⑦。

這是可直接以金錢計算的經濟利益，但先進人民獲得更多的是間接經濟利益。例如住房就是採取政府建築和維修，而以低房租出租的辦法。據1956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住公房的職工平均每月負擔房租2.1元，佔家庭收入的2.4%。工人交納的房租，只達該住宅的正常折舊、維修管理費用的一半^⑧。也就是說，政府無形中送了一套房子給分到公房的人，而且每月還倒貼一半的維修管理費！而實際上公房的供給量十分有限，按1956年的統計，北京市建築工程局只有8.5%職工住公房。住房缺口十分大，需要房子的人很多。我們前面引述過

愈多，官員被揭發的可能性愈小。正如當時群眾所指出的那樣^⑬：
黨組為了保護自己，他們在運動初就把一些「危險份子」（原註：
有造反精神，敢於給領導提意見的）一棍子打死……，抓住他們
的一些缺點、小辮子，拚命上綱上線，把他們搞臭，使他們來
不及揭發黨組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



楊克林提供

圖為在大批判中，一旦發現群眾中的「反革命份子」就揪出來批鬥，實行專政。

當時的群眾也將此稱為「不等鳥出頭，就通通被打下去」的策略^④。為了掩蓋「預防性打擊揭發者」的真正目的，官員也亂鬥成分不好的人。正是因為官員在恐懼中非理性的迫害，使得打擊面和打擊程度均失去了分寸。

大批在「橫掃」運動中受打擊的人，他們各類「莫須有」的「罪行」都被抄錄入檔案，成為一輩子的政治負債，並會禍及子孫。他們不服不滿，他們渴望平反，這都是正常人應有的正當要求。就在此時，毛澤東號召造反有理，提出以「不得鎮壓群眾」為主旨的「反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些被無情打擊的群眾，怎麼會放過這一死裏逃生的機會？誰能說他們造反沒有道理？

政治迫害的範圍並不囿於直接受打擊的人，它還包括那些在「殺雞儆猴」的效應下處於恐懼中的人。我們前述曾提到「波及面」和「檢查率」等字彙，它們的數目遠遠高於打擊率，指的就是受到身心恐懼的政治迫害的人數。他們看到自己的友朋莫名其妙地受到殘酷迫害，又不知同樣的災難何時會臨到自己，終致寢食不安，惶惶不可終日。只要設身處地地感受他們的處境，就不難明白他們為何會支持「不得鎮壓群眾」原則。因為這一原則若能確立，他們及其後代就可獲得「免於恐懼」的基本權利。

正是這兩部分人構成了造反運動的骨幹派系，他們以確立「不得鎮壓群眾」的原則、爭取「免於恐懼」權為最重要的政治訴求。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狂亂迫害的「橫掃」運動，就不會有激進造反派。

二 1967：軍人權力機構與造反派「反軍」

造反運動的另一個反抗目標，是對着1967年1月之後中國出現的軍人臨時權力機構。

文革進程顯示，各地權力機構在1966年12月間已癱瘓，1967年1月的大奪權更使之徹底崩潰。造反派此時也沒有能力建立新政府補

替，長達近兩個月的無政府狀態使得社會生產陷於崩潰的邊緣。而當時共產黨內唯一保存下來的建制力量只有軍隊，於是毛在1月底倉促下令軍隊支左。如果沒有軍人政權，中國在各省成立三結合政權之前早就垮掉了。

即令是在1967年1、2月間已建立了三結合權力機構的省份，其下屬各級權力機構其實仍處於瓦解狀況——沒建立的就更甚，想迅速建立新的基層政府又談何容易！省級的三結合權力機構如何上令下達？如何運作？它還是要靠各級的「支左委員會」、「支左小組」等軍人權力機構。而且，「三結合」的三腳之中，群眾只是聊具一格；官員剛從大醜化的群眾批判中站出來，威信有限，又沒有自己上令下達的工作班底；而只有軍隊才既有權威又有成系統的工作班底。所以連當時的三結合政權，實際上也不過是一種變相的軍人政權（北京、上海兩市由文革派直接掌握，情形略為不同，但到了基層仍是軍人說了算）。在一個基層單位，由「支左小組」負責大小事務：由它決定舊官員是否復出，由它挑選群眾組織是否「左派」，由它傳達和督促執行上級指示，由它決定整肅懲處單位內的成員……。

各層軍人臨時權力機構，曾不同程度地與激進造反派產生了摩擦。概而言之，軍人權力機構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社會秩序，但因毛澤東沒能設計出可行的新方案，軍人只能恢復文革前的社會秩序。這剛好是造反派無法接受的。在衝突最激烈的省份，激進造反派還大舉衝擊軍區。激進造反派的反抗或不合作，使軍人政權無法很好地完成任務。在軍隊看來，鎮壓激進造反派已是勢在必行的了。該願望獲得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文革派的贊同。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中對軍方將領表示，衝擊軍區的造反派中「一定有壞人」。《人民日報》在1967年2月17日報導福建軍區對激進造反派的進犯展開反擊時，稱反軍活動是「無產階級的敵人的瘋狂反撲」。

奉旨出朝，地動山搖！軍人政權對激進造反派的鎮壓便毫不留情了。該場發生在1967年2、3月間的大鎮壓被造反派稱為「二月

件。文化大革命宣揚的一套使人們相互敵對的理論，實行的一套推動人們互相廝殺的機制，造成了全民族的內亂和災難。

對反資本主義復辟的不同理解

老紅衛兵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建立在與舊中國統治階級進行鬥爭的基礎上。他們對地主還鄉團、國民黨捲土重來，保持高度警惕，在他們看來，復辟就是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他們相信，「反動學術權威」正在像1956年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知識份子那樣，為顛覆共產黨的政權製造輿論。他們樂於講老一輩革命者的鬥爭歷史，搞憶苦思甜。他們在「破四舊」活動中抄「牛鬼蛇神」的家，是相信階級敵人收藏着「變天賬」——土改前的地契、舊政府的委任狀等等。在青年一代中，他們強調家庭的階級烙印，認為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最容易受仇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反動思想的影響，與家庭劃清界限猶如脫胎換骨之難。而紅五類子女從樸素的階級感情出發就會站在共產黨一邊，即使不是「自來紅」也是根紅苗正、本質好，是今後掌權的革命接班人隊伍的主體，骨肉親情被當作保證紅色江山不變顏色、反修防修的一個重要條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於污泥，怎能一塵不染？幾千年來，地主老爺傳宗接代，維持統治，還不是靠家傳嗎？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②

造反派也高唱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卻另有一番道理。他們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建立在與「新生的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基礎之上，他們更傾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典型是蘇聯，是共產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蛻化變質，由為人民服務的公僕變為壓迫人民的官僚特權階層。「掌着共產黨的權，卻像國民黨一樣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當官作老爺。」^③這種復辟不必改變共產黨的名稱，不必「扶持所有的政治殭屍」，不必「請蔣介石回來實行獨裁，也不必讓原來的剝削份子發號施令」，就使國家的性質改變，使人民重受剝削壓迫^④。因此，問題的中心在共產黨內，在於保持共產黨和國

家的領導人不變修正主義。他們相信，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依靠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民主」的手段，揭露和批判走資派，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可以淨化當權派隊伍，是保證社會主義紅色江山不改變顏色的主要方法。在同齡人中，造反派認為謀求特權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開始。「由於革命勝利，三大差別存在，修正主義舊制度帶來的既得利益和種種特權，使幹部子弟遠遠脫離廣大工農群眾，非常缺乏工農感情，容易滋長起貪圖享受、害怕艱苦、好逸惡勞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特權思想。」^⑮「聯動的騷亂告訴我們：沒有改造好的高幹子女是資產階級復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繼承人。」^⑯

老紅衛兵對「保證鐵打江山永不變色」的理解，偏重於保證老一輩革命者的領導地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被顛覆，重視血緣親情的作用。造反派紅衛兵的理解偏重於保證領導人的公僕地位、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重視反對特權、重視群眾性大民主的作用。老紅衛兵和造反派從各自的角度闡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從中尋找證明自己的依據。但是，由於毛澤東這一理論本身的荒謬，他們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謬誤。

個人崇拜

紅衛兵以狂熱的個人崇拜著稱，但是，如果把紅衛兵的思潮僅僅視為個人崇拜的產物，就過於簡單化了。紅衛兵醞釀時期，他們堅信自己是響應毛澤東的召喚，去做敢革命敢造反的「孫猴子」，「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⑰。毛澤東熱烈地支持他們時，他們高呼：「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但是，當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新階段與他們的設想和既得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困惑了，遲疑了。很多老紅衛兵滿腹疑慮，一廂情願地期待，或迫使自己相信毛澤東站在自己一邊，問題僅僅出在中央文革小組幾個文人身上。個人崇拜降溫了，只表現在不願貿然相信毛澤東犯了錯誤。而一

些敢作敢為、思想敏銳的紅衛兵頭頭，則已經感到了崇拜的危機。一位第一批紅衛兵的發起者說：「不是文化大革命方向錯了，就是主席領導不得力。」另一位則憤憤然道：「現在我跟不上毛主席，這輩子也不想跟了！」^⑩

造反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同樣與他們的利益緊密相關。造反之前，就社會地位而言，毛澤東是高居雲端的被神化的領袖，對毛澤東的熱愛是抽象的、泛泛的。而當毛澤東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他們平反以後，他們才真切地感到了毛澤東的可親可近可敬，發自肺腑地感慨道：「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覺主席親。」這裏的個人崇拜帶着明顯的政治功利的色彩。確實，造反派翻身以後緊跟「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敢打敢拼。但是為着自己山頭、派別的勢力和權力，他們又對毛澤東要鬥私批修、要文鬥不要武鬥、大聯合等指示各取所需，甚至置若罔聞。

三 社會背景的差異

家庭出身

老紅衛兵創建伊始，就打出階級路線的旗子，提出家庭出身問題，這不僅是政治問題，也是社會問題。

老紅衛兵由「革命後代」、紅五類子女組成，實際上是以領導幹部子女為主幹。老紅衛兵的領袖人物幾乎是清一色的幹部子女，老紅衛兵主要反映幹部子女的價值取向。工農子女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追隨者、跑龍套的角色。由此不難理解為甚麼批判血統論和特權以後，工農子女紛紛脫離老紅衛兵，另起爐灶。而能夠在困境中堅持老紅衛兵旗幟，與中央文革拼死抗爭的只剩下幹部子女。

與老紅衛兵相比，造反派紅衛兵的家庭背景比較多樣，最大的特點是基本來自不當權的社會階層。在大學，那些敢於和工作組衝撞

的學生常常是紅五類出身，形成造反派組織以後，吸收了各類出身的學生，但是高級幹部子女非常罕見。血統論在大學生中市場不大，文革前三、四年貫徹階級路線的結果，已經使大學生中家庭出身「好的」所佔比重上升。大學生爭論的中心是工作組問題，而不是血統論的對聯。

中學生的情況有所不同，中學生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由於入學時基本沒有家庭出身的限制，在一些錄取分數線高、升學率高的重點學校，幹部子女、各類職員（包括知識份子）子女、有家庭文化熏陶的舊統治階級子女的比例遠遠高於他們在社會總人口中的比例，而工農子女的比例很低。血統論的對聯在中學影響很大，是老紅衛兵與造反派衝突的主要焦點。造反派由反對對聯的學生組成。最初是少數反對對聯的紅五類子女以及按純而又純的家庭標準不能入選紅衛兵的紅五類子女。隨後，由於家庭出身束縛的解脫，大批非紅五類子女湧入造反派組織。許多工農子女也脫離老紅衛兵，加入造反派。在造反派中，出身「一般」的學生在人數和政治影響力上佔了相當大的優勢。所謂「一般」家庭，指職員、教員、自由職業者、小業主、店員、中農等「勞動人民」家庭。造反派中也有出身「不好」的學生，但是比例較低。查其原因，一是真正被劃為黑五類的家庭很少。按照有關政策，有政治歷史問題而沒有「帶帽子」者，按照經濟地位定階級成分，如摘掉「帽子」的右派，其成分按職員、教員論。有「複雜海外關係」、一般歷史問題者不影響成分的劃分。學生自報出身時自然就好不就差。二是出身「不好」的學生長期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往往處事謹慎，家長也多有囑咐，因此不願輕易捲入政治運動。

造反派在實際上不計較家庭出身，但仍不能徹底擺脫階級路線的長期影響和壓力，他們往往推舉幾個出身紅五類的學生進入領導圈子。造反派在正式文件中宣稱：「我們紅衛兵以勞動人民家庭（工、農、兵、革命幹部和其他勞動者）出身的革命學生為主體。」^⑨這是造反派在出身問題上與多年來強化階級路線的政策相調和的產物。一個

「勞動人民家庭」，一個「為主體」，為各種出身的學生進入紅衛兵提供了依據。雖然家庭出身的的不平等仍然存在，但是被造反派淡化了。

紅衛兵的家庭背景的差別甚至可以在服飾上一目了然。老紅衛兵的典型裝束是一身綠軍裝，腰繫武裝帶，象徵着繼承革命傳統，同時也傳達着社會身分的信息：革命後代、幹部子女的队伍。領導幹部往往有革命軍人的經歷，老紅衛兵不難找到軍裝。

造反派的服裝是雜七雜八，以藍色為主色的，其中少數的綠軍裝也往往瞞不住明眼人——那不是軍裝特有的國防綠，那是仿製的贗品。造反派很難搞到真正的軍裝。

社會聯繫

老紅衛兵和造反派所密切聯繫的社會群體相差顯著，老紅衛兵與領導幹部，即「當權派」相聯繫。老紅衛兵成立前後，就有一些領導幹部對他們在教育領域造反，予以鼓勵和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1966年6月中旬的一張大字報說：「黨中央的同志堅決支持我們，……我們的許多家長都是革命幹部，也堅決支持我們，還為我們出主意，想辦法。」^②就是在老紅衛兵「破四舊」，衝向社會時，很多領導幹部一方面對衝擊黨委、工作組領導體系，對嚴重違反中共中央有關政策的行為感到憂慮，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只把這些當作可以理解但應當糾正的過火行為。沒有見到領導層對老紅衛兵政治方向的尖銳批評。一些地方和基層領導幹部還一度採取支持紅衛兵，並將其造反矛頭引向黨外、引向社會的「禍水外引」的對策。1966年10月，造反派紅衛兵興起，猛烈攻擊領導幹部。11月，幾位元帥對造反派紅衛兵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和勸告。此後，由於紅衛兵運動的明顯分化，領導層對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的態度也鮮明起來。1967年2月，在著名的「二月抗爭」中，幾位老一輩革命家為老紅衛兵鳴不平，對造反派憤怒斥責，愛憎分明：「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

「蒯大富是甚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直到80年代，很多領導人仍是將老紅衛兵與造反派區別對待的。1984年前後，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理三種人、整黨的活動中，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一位有決策權的領導人在處理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的申訴材料時批示（大意）：這些紅衛兵（指老紅衛兵、西糾、聯動的頭頭——引者注）不是三種人，其中優秀的可以進入第三梯隊。陳某某（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頭頭）是三種人，但也要給出路。

與老紅衛兵形成鮮明對照，造反派紅衛兵的社會同情來自不當權的城市居民：普通工人、文教界中等以下知識份子、一般機關工作人員。他們中的很多人寧可接受造反派學生，也不願接受老紅衛兵。許多中青年教師直接參加了造反派紅衛兵組織。

四 結語

以毛澤東為首的文化大革命領導者調動群眾的不滿情緒和期待，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運動，藉以進行黨內鬥爭，實現徹底打垮、搞臭所謂「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標。文革領導者努力使群眾運動納入為黨內鬥爭服務的軌道，但是，群眾組織與文革領導者之間經常發生認識的差異與矛盾，群眾心目中的毛澤東常常偏離現實政治鬥爭中的毛澤東。文革領導者盡力引導群眾團結一致地走完文化大革命的全程，但是被政治性群眾團體強化的群體意識頑強地表現自己，使文革領導者不得不在文革的不同階段啟用不同的群眾組織派別，排斥阻礙文化大革命部署的派別。毛澤東認定老紅衛兵犯了錯誤，夏天的革命派變成了冬天的反革命派，造反派裏混進了壞人，要清理階級隊伍。實際上，除了文革理論和實踐的迷誤之外，問題的實質在於文革領導者與這部分、那部分群眾的政治和社會差異。

文化大革命是有千千萬萬群眾主動、熱情投入的運動，因而僅僅從毛澤東的錯誤和林彪、江青的作用，或僅僅從黨內路線和權力之爭進行分析，都不足以作出完滿的解釋，必須研究芸芸眾生的政治活動和思潮，研究他們與其他政治因素的互動關係。本文權作一次嘗試。

註釋

- ① 本文所使用的「造反派」一詞是狹義的概念，指文革初期特定的群眾組織派別，不同於70年代以後流行的、泛指一切群眾組織及一切打破既成秩序者的廣義概念。
- ② 據筆者1989年11月在北京的採訪。
- ③⑭ 清華附中紅衛兵：〈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6月24日），見《紅旗》，1966年第11期。
- ④ 《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站出來！》，據清華附中紅衛兵1966年8月散發的資料。
- ⑤⑮ 清華附中紅衛兵齊向東：〈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1966年8月初），見《紅衛兵報》，1966年11月1日。
- ⑥ 關於對聯產生的時間、地點，筆者據採訪及收集的資料考實。文革中紅衛兵編寫的一些大事記說：1966年7月，北航附中出現對聯，這是流傳的時間，而不是產生的時間。
- ⑦ 據群眾組織印發的首長講話集。
- ⑧ 毛澤東和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巴盧庫的談話，1967年2月3日。
- ⑨ 〈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67年10月7日轉發。
- ⑩ 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自來紅們站起來了〉，《兵團戰報》，1966年11月26日。
- ⑪ 署名「北京一〇一中，你們的爺爺——老紅衛兵」的恐嚇信，成文時

本書是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專題論文集。集中近40篇文章全部選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這些文章刊出後，在中外學術界引起關注和好評，現結集成書以饗讀者和研究者。本論文集分五部分：

一 文革事實的再發現：從「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產生、中學生打死打傷老師和同學的血腥事件、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直到文革中的「外國造反派」以及存留至今的重慶紅衛兵基地等，通過對當事人的調查和資料分析，再現文革歷史事實真相；

二 造反運動與異端思潮：分析了文革時期造反運動興起的過程、性質和對立的群眾派系組織的成因，以及貫穿文革的異端思潮和紅衛兵思想轉向；

三 文革對世界的衝擊：描述和分析在文革影響下新左翼、毛主義份子在日本和法國的興起和衰落，並結合二戰後日本及法國的社會問題及知識份子思想傾向作出反省；

四 文學藝術中的文革：包括分析紅衛兵美術運動、文革後期繪畫、樣板戲、革命電影以及文革題材的文學作品，不少涉及到文革思潮與後現代主義；

五 評論與綜述：從世界資本主義視野和現代性演化等理論角度評論中國和西方的兩個文化革命，綜述西方文革研究，展示更廣闊的研究領域。

本書作者有大陸、香港、台灣及海外的中國學者——特別是文革研究者，如印紅標、徐友漁、唐少傑、王明賢、王友琴、王紹光、宋永毅、華林山等；還有著名外國學者，如德利克（美國）、橋爪大三郎、加加美光行（日本）和杜蘭、加斯托、高達樂（法國）。

文化大革命是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和世界至深的最重大歷史事件之一。對所有關注當代中國及其未來發展的讀者以及研究當代中國和文革的學者，本書都是必備參考書。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ISBN 962-201-763-0



9 789622 017634